

901856

ZICHANJIEJIZIYOUHUAYANLUNJILU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 编

资产阶级

856
54100

自由化

言论辑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ISBN 7-5006-0620-6

D·18 定价 2.60 元

(内部发行)

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7.5印张 145千字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定价2.60元

(内部发行)

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对立

(代序言)

余 心 言

—

请允许我先在这里做一道简单的代数题：

设： $x = y$ 在两边各乘以 x ，则

$x^2 = xy$ 在两边各加 y^2 ，则

$x^2 + y^2 = xy + y^2$ 在两边各减 $2xy$ ，则

$x^2 - 2xy + y^2 = y^2 - xy$ 分解因式，

$(y - x)^2 = y(y - x)$ 在两边各约去 $(y - x)$ ，则

$y - x = y$ 在两边各加 x ，则

$y = y + x$ 因为 $y = x$ ，所以可以用 x 代替 y

$x = x + x = 2x$ 两边各约去 x ，则

$1 = 2$

这个演算结果显然是荒谬的。有经验的人也不难发现计算的过程中存在的小小的错误。但是，在一个粗心的、初学代数者看来，可能就会认为演算的每一步都是符合代数学规则

的。只是由于演算的结果与他的常识不符，他才能感觉到这里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如果我们设计一个更复杂的演算过程，那么，这里面的小小的差错就会更容易被掩盖起来。

在实际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更不少见。有许多时候，按照理论上看来是正确的设想精心设计的机械装置，却不能正确地运转，或者制造出来的产品总是不合格。人们可以从实践的结果判断：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可是为了寻找出这个差错，可能还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试验，还要付出成年累月的时间作为代价。

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误区”更比比皆是，使人常常感到防不胜防。特别是意识形态，某种观点、理论、主张，或者并不直接告诉人们按此实践会造成什么后果，或者应许给人们某种虚幻的前景，或者以某种局部的短期效应使人们误以为在范围更大时间更长的跨度中可能收到更好的效应，而人类社会生活的演进过程因素又极其复杂，交错作用，许多事件的后果往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清，就更为各种错误观点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不但是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容易上当，也使许多好心的人们，即使是对某种错误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也不能引起足够的警惕，不能及时地进行必要的斗争，或者在思想斗争中因为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而感到某种困惑。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归根到底，世界是可知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这种认识，当然包括认识真理，同时也就包括认识

谬误。认识的源泉,归根到底又是一元的,这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只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和谬误的唯一标准。

刚刚过去的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是惊心动魄的。这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能不引起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反思,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国内外的许多人、许多事。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也确实应当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来。这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的需要,也是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需要。最主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这场动乱在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时期发生,使得国内外的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个事实正足以证明,动乱的起因并不是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失误不满。工作中的失误确实是存在的,人民群众对此也是不满意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同人民群众是一致的。但是广大群众并没有也决不会有要用动乱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不满的问题的愿望,更没有用动乱的方式来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一些人的思想混乱以至采取各种违法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性泛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资产阶级通过“和平演变”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使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的阴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内也总有一些企图借助国外势力实现个人或小组野心的人,有一些卖国求荣的人,有一

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的人。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他们的思想武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应该说，这一套东西，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既有一定的市场，又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说它有一定的市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总会有一些人不了解这些差距的由来以及发展前景，而又羡慕人家的物质生活，而且社会主义发展到目前的阶段，也还不可能消除个人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体系正是植根于个人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说它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套的实行，归根到底是要损害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恢复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要广大劳动人民识破他们的企图，就决不会跟着他们走。而在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以及我们能够取得斗争的胜利，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限制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的必然性。

问题在于党的领导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以恶性泛滥，原因就在于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岗位的同志放松、限制甚至取消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被视为“僵化”、“保守”、“极左”，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却受到提倡、鼓励，受不到批评、抵制。舆论阵地、思想文化阵地一个个被蚕食。就这样，政治空气一天天被毒化了。各种极端利己主

义的观点、宣扬腐朽生活的观点、卖国有理的观点，恬不知耻地招摇过市。丑化共产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丑化祖国文化传统的言论成为时髦，各种污蔑、歪曲、捏造，完全不顾事实，调门越唱越高，终于使人们听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不以为怪，想不到要划清界线。这种情况丝毫也不能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套有什么道理，它只是我们放弃斗争，或者说是把我们自己的同志的手脚捆起来的结果。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性泛滥终于酿成了这一场严重的动乱，并且在北京发展为反革命暴乱，当然是一件大坏事。但是，它也有两点好处。一是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昭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会导致怎样的恶果，使得人们再不能对这些错误观点掉以轻心了。一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地把他们那些宝贝统统抖漏出来了，从而使得人们眼界大开。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有些同志担心会不会到哪一天来一个翻案，也有些盼翻案的人。有了这样一大批系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担心的人就可以放心，想做翻案文章的人也做不成这个文章了。铁证如山，都是不打自招的自供状，用不着任何上纲分析，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华的面目都是清清楚楚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样一批反面教材，正好可以激励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起来战斗。在这样的战斗中，马克思主义当然要结合历史的新情况，回答一系列新问题，从而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向前发展。

当然,这一切不会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谬种流传,遗毒甚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且把这件工作长期做下去。

二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总是把进攻的矛头首先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上。他们的论据就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没有做什么好事,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等等。

我们这40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别的不说,祖国大陆统一的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并且实现了温饱,这几项就是了不起的。以一些人攻击得最厉害的教育为例,北京市解放前公私立的高级初级中学加在一起才81所,许多是十分破烂的,现在已经发展到840多所。还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好事,只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这个问题,只要是一个肯于面向现实的人,都不难解决,材料是十分丰富的。

是不是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呢?这要看比什么,怎么比。从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不再受剥削和压迫而言,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法同我们相比。从人民的生活看,我们也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好得多。这也是很自然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然造成贫富悬殊。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差距就比较大了。但是这

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罪过。他们起步比我们早得多,等到中国也要起步发展自己的工业时,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阻碍了旧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的这40年,虽然遇到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我们还是独立自主地迅猛地发展了起来。50年代初期,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80,现在发展为美国的1/40。我们在发展,美国也在发展。究竟谁发展得更快,哪一个制度更有优越性,不是很清楚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大体相同的情况。革命胜利前的俄国,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3%,到70年代已经发展到相当于美国46%的水平。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生命力吗?

比较有迷惑力的是香港和台湾的例子。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年发展的速度确实比大陆快,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甚至殖民地也比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好呢?有些青年人甚至因而认为抗日战争都是不应该打的,如果中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生活水平也可以和日本人相当了。

让我们先看香港。香港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如果当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就能够繁荣,香港早就应该繁荣起来了。可是一直到1936年,香港的繁荣程度远不及当时的上海、天津,甚至连广州都不如。原来,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初,主要是为了向中国倾销鸦片,需要在中国沿海有一个不受中国管辖的落脚点。后来鸦片贸易没落了,香港虽然有良好的海港,终究不如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大陆海

港方便,所以它的发展就比较迟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天津、广州相继沦陷,失去了作为国际海港的功能。中国内地同国外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很多都是通过香港进行的。上海的一批民族资本迁移到香港,中国文化界、政治界也有许多重要人物聚集在香港活动,香港迅速繁荣起来。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香港虽然仍旧是殖民地,只是换了个主子,但是由于失去作为大陆与外界联系桥梁的功能,其经济形势就不能不一落千丈,呈现一片衰败景象。香港的真正繁荣是在1949年大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了一部分大陆的资本家迁移到香港,带去了资金,起了大量输血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美帝国主义又对我们进行封锁,香港成了中国对西方世界贸易的几乎唯一孔道。这么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香港光是做转口贸易,吃过水面也吃肥了。何况还有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扶持,水、电、粮食、蔬菜、水果的稳定平价供应,就近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等等有利条件。可以说,香港是靠着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才发展起来的。自从中英协议1997年交还香港以后,香港有一些患有“恐社病”的人士曾经提出另外找一处气候条件类似香港的岛屿,买下来,再建一个香港。但是此议很快就被绝大多数香港人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世界上类似气候条件的岛屿并不难找,问题也不在于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重建一个香港,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离开了中国大陆沿海这个条件,还有什么生意可做?做不成生意,即使再建一个香港又有什么用?这个事例

也足以证明，并不是只要有了资本主义制度，当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就一定能繁荣起来。

再说台湾地区，这些年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国民党比共产党有能耐，更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如果国民党有能耐，它统治大陆 22 年，为什么没有把国家搞好？1949 年它从大陆逃到台湾，把它在 22 年中从 6 亿人头上搜刮的财富，凡是能带走的统统席卷而去，光是黄金就有 280 吨。280 吨黄金的价值是多少？大体上相当于 45 亿美元。拿这笔钱投资到 1000 万人口的小岛上，就相当可观了。美国又给了国民党政权大约 60 亿美元的直接援助，加上其他形式的援助、贷款和投资，有人计算达到 150 亿美元。只算这两笔帐，按台湾地区现有 2000 万人口计算，就可以形成人均固定资产 1000 美元。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由固定资产的积累程度决定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 40 年中形成的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大约有 13,000 亿元。这就是我们的水平。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体制的优劣，可以影响这笔固定资产发挥作用的大小。但是毕竟是有限度的，搞得再好，13,000 亿元，充其量能发挥 20,000 亿元的作用，而决不可能发挥 20,000 亿元的作用；搞得再不好，它至少也能发挥 7000、8000 亿元的作用，而不至于只能发挥 2000、3000 亿元的作用。固定资产积累的绝对值，这才是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落后正在

这里，
人均占有量不过是 1000 元人民币稍多一点。但是我们掠夺殖民地，二没有靠帝国主义施舍，而是完全靠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这正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这样的积累速度，在全世界范围比较，也算是相当快的。设想一下，如果让国民党继续统治大陆，假定他们肯把那些黄金全部投入经济建设，假定美国仍旧给150亿美元，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1亿人口的中国，又能起多大作用？美国会不会因为大陆人口相当于台湾的55倍，把援助额也增加到55倍呢？不可能的。要拿出8250亿美元来，美国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再说，它为什么肯在台湾投下150亿美元，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投这么多资呢？例如拉丁美洲那些小国，有的和台湾人口差不多，气候条件也相当，为什么美国不在那些地方给这么多援助？为什么那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远远不如台湾？原因还在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大陆又已经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且发展得相当成功。所以，并不是台湾这个岛屿值得美国人花那么多钱，美国人在台湾花钱时是把眼睛盯在中国大陆上的，这才是一块大肥肉。越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台湾地区对美国人就越显得重要。

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要相信当了殖民地就会有好日子过。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都可以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这一点。世界上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当殖民地的前途果然那么美妙，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岂不是应当重金礼聘帝国主义国家来侵略自己吗？何以二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充满着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

解放的斗争呢？要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政者代表的是那里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投资就是为了追逐利润和超额利润。无论是炮舰侵略或者是经济“援助”，都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为了一本万利地回收，是为了更多地榨取和剥削。

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另一方面论据，就是所谓“全民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只有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中国才有前途。

在社会主义中国，无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或是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只是适应不同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以及不同的经营项目，采取的不同所有制形式而已。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攻击全民所有制的弊病，其最大者无过于吃国家的大锅饭，因而企业发展无动力等等。这的确是个弊病，但并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必然有的弊病。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例如首都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等一大批不存在这样弊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以北京郊区的乡镇企业为例，这几年发展很快，每年递增的速度都在20%以上，但是每年倒闭的企业也大约都在5000个左右。个体企业生生灭灭，就更不稳定了。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各有它的适应方面，又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北京市平谷县全县130多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过改革，打破了铁饭碗、铁交椅（干部）、铁工资以后，其生产发展速度从整体上就远远超过全部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还有一些人总是说乡镇企业的好处就是不受政府干

预,有更大的独立自主程度。我们是赞成扩大企业独立自主权限的,但是说乡镇企业就比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受政府的干预少,那也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实际上仍然是乡镇党政领导机关直接控制的,其干预程度远超过城市中政府部门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只是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程度较差而已。并不是没有“婆婆”,而是“婆婆”不多。真正具有独立自主发展的素质的乡镇企业,远没有占多数。这都是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能简单化地去论优劣,更不能歪曲事实来为某种需要作论证。

在我国,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还应当有相当规模的发展。有的领域,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比较难以经营,更应当着重发展个体经济。但是,个体经济在若干领域中的优越性,不等于在任何领域都有优越性。有些人主要根据有些个体户很快发了大财的事实来论断个体经济的优越性,那是一种浅薄的看法。实际上,这类很快发大财的人并不占个体户的多数。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个体经济一般也很难发财。他们的处境不过是终日劳累,博个蝇头小利,聊以维持温饱而已。前一段我国社会上的一部分个体户迅速发财的情况,不能看作是正常的合乎经济规律的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个体经营放开之后,管理没有及时配套跟上。一些人投机倒把,非法经营,偷税漏税,赚的是不法利润。这种钻空子发财的现象,不但不是什么优越性,而且正是经济上治理整顿的对象。

还有的人说，公有制的产权不明确，劳动者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就不会关心积累的增值，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就不高，因此只有把公有的生产资料用股份的方法分给私人，才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

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股份制虽然已经成为一种通行的所有制形式。但是，迄今为止，股份有限公司也不是那里的企业唯一的组成形式。更多的企业仍然是独资或者合股经营的。发行股票的企业，虽然每一位持股人可以根据手中股票的数额明确他在这个企业用的资产中所有权的份额。但是实际上，对这个企业来说，这样做并不是使产权明确化，而是使产权模糊化，使人从表面上更加不容易看清楚这个企业究竟归谁所有，使一部分大资本家可以凭借手中少数股票操纵多数人投入的资金。普通的持股人，由于每人所有的股票数量有限，实际上很难对企业的决策起什么作用。真正可以由他们自己作主的事不过是买进或者卖出手中的股票。即使这一点，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股票的行市仍然操纵在少数大资本家集团手中。资本主义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用这种方法把社会上的零散资金聚集起来，转化为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或者经营所必须的费用。我们这里的许多股份制鼓吹者的主张，却是把已经聚集起来的公有财产分散到个人手中。这样做，对生产的发展不但不能起促进作用，反而只能起破坏的作用。

至于说手里有了股票就会更关心企业，更有向心力、凝

聚力,如果不是为了骗人,至少也是无知。报上曾经登过某鞋厂每个工人入股 200 元,年终分红 15 元,因而,增强了工人的向心力云云。说的就是骗人的鬼话。年息只有 7.5%,连银行定期储蓄利息都不如,还能增加什么向心力?即使在一些经营较好,工人手中股份数额较大,分红比例较高的企业,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北京有一个股份制企业,人均占有股金 500 元,分红的水平为 24%,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实得 20%,息率已经相当高了。即使这样,人均从股票得到的年收入也只有 100 元。这个企业,工人的人均年工资收入在 2500 元以上。究竟是那 100 元有向心力,还是这 2500 元有向心力?答案不是很明白的吗?

卖股票就应当允许股票的买卖。一个职工既可以拥有本厂的股票,也可以拥有其他厂的股票。如果他买的是其他厂的股票,按照“向心力”论者的逻辑,是有股票的厂对他更有向心力还是他在其中劳动的工厂对他更有向心力呢?

在一个企业中,运用一定量的资金,生产出来可供分配的价值,总是只有一定的数量,按资分配的部分即股息、红利多了,按劳分配的部分就只能减少。这样做的结果,是能够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是可能削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股票的买卖必然使各人持股的数量不可能相等。假定某甲与某乙同操作一台车床,甲的技术和劳动态度都优于乙,工资奖金也超过乙,甲的年收入为 2500 元,乙的年收入为 2000 元。但是甲只有 1000 元股票,乙却有 10000 元股票,甲的股息年收入为 200 元,乙的股息年收入为 2000 元。这样一来,甲

的年总收入为 2700 元,乙的年总收入为 4000 元。你说,甲会高兴吗?也许有人会说,乙把这笔钱存入银行也可以得到 1000 元以上的利息。但这和在一起劳动,从本企业创造的价值中分配所造成的差距,心理效应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的企业不可以运用股份制的方法来聚集资金,促进企业资产的流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想要论证用股份的方法瓜分公有制、推行私有制有什么优越性,那就是徒劳的。

中国是个 11 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是第一要紧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1/3,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人均 1 亩 3 分地,吃的粮食、油、糖、蔬菜、水果、茶叶,穿的棉花、麻,喂猪、牛、羊的饲料,做啤酒的啤酒花、大麦,都要从这 1 亩 3 分地里拿出来。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只有使中国的耕地都达到高产、超高产的水平,才能缓解这个矛盾。但是,农业生产有这样一个特点:亩产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单位产品的成本也比较低。一亩地只收 200 斤粮,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拿到手。一亩地要收 2000 斤,也可以办得到,但一定要有很巨大的投入:农药、化肥、电力灌溉,各种抗灾促高产的措施等等。这样拿到手的粮食,每斤粮食的成本可能要几倍于望天收得到的粮食。如果中国的土地完全是私有的,农民从比较利益出发,就可能选择不种粮食,至少不追求高产的道路。整个国家就会粮食不够吃(当然如果整个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粮食也可以够吃,印度人均粮食水平低于中国,它们就仍然可以每年大量出口粮食。但这

是以许多人买不起粮食,每年都有大批人饿死为条件的)。靠大量进口,不但中国没有这么多外汇,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大粮源,而且运输问题也很难解决。有一个出路就是粮食涨价,涨到现行粮价和世界粮价水平的几倍以上。这样做,人民能够承受吗?社会能够安定吗?而且一定会使中国成为劳动力成本昂贵的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还能搞得成现代化吗?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少数人由于自己的信仰所作出的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贫弱的处境不断地奋斗,他们也曾想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实践的结果总是走不通,总是失败。除了国内的条件,更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经过这样的道路走向富强。他们更需要使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他们的附庸。经过100多年的斗争,中国人民才终于走上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唯一能够救中国,使中国富强的道路。4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尽管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曾经犯过不少错误(走任何道路也不可能不犯各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我们仍旧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为举世所公认。在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中国劳动人民,是不可能容忍再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这一段时期人们对社会上分配不公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说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人们判断各种社会现象的价值尺度。如果在中国重搞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那就只能引起社会长期的动

荡不安,天下大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就都没有希望了。

在中国,有两件事是已经发生了的。一是我们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改革开放。这两件事都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只能在这样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三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因而一切企图把中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沦为帝国主义附庸国的人,都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实现他们的阴谋的最大障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的口号就是两条,一条反对社会主义,一条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一开始就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什么“废除一党专政”、“清除4700万党徒”、“取消机关、工厂、学校中的党支部”等反动主张,更是充斥于一些大字报、演说、传单、公开信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上了我们国家的宪法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庄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历史形成的,不是自封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也是由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并没有任何其他的私利。我们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出于我们这一群共产党人利益的需要,而是中国人民的利益需要我们这样做,中华民族的利益需要我们这样做。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可能走别的道路。既然如此，那么领导这个事业的历史责任也就只能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是同现代生产力联系的劳动阶级，是最有纪律、团结精神最强的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强大，也最有前途的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集中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坚持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但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还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党何止百计！大多数昙花一现，便无影无踪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除了一些长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党之外，主要就是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斗争的结果，国民党被赶出了大陆，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选择当然不是用投票的方式，而是用枪炮，也用扁担和拳头，用千万自愿参军子弟的血肉，用母亲和妻子的心，用支前的粮食和小车。这是真正的选择。历史已经证明人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真正站立起来了，已经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已经得到了几代人流血奋斗而不能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利益的。

有人说，老一代共产党人领导这个国家，是因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现在40年过去了，大多数共产党员并没有参加过当年的革命战争，你们凭什么资格来领导？这次动乱中也

有人打出这样的横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好像经过40年，共产党的天就应当变了，应当改朝换代了。这些论调说明了这些人完全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打算盘的。他们把领导权看作是争权夺利之权，把领导看作是“坐天下”，把革命斗争看作是为个人或小集团争取私利的斗争。照他们的说法，在革命过程中无数献身的烈士，他们并没有亲眼看见革命胜利的成果，更不用说享用这种成果了，他们也没有可能“坐天下”，岂不是白白地流血牺牲吗？如果有可能从陵墓中请出任何一位烈士，他们都会毫不含糊地驳斥这种带臭气的谬论。我们共产党人所以能够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正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狭隘利益。我们确实曾经向国民党争权，争天下，但决不是为了争个人的权，不是为了自己来“坐天下”。我们争的是人民的权。无论是当年争取政权的斗争，还是今天在政权中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掌握领导权的“资格”。谁要想把人民的政权抢去作为自己骑在人民头上“坐天下”的工具，那我们就只有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一种选择。

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抓住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及党内的阴暗面，无限夸大，并且加上许多造谣污蔑，企图动摇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念。一个时期当中，这一类东西充斥于某些出版物，却得不到澄清和驳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明、伟大、正确。不是说我们没有缺点、错误，也不是说我们党内

没有阴暗面。这些情况在任何个人、任何政党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正确指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这样聚集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这样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中迅速改变中国面貌，这样郑重地对待自己的错误的政党，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找不到第二个可以相比拟的。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不可替代的。任何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污蔑和攻击，都是对中国人民利益的进攻。拿腐败现象来说，在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之下，它的确已经使我们党的肌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理想、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坚决地向种种腐败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但是，在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决不允许向我们党身上抹黑，不能忘记我们党的整体仍然是廉洁的，我们是一个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的政党。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党员，千千万万人保持着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品德。我们的领导干部所得报酬之低，与普通劳动者之间差距之小，在全世界是数得着的。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豪。每一位实事求是的人只要认真观察，都不难得出实际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确实是我们民族最优秀成员的结论。想用道路传闻、小道消息、谣言来打倒我们，那是办不到的。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口反对腐败，抛出来的主张就是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他们的理由是有了这个东西，才能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他们的真正目的，则是要为反对党在中国的存在争取合法的地位，进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取而代之。

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是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之间利益上的矛盾，需要有不同的政党来代表。但是无论它们之间怎样争斗，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得损害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利益，不能让劳动人民掌权。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完全没有也不应当分成两个以上的根本对立的政治集团。而且，资本主义的那种两党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吵吵闹闹，虽然可以演出一些遮掩劳动人民耳目的闹剧，却从来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他们那里的腐败问题。因为他们的制度就是人剥削人的制度，许多在我们看来是腐败的事情，甚至更严重得多，在他们那里也完全属于正常情况。说要靠两党制来反腐败，那不过是一个幌子。这次动乱中，打出反腐败的旗号，也完全是一种陪衬，是对人民的欺骗。无论是前台的王丹、吾尔开希，无论是幕后的“智囊”们，无一不是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他们在内部的口号就有：“宁要腐败的改革派，不要廉洁的保守派”。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反腐败的力量，还是共产党，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党需要有监督，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也需要有民主党派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根本利益一致的互相合作的监督，是对党的帮助，是为了使党的领导更加完善、更加有力，而不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可以断言，在今日之中国，如果削弱乃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就只能导致天下大乱的恶果，就只能妨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谁如果要这样做，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有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不是轻易能够否定得了的。他们提出一种抽象肯定，实际否定的策略。方励之等人提出要在中国搞英国式的“光荣革命”，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类似英国女王的地位，放在牛顿力学中上帝赋予“第一推动力”的地位，就是说除了“领导”的名义之外，其他任何实际事务都不让共产党过问。这当然只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想出来的瞒天过海之计。一旦他们觉得时机到来，例如在1989年春夏之交，他们是不肯放弃采用“攻打巴士底狱”式的方式来用暴力推翻共产党领导的。

问题在于有一些共产党员，甚至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对于方励之们的阴谋不但不旗帜鲜明地斗争，反而内外呼应，也在那里大做“淡化”党的领导的文章。赵紫阳等同志这几年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一个一个领域限制共产党的作用，这也不准“干预”，那也不要“介入”，捆住党的手脚，使党的领导在实际上逐步变成一句空话。这几年许多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的感受，就是党的领导在一片加强声中削弱。

一些在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削弱党的领导的一个手法，就是接过许多同志关于“党要管党”的迫切要求，实际上把它变成“党只管党”。眼看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党的肌体受到严重侵蚀，逐渐丧失战斗作用，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同志正确地提出一定要加强党的建设。针对一部分党委书记热衷于做生意、跑买卖、赴宴会、抓事务的不正常状况，许多同志尖锐地提出：“党要管党”。党的

建设历来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党，更应当致力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才能担负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团结带领群众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然而党内一些坚持自由化观点的同志接过这种正确的主张，加以歪曲，说什么党只要把自己管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主张不但直接违反党的章程关于党的任务、党的性质、党和其他组织的关系、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一系列规定，而且是在实际上取消党的领导以至于扼杀党的生命。我们知道，政党不是道德协会，不是俱乐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是为了自身的完善、自身的修养而成立的。政党的存在，就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政治主张相同的人群，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组织起来的。可以说，任何政党的组织，都是为了协调自己的行动，向这个政党以外的人群做工作，扩大自己在这个政党以外的各种组织中的影响，直到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目的，人们又何必加入这样的党？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贯注意自己组织的严密和思想的纯洁，必须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但是，党的自身建设，只有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离开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关起门来，党的自身建设就会既失去动力，又失去检验的标准。所以，“党只管党”，不但实际上等于取消党的领导，而且必然要导致党的消亡。

中国共产党作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历史要求共产党能够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执政党的地位,使党更容易陷入于各种事务之中,沾染官僚主义的灰尘。执政的权力又可能成为一种腐蚀剂,使党内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走向堕落。所以,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一刻也不可忘记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开,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强调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减少党组织对于行政事务的包揽,更加注重接受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等等努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要把政治体制的改革坚持进行下去,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使它逐步深化,使党的领导不断得到改善,更有活力,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只要我们这样做了,一切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阴谋就一定会破产。

四

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敌人颠覆的最重要的武器。专政当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所以,一切敌对势力对这个专政都无不咬牙切齿地恨入骨髓。他们攻击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暴政”、“独裁”、“专制”、“没有人性”、“集权”等等。他们打着资产阶级民主的破旗,以为用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作口号,就可以欺骗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势力,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一个手法,就是把民主和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好像只有民主是好东西,专政则是绝

对要不得的。其实，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自有民主政治以来，在政治体制上，民主和专政就是同一个东西，对这一部分人的民主，同时也就是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因为如果没有专政的这一面，也就保证不了那一部分人的民主权利。只是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对占人口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专政，所以他们不大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而总是想尽千方百计，把他们的民主打扮成“全民”的色彩。无产阶级则不同。因为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属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对象只是极少数妄想骑到人民头上压迫人民的人，所以我们总是不怕公开宣布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面对资产阶级打着“民主”旗帜进行的挑战，我们不但毫无愧色，而且应当主动地反击，问一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中，究竟是哪一个阶级更主张民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60 余年的奋斗历史，就是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结束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无权地位的历史。中国人民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包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100 多年，除了使中国身上增添新的压迫和剥削之外，又何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丝民主。如今却关心起在中国培养所谓“民主斗士”即方励之之类的卖国人物来，打的什么主意，不是一清二楚吗？查一查这些帝国主义的发家史，哪一个不是手上沾满着殖民地人民的鲜血！它们的炮火镇压了殖民地人民一次又一次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难道不是为了让这些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永远做它们的奴隶，而由它们来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美国的一些

政客至今还在全世界到处伸手，以世界的政治宪兵自居，又有哪一点民主气息？他们在国内的纪录也同样并不光彩。美国黑人、少数民族、贫苦工人、进步人士实际上的无权地位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些资产阶级政客们还有什么资格用“民主”作口号来攻击社会主义中国？

可是我们国内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一心要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移植到中国来，他们说“民主就是民主，没有东方西方的区别，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只要照搬就行了。他们说的话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因为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叫做“多数人统治”，其他各种做法、制度，都是从这个基本原则演化出来的。如果单说这一句话，确实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在什么范围内的多数和少数，又如何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都是为了保证政权落在资产阶级手中，无论无产阶级在人数上比资产阶级有多么巨大的优势，也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一套办法掌握政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表面上规定了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实际上往往又同时规定了好多限制，例如文化程度、居住时间、财产状况等等，从而“依法”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即使在经过反复斗争之后，这些限制逐渐被取消，他们规定的那一套选举办法仍旧能够保证把劳动人民及其代表排除在政权之外。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竞选，使得一个议员的当选如果不花上数十万、上百万美元根本就办不到。竞选总统的

花费就更多了。无论是到处演说，庞大的竞选会议，电视、电台节目的黄金时间，报纸的版面，竞选机构工作人员的开支，都不是一般劳动人民付得起的。那里的竞选政治实际上是金元政治，这就是人们作出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有一位同志到美国访问，在有市长和资本家共同参加的宴会上，一位资本家当众指着市长说，“他是我们花钱选出来的。我们选他就是要他替我们办事。”

这样的民主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会有什么结果呢？假定四通公司的前董事长兼总裁万润南和一位例如是建筑公司的劳动模范共同按照美国的方式竞选，结果会是谁当选呢？假定这个事情发生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前，万润南的叛国反共面貌尚未暴露，那么，可以断定十之八九当选的是这个万润南。因为他可以每月拿700、800元工资，坐着自己不掏钱的汽车，一年做200场报告；一个工人一天不劳动就没有工资，能同他比吗？万润南还可以花10来万元买一个研究所替他造舆论，可以拉拢一批记者和无耻文人替他吹嘘。这样做的结果，万润南的“知名度”肯定要大大超过那位劳动模范。即使是推一位教授来同他竞选，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分辨各种政治上的主张的最好办法，就是撇开那些花言巧语，直接看一看如果按照那些主张去做，结果政权会落到哪个阶级手里，究竟对谁有利。

所谓“新闻自由”的问题也有同样的道理。笔者曾经询问日本新闻业的同行，他们那里有没有新闻法。回答是，曾经有过，早已废除了。我说，那岂不是会出很多种报纸吗？对方告

诉我，理论上人人可以办报，实际上报纸数量很少。一个县一般只有一种报纸，个别县办了第二家报纸，一般也很难站住脚。全国性的报纸更难以创办。因为日本的报纸都要靠自己的发行网发行，没有大量的资金办不了。报纸的维持主要靠广告，资本家不支持，不到你那里登广告，报纸也要关门。结果是，名义上的新闻自由，叫做“大众传播工具”，实际上这些传播工具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记者的观点和老板不一致，不但稿件发不出去，而且会被老板辞退。而且，由于技术的发达，这些“大众传播工具”的影响比从前更大了，也更便于少数人来控制多数人的舆论了。这次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世界的舆论几乎完全一边倒，大量报道谣言，不但不肯登载我们政府发表的真实材料，就是他们自己的记者写的稍微客观一点报道，也不予发表。他们自己的记者拍摄的能够反映事实真相的录象镜头，也往往被剪掉，不予播放。群众得到的全是片面的、虚伪的消息。所以列宁把舆论工具被资产阶级掌握，同政府、法庭、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一起列为这些国家属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而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新闻出版自由时，总是把反对剥削阶级统治的自由，摆脱钱袋控制的自由放在首要地位。如果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拿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推行，结果也只能是谁有钱谁办报，最后报刊等舆论工具就只能纷纷落到帝国主义的走狗手里，因为他们的后台老板最有钱。工人、农民、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就会没有讲话的地方。动乱期间，国外反动势力送来的资金首先被指定用于

购置印刷、广播器材就是一个证明。

至于要求党报或者共产党办的报刊有反对共产党的自由，那就同要求资本家办的报刊有反对老板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自由一样可笑。自己花钱办报骂自己，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如果某些报纸的从业人员要求有这样的“自由”，那么共产党当然也有不雇用这样的人从事新闻工作的自由，或者停办这样的报刊的自由。

有人说，让记者编辑有闻必录，才能保证新闻的客观公正。这也是骗人的鬼话。11亿人口的大国，或者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每天要发生多少事，怎么可能做到“有闻必录”？事实上每一位记者，每一家报纸，对于事实都是有所取舍的。在这次动乱中，有些新闻单位就是只报道游行，不报道政府指出游行的非法性；只报道有人声援，不报道有人反对声援，反对绝食。这样的取舍能算是客观公正吗？

讲民主、讲自由，既然是把问题提到政治领域，就有一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方励之等人为魏京生翻案，做的是“侵犯人权”的文章。魏京生是个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的人，他出卖的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报，这件事不但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前方战士的生命安危。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是魏京生这个叛徒在侵犯前方战士的生命权——这是最重要的人权，他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斗士”，把他称做“人权杀手”还差不多。

一些人还模仿“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提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这也是一个骗人的花招。在物质财富

的分配领域，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按劳分配。由于各人提供的劳动数量质量是有差异的，得到的分配也应当有所不同，富裕程度有差别是合理的。但是也应当防止悬殊过大，更应当防止和纠正各种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政治领域，民主意味着人人有平等的权利。所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无非是说让某一部分人民权利比其他人更多些，也就是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有权的状态，而其他人则只能处在无权的状态，只能受这一部分有权者统治。这哪里是什么“民主”？他们所说的“先民主起来”的“一部分人”，指的就是他们那一伙少数“精英”。让绝大部分人接受他们的统治，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

这一场政治动乱到反革命暴乱，可以说正是这种反民主理论的实践。一部分人长期占领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任意胡作非为；到处设卡，任意阻拦行人和交通车辆通行；肆意散布反革命谣言，诬蔑、攻击、谩骂国家领导人，不准别人说一句公道话，最后发展到打、砸、抢、烧、杀，残害人民解放军战士。这些所谓“民主斗士”还没有真正把政权拿到手，就如此残暴，他们要争取的“民主”是什么货色，难道还不清楚吗？

五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的。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然要竭力否定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他们采用的一个最通用的语言，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好像在20世纪80年代再信奉100多年前的老祖宗创立的理论，就是一件可笑的事。可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用来作为思想武器的理论的创立者，无论是萨特还是尼采，或者是凯恩斯，也都是早已作古多年。至于资产阶级那一套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论，年龄比马克思主义更要老得多。这些东西，当年诞生之初，在同封建主义作斗争当中，确有它的进步性。随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这点进步性早已丧失殆尽。我们国内的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不嫌这些东西“过时”，反而冠之以“新思潮”的美名，到处贩卖。他们颠来倒去，就是念那几句咒语，才真是僵化呢！

一种理论究竟是不是“过时”本来并不是以这种理论创立的时间来决定的。关键是要看这种理论能不能说明当代的实际，能不能正确地解决当代人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人类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会有许多新的认识来代替旧的不适当的认识。同时，在人类认识长河的每一个段落，也都会有若干包含绝对真理的认识，成为后来认识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开始来奠定他们的学说。无论当代资本主义比之100多年前有多少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那些基本矛盾有哪一个解决了的？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有哪一条是不适用的吗？更没有。我们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注意当代社会与100多年前的巨大差异，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新的实际相结合，推动

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这样做，正是马克思主义伟大生命力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对真理的终极认识，而只是开辟了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它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的创立就是吸收了人类认识的各种优秀的思维成果，它也自然要不断吸收人类认识的各种新成果而使自己不断地得到发展。那些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人们，大抵并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至少是并没有真正读懂，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自己囿于某些著作中的个别词句，甚或是某些辗转的引文中看到的个别词句，是没有资格埋怨马克思主义本身“过时”的。倒是那些“各领风骚两三年”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最新理论”，从来也没有能解决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问题，便被人们抛弃，被更新的“最新理论”所代替，从来也没有合过“时”，它们的问题当然不是“过时”不“过时”，而是在根本上就是“背时”的。

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再一个手法，就是一听到马克思主义就骂“教条”，好像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教条主义的代名词，好像讲了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学术和艺术的发展、繁荣。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的人呢？当然是有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各种学术理论观点，都可能发生有人把它们当作教条使用的情况。难道能够因此宣布所有的学术理论观点一概都是“教条”吗？应当说，就其本性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最同教条主义不能相容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同教条主义

作过不懈的斗争，历来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始终在为这个主张而奋斗。正是因为这样，才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经过一个个险滩、取得了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科学，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之后，又经过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补充、发展，显示其无限的生机。那些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人，却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发展又表现出绝对不能容忍的姿态。照他们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农民思想、儒家思想，甚至是封建思想，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更是封建专制主义，更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连列宁主义据说也不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也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了。然而还不行，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能准确地预见到今天世界发展的一切情况，即使不能否认这些内容属于马克思主义，至少也属于不能坚持之列。那么还剩下什么东西呢？有人说，还有“实事求是”四个字，然而这又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有人说，还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然而这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这样一块一块往下剥，把马克思主义分割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否定，直到什么也剩不下，就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一种颇为得意的手法。

其实，这是一种很拙劣的手法。任何一个发展中的事物，在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必然会显示其与其他阶段不同的特

色，同时又保持其作为这一事物的根本性质。可以说，事物的根本性质正是通过这些特色表现出来的。没有这些各具特色的表现，事物的根本性质也就不存在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人，他们的思想难免会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抓住这些东西，加以夸大，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本身，叫做无的放矢，至少是找错了对象。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错误，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错误，实际上只能证明“证明”者的无知和荒谬。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不同的实践中去的时候，都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同这些不同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对他们的实践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充实。一棵大树，离不了树根、树干、树枝、树叶、花、果。每一枝每一叶，当然不能等于大树的全部，但是决不能说它们不是大树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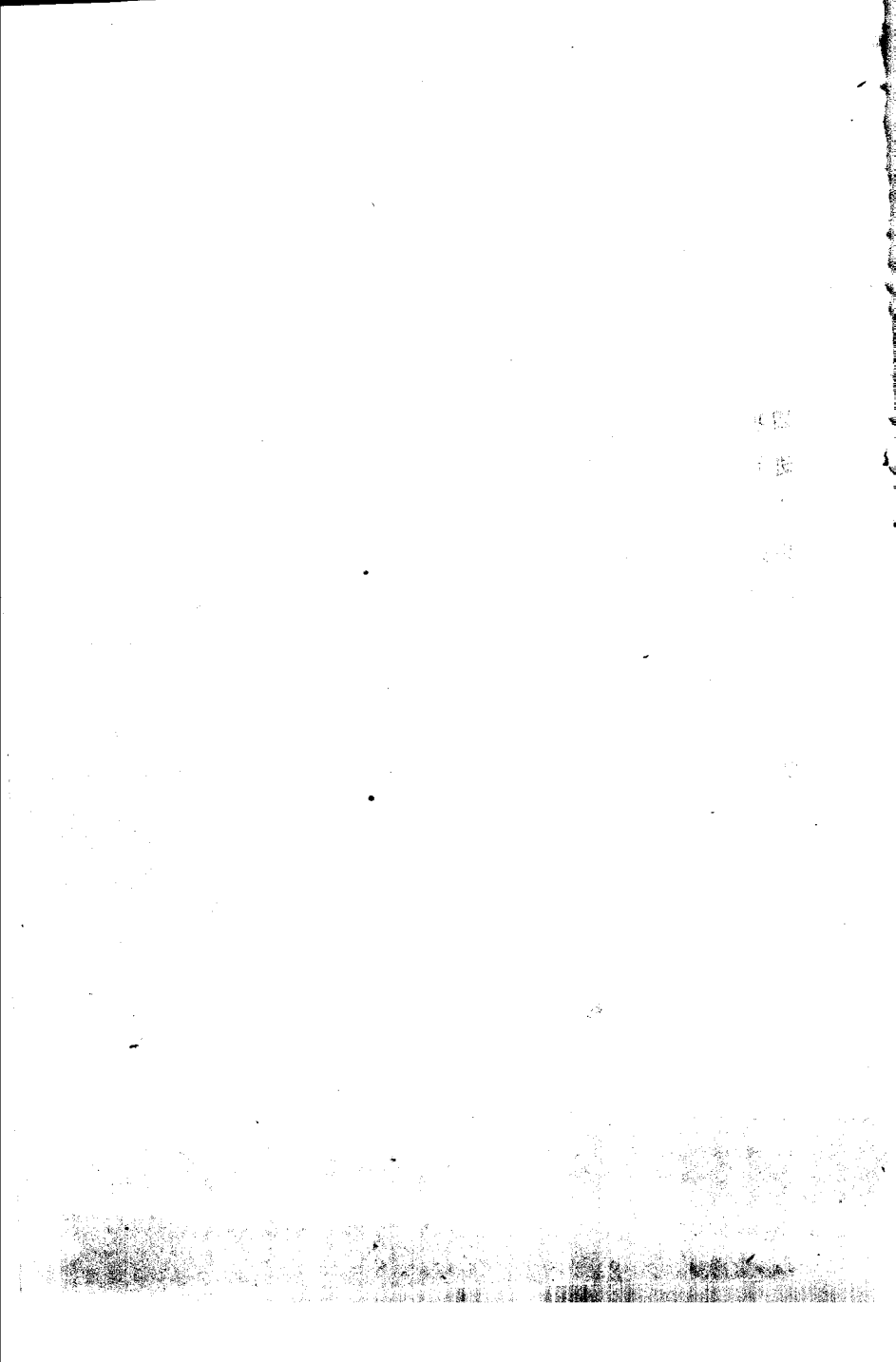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不过 100 多年，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是极短的瞬间。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在这极短的瞬间中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主要的是，在这极短的瞬间中，马克思主义所掌握的群众人数之多，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实践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改变之大，是有人类以来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比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也会有潮涨潮落，也会有高潮和低潮，而不会永远是直线式的发展。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种事情无论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 100 多年的历史中，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70 年的历史中，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历史的每一个转折，都会向马克思

主义提出新的挑战，都会有十七八种歪理跑出来企图与马克思主义竞一日之短长。然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就决定了它总是要胜利，总是要赢得人民群众。每一次斗争都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充实和发展。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艰巨的斗争还在前头。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需要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扎实地迎接挑战，认真地研究和回答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从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中抽出新的结论。其中就包括认真分析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谬论，研究它们是怎样产生的，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是怎样歪曲事实的，采用了什么样的错误的论证方法，是怎样欺骗群众的，上当者的思维方法失误在何处，怎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能够团结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热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志士仁人不可回避的任务。发生了这样一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一批反面教员跳出来给我们上课，一批反面教材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做好这件事，我们民族的政治思想面貌，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都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我相信。

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

一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3
二	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8
三	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40
四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61
五	攻击人民民主专政·····	96
六	污蔑民族传统文化·····	111
七	主张全盘西化和殖民化·····	126
八	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	139
九	煽动学潮和动乱·····	177



一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极力反对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他们贬低四项基本原则，说它“不能推动改革进程”，“不能保证良好的政治”，甚至把四项基本原则含沙射影地污蔑为“极端残酷的暴政”；他们诋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庸俗的敏感症”，表示要“昂首挺胸”反对“四个坚持”；他们千方百计地丑化、抵制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胡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违法”，叫嚣“我就要自由化”、“化得越大越好”；他们拚命鼓吹“多党政治”、“三权分立”、私有制、资本主义的腐朽意识形态，并企图从宪法中“去除”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原则’和‘坚持’”。

“反精神污染”当然是搞得不对的。有人说这是不成功的一次文革。中央也承认只搞了28天。只搞了28天就短命，没搞下去。

方励之，1985年3月在浙江大学的讲话。

难怪人家对我有看法，说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现在这个名声我感到光荣，没有啥格难为情。

王若望，1985年4月19日在上海城建学院的讲话。

由于我们往往轻易地对某些新见解扣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使我们的思想受传统方面的束缚太厉害,不敢也不善于从实际生活中进行理论概括,致使现在理论落后于实际。

苏绍智:《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

“自由化”这个词,来源于西方记者。最早大约是在评论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情况时开始使用的。也许是由于具有这样一种可疑的“出身”,因此,它一直被看作一个贬义词,甚至被看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于是,针对着它,就提出了“反对自由化”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据说是用以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

这在理论上是无法解释的。自由化同反共反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从来没有人对此作出过理论上的证明。相反,这种无法证明的“理论”,倒是导致了一个在形式逻辑上不无道理但在实际上却十足荒谬的结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不要自由的,自由仅仅属于资产阶级。

.....

这样看来,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自由化同反共反社会主义相联系呢?有什么理由可以阻碍我们为自由化正名呢?

“反对自由化”的口号,在“文革”中盛极一时,成为所谓“大批判”的最重要、最常用的口号之一。批周扬、批陆定一、批刘少奇、批邓小平……,稍稍翻一翻那些汗牛充栋的“批判”

文章,就立即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地道封建专制主义的口号。即使这个口号有时加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定语,叫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并不能改变其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对“反自由化”之类口号,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作仔细的清理,对存在于思想领域的远非肇始于“文革”的封建主义遗毒的批判,更非短时期内可以完成,“反对自由化”的口号一直沿用下来,有时甚至为专制主义的遗风所乘,在这个口号下,今天“清除”这个,明天“清除”那个,妨碍“双百”方针的实施,阻挠科学真理的探求。三年前起始于哲学界尔后波及整个理论、文艺界的那场风波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吗?因此,抛弃“反对自由化”(或“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口号,完全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李春光:《政治问题应当自由讨论》。《新观察》1986年第16期。

《决议》(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里头就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提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观念是好的,我们要的,但下面又来一段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是好的,“化”开来不更好吗?为什么不能行呢?

王若望,在上海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为了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它就需要工具,五八年提

出了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实际上后来全民要做党的驯服工具。雷锋同志就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极其有用的典型，我不是把雷锋说的一无是处，雷锋有很多好的品质，今天对我们仍然是十分需要的，也许对我们还可以引以自豪的，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精神。……不管怎么说吧，是个好人。学王杰、学欧阳海，在全国蔚然成风。其实，这就是一种清除精神污染。它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过去忘掉吧！你紧紧地跟着我走吧，做我的驯服工具吧。

刘宾雁：1986年11月7日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这次文件（注：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里头，我们可以坦率地说，这个文件有许多好的东西，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有许多地方大家很不满意，我也很不满意。就是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写上，这是非常不对的。这个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为棒子用的，但是没有去掉。

方励之：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绝对地看。四项基本原则有许多补充，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明确的理解。它是一种信仰，实质上是多样的。……牛顿说过“第一推动”就是上帝，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绕过一个困难。我说我们现在也有“第一推动”，就让它“第一推动”吧！我觉得大家都明白我

说这个话的意思。

同上。

改革只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民主上的标准来看这样做是不是促进。至于叫什么东西我认为根本无所谓。叫做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也可以。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定义的。四个坚持都是没有清楚内涵的。如果说中国不好弄，目前你不要走极端，说四个坚持你把它扔掉，现在很多人甚至会砍你头。你可以说这就是四个坚持。管他呢！

方励之，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关于四个坚持问题，现在是政治领域里的一个信仰，……我主张大学应具有民主、科学、创造、独立，……现在有些人在四个坚持上有一种庸俗的敏感症，一有什么发展就与其相比，看有何矛盾，所以我可以加一句话，其基本内容是：难道科学、民主、独立、创造和四个坚持矛盾吗？如果矛盾，那四个坚持就主张跟科学相对的迷信，跟民主相对的专制，跟独立相对的依附，跟创造相对的保守。

方励之，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1983年发起的清污运动，原是中共某些保守派急于堵住从横肚里杀进来的一股西方思潮、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次尝试，……他们依然捡起毛泽东用烂了的打棍子、扣帽子、

搞大批判以及除四旧等等鲁莽手段来清除“资”字号的“精神污染”，结果只维持了两个月的声势，在一片反对声中，只得悄悄收场。

王若望：〈驳熊复、胡乔木——评“横比有害论”〉，《百姓》，1987年7月16日，第148期。

中国大陆目前正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传统的、封建的东西；二是40多年马克思的文化。近期要解决这些问题很困难，中国应怎么搞，没有解决办法。

四项原则是不能推动改革进程的。四项原则的定义就不清楚，什么叫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方励之：1988年8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讲话。

我可以谈谈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做过什么事情，我可以简单说一说。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大学里头，所有大学教学都有教学大纲，西方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教学大纲中有引言，下面一样是什么热学、力学、电学，前面都要加一段，我这是物理学教育，是为学生培养共产主义理想，所有内容符合“四个坚持”，都要加这么一段。那时我还没当领导，有一段时间当物理教研室主任，我把所有引言都给去掉。我说“四个坚持”最多是政治领域里坚持，你管不着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根本不需要你管，我都去掉，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方励之：大学的作用——科学、民主、创造、独立〉，《动向》，1988年9月第52期。

反左大概老百姓不会反对,反右的话我相信搞不起来,有一种情形就是有可能大家开会而不说话,喊口号没人支持,这个情况从批白桦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假如有人把一个人定为右派,而我认为不是,我会跳上桌来和你辩论,这个局面也可以在反自由化时看见,大家已经不再甘心沉默了,文化界知识分子会站起来提出抗议,提出质疑。

刘宾雁语,载香港《文汇报》1988年8月7日。

民主就是要靠法制来保障。比如说,中央所谓反对什么自由化,就是违法。因为学生游行是绝对合法,宪法也有规定。但突然又多加了一个什么“十条”,这就是违法的举动。

《方励之谈中国走向富强之路》,香港《明报》1988年9月17日。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

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妥协的产物。你比如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还在提,你要否定这个现在还不行。

刘宾雁: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85年又是一场没有名目的、没有标签的所谓打击经济犯罪的政治运动。而清除精神污染,也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一场没有名目、没有标签的,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运动。

王若望:1986年10月28日在上海松江县文化馆的报告。

讲我王若望自由化,我无所谓,我觉得蛮好。现在我们大学生都跟着自由化走,蛮好,蛮好!现在自由不够,有啥风吹草动,橡皮绳子、尼龙绳子、铅丝绳子噼叭叭啦又来了,他手里没绳子,他就有点日子难过,就好像我不吃香烟一样。

王若望:在上海同济大学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话不通。自由是好的,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自由。化得越大越好,化小一点就差一点,并不坏。所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对“四人帮”粉碎以后的一股要求民主、要求法制的力量的压抑。

王若望:在梅山《青年笔会》上的讲话。

这个自由不简单啊!我在会议上就没有这种自由,在家里我又有了自由。……现在连男女婚姻自由都没有做到,阻

碍的往往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我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辩护，我就要自由化，不给我自由，我就要斗。

王若望：在上海《南苑》文学社的讲话。

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30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的必需的产权私有体制相容。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香港《明报》1989年2月9日。

现在的中国(大陆)当局继续忽视人权问题，而使得情形很严重。第一，而且也是首要的一点，中国(大陆)当局仍未完全承认，上述违反人权的情形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

例如，直到现在，他们仍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及“正确的”。自从那时以后，对于有异议的人的镇压和迫害从未停止。

1970年(原文如此)对民主运动的镇压，1983年间反“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此一政策的明显的例子。

方励之：《人权岂有双重标准》，《香港时报》1989年2月27日。

看看今天的改革，真使人感到忧虑。虽然，就经济体制来说有一条出路，即经济二元化，走股份化道路，民营化道路，建立个体制或者私有制。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显然不允许有这样的改革，就是说已经到了非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的紧急关头。可在这样的時候，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却还在绕弯子，热衷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可现在实在有比这急切的事务，重要得多，也实际得多的研究更需要搞——那就是冷静深入地分析中国的现状，研究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政治体制。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怎样重新确定我国的性质，执政党在40年中有什么变化，它的性质究竟如何，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和经典马列主义相吻合，它和人们和国家的关系究竟怎么样。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如何和私有制相协调，如何推进私有化进程；如果不适合，该用什么样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它，以什么方式取代，怎样说服人民放弃被灌输几十年的意识形态。

《时代的召唤》，1989年4月6日，北大三角地无署名大字报。

美国《新展望季刊》记者问（以下称记者）：中国知识分子在1956年百花齐放的时候，与在现在改革的时候，看法上会有什么不同？

刘：有很大的不同。1956年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相信共产党。他们现在不相信了。

中国知识分子在1956年从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睡梦中醒来，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联解冻的结果。他们当时了解到在文学和艺术中把生活理想化是一个错误。他们不再描写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好，转而描写现实的生活，描写“写实主义”所压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

荒谬的是，就在这个“新思潮”形成的时候，中国模仿斯大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条道路使中共变成了赫鲁晓夫正在批评的非常官僚的压迫机构。共产党不久就残酷镇压批判精神，直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灾难彻底摧毁了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信任之后，这种批判精神才得到恢复。

当知识分子的生命在1979年复苏时，距离1956年的双百运动已经23年，中国知识分子对党的信心已经根本动摇。

但是在1979年，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发展理论体系，用来支持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和报导认为毛泽东当政的年代一无是处，党的领导立刻认为，如果彻底否定毛，就会危及他们自己的权力。

邓小平不但没有开放意识形态，反而在1979年提出了四个坚持；这四个坚持一直到今天都在限制着中国的思想自由。

我在1987年被开除出党的理由就是违反了四个坚持。

记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在中国问过—一个21岁的学生，她只能回答说“热爱祖国”。

刘：中国有许多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口号，不

论叫的人还是听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

过去十年里，知识分子越为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奋斗，越被攻击为违反四项坚持。由于改革与毛的经济想法完全背道而驰，推动改革的官员觉得必须宣布一致拥护四个坚持。事实上，四个坚持写进了要保障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宪法，这是根本矛盾的。这种离奇的组合可能只会发生在中国。

记者：中国的改变这样进两步、退一步，是什么原因？

刘：从1979年以来，反自由化就是松松紧紧，时收时放。差不多每年都有反自由化运动，但每次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小。

这些运动都是反对改革的，都来自领导阶层的一派。显然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弱了。

《胡耀邦代表的党内力量加强了——刘宾雁谈中国政局》，香港《九十年代》月刊 1989年4月号。

无可讳言，今日中国存在着种种危机：有政治危机，有经济危机（物价、通货膨胀、官倒等），有教育危机（辍学、厌学率高，教育经费、教师待遇太低，新文盲数以亿计等），有人口危机等，但归根结蒂都与政治危机有关，……

如何使中国政治民主化，多元化，现代化，我认为必须实行以下四点：

(1) 多党政治。中共领导总以为持此论点与所谓“四个坚持”相悖，实为大逆不道，我以为中共所谓“四个坚持”，其核心为坚持中共的领导，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及地方高层人士将永远居于特权地位，中共即使犯再大错误再错于治理，也将永

远保证处于领导地位，这是什么逻辑？美国大选一次只管4年，中共统治大陆已40年，为何不能诉诸民选？可能有人说天下是老子当年用枪打下来的，这话不错，西方先进国家实行的是“票选”，而40年前的中国大陆实行的是“枪选”，那时中共赢得了民心，也就赢得了“枪选”的胜利，但是一个国家不能经常搞“枪选”，必须由“枪选”改为“票选”，而且40年前得人心并不能证明以后永远得人心，如果中共坚持它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那就使人想起了西方中世纪的“王权神授”说了，因为那时“王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中共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那岂不等于说“党权神授”，这就倒退到几百年前的中世纪，离现代太远了，……

中共领导又会反驳说“多党制”不利于安定团结，怪哉！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苏联和中国不是实行了多年的一党制吗？有安定团结吗？……“多党制”起互相监督的作用，这正是一党制所办不到的，……多党制也比一党制更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团结。

至于现行宪法，它既在序言中说要坚持中共领导等四项基本原则，又在正文中说要保证公民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等自由，这是于理不通，不合逻辑的，故中国人民需重新制定能反映人民意愿的新宪法。

有人说“多党制”不合中国国情，此谬说也。因为今日中国已有大陆之中国共产党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如果说“多党制”不合国情，不能存在，那么请问：将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统一后，岂不势必将取消一党而只留一党，是取消国民党耶，抑取

消中共耶？想必这都是不可能的。故多党制本来就曾存在于解放之前，也将存在于中国统一之后。此正中国之国情也。当时孙中山章太炎倡导革命鼓吹共和，康有为不是也曾为文反驳说，革命和共和不合中国国情，只有君主立宪才合中国国情吗？事实也证明康说之谬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不是也有人高喊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吗？故所谓国情论者实不值一驳也。

(2) 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现，是资产阶级推翻中世纪封建专制，打破了国王贵族和僧侣的反动统治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可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此均估计不足，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要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用什么去代替？没有说明。列宁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就使三权分立倒退三权合一了。果然，后来斯大林就集党、政（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军诸大权于一身（甚至垄断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解释权），这正是斯大林时代的悲剧的根源。

(3) 自由选举。中共领导会说，自由选举不利于安定团结。此谬论也。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确无自由选举。所谓选举，不过钦定名单，选民划圈而已，可是又何曾有过安定团结？美国选举最多，可称得上选举之国，有大约100万个职位需要由选举产生，每年需进行各种选举12万-13万次之多！但这无碍于美国社会的安定团结，更无碍于它的科学和经济之迅速发展。或许相反，选举有助于美国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看来只有实行自由选举，一切诉诸选民，而不是一切诉诸权贵，这才是挽救中国政治、挽救中国社会之良药！

(4)新闻独立。也可称之为舆论监督权,也可说是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我以为今日中国如允许独立的民办报出现,废除报刊审查制度,真正做到言论出版自由,这必大有利于中国政治之进步,必大有助于社会风气之转变,对今日中国政界中的世袭风、裙带风、官倒等等弊端恶习,定能收舆论监督之效,这将是毫无疑问的。

《论今日之中国》,1989年5月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

二 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百般诋毁。他们恶毒地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过时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已经死亡”，“像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必须完全扫除，而且愈快扫除愈好”；他们矢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胡说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是错误的”，只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和“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而唯物辩证法是“最含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肆意抹杀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胡说“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实践，都得到错误的结果”，“‘老马’为害中国30多年，使社会主义建设交了白卷”；他们歪曲“双百方针”，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胡说在“百家”范围里“马克思主义至多只能是一家”；他们攻击、否定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的改革已经明显同马克思主义相背离……在必要时，对祖国前途有利的主义为什么不能高声呐喊？

方励之，1985年3月12日在浙江大学的讲话。

在一个大学环境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真理是要比外边更加放开；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作为正统思想不能突破。这就是一个大学讲台必须有的特征。有个年轻同志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就是“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一个优越的参考系”，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如果大学不出现什么思想，那么这个大学就没什么意思。所以大学就不应受某些思想的约束。对任何一种思想我们都可以提出疑问，加以研究和发展。

同上。

我很主张大学里头要有多样化的思想，多样化的流派。如果我们一切都是单一的，是排他的、狭隘的，必然造成没有创造性。创造性一定是在多样化的、宽容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确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势力仍然用这种排他性的、狭隘的东西指手划脚，还打着一个旗号——叫做“马克思主义”。但我们要说，你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你那个起码连杜林还没有达到。杜林是一百年前，你就是一百年后。这种东西我就要彻底揭露他。对这些人，你要说，我就抽你的。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发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职责。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要站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职责。

方励之，1985年11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这些年我们关于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宣传存在很大问题。我觉得在我们的理论体系中、宣传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共产

主义宣传得太有排他性,或者说比较狭隘,实质上也就是比较浅薄。……我们追求更合理的社会,那应当是多样化的,不是排他的,包容着人类一切精华的。这些年宣传的排他性,造成我们现在文化上的贫血症、精神上的贫血症。

同上。

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学生冲击社会,慢慢社会上一些陈腐的观点就会退位。而且老实讲,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他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句话可能说得有点狂妄。我们宇宙学占有的真理东西比上世纪恩格斯总结的东西多多了,我们这武器多得多!所以有些东西就貌似强大,我要领导一切,实际上你只要捅一捅它,就觉得它并没有多少东西。这是我十几年的经验。捅的结果是,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

方励之, 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

唯物辩证法在中国被发展成不给出明确答案的,保证自己永远正确的一种辩论方法。……这种“模型”尽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它最没价值。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统是最含糊、最没价值的东西。

同上。

我觉得我们国家对知识分子开始起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

力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我就是五十年代的。我觉得他们好的方面是理想主义比较强,但是很差的方面就是驯服工具、非常差,这个驯服工具也是在党、在马列主义一套标志之下的。还是封建的一套,完全一样,就是依附,没有独立人格、缺乏独立。

方励之,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不应当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中就是大家探索真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家。对我国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多的涵义就是领导的指导,实质就是政府的指导,或当权者的指导,或者是党的指导。这更不需要。

方励之,1986年11月1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什么是狭隘性?虽然我们平常谈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但在实际说法里认为只有马克思以来人类才真正认识真理。或者说更窄,把马克思主义也抛掉,只有在解放以来,我们所有事情才是做得真正好的事情,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把所有提到的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以及现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发展的东西都加以否定。

方励之,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能指导自然研究？我觉得没有，也就是说它没有指导地位，在百家研究范围里马克思主义至多只能是一家，没有居于一切之上的指导地位。

同上。

这几年来，我们中国就是一条腿很长，经济这条腿很长，步子迈得很大。政治这条腿很短，意识形态这条腿也很短。经济改革是一个崭新的，……但是，在它的这一切是落后的体制，过时的体制；在它这一切，是过时的意识形态。就是那个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很可悲，恰好是我们自己自命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个革命的中心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停滞了，它的发展停下来了，而世界上其它国家，各种各样的流派，各种各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蓬蓬勃勃发展，你不管它怎么样，它总有一点合理的东西在里头。

刘宾雁，1986年12月4日在《福建青年》复刊百期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后我要说，人只有站在废墟上，才能以最理性的目光看待一切，怀疑一切，从新开始。

刘晓波，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问：您起初攻击地方上的干部，然后是北京市党委会，前不久是政治局。您的下一步攻击目标是什么？

方励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用处了，这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作为科学家，我可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回答过时了，有一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确凿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对自然科学发表意见的东西，都源出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你在这本书的差不多每一页上，都能发现不现实或者错误的东西。

这不是仅仅指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问题上也失去了它的权威。我是公开谈论“马克思主义异化”的第一批人之一。

问：邓（小平）1979年根据中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应遵守四项原则，……

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它有利于理解上一个世纪的问题，但不是今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一定文化时期。它像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

问：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紧身衣，中国不能从这件紧身衣中发展成一个民主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

方：如果原则是僵死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领导自己讲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抓住了这句话，如果原则会被发展，我们能够坚持这些原则。

问：但是在今天的权力结构内，如何实现根本的改革？

方：可以保留形式，改变其内容。新教反对天主教而实行

宗教改革,但继续利用同样的圣经,在中国我们可以如法炮制。挂羊头卖狗肉。

方励之与西德《明镜》周刊驻意大利记者邓天诺的谈话,1987年7月27日。

从他们的发言就知道,他们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就心虚了,下决心就行,没有根据的,可是这就很危险,是拿十亿人民的前途来开玩笑!改革哪能没有目标?没有途径?总有一定的规律,要调查、准备、计划,不能拿十亿老百姓开玩笑。

方励之在启德机场答记者问,《百姓》1988年8月。

尼采说:读过我的书,你会发现世界无意义,有意义的只是你自己。

维特根斯坦说:读过我的哲学,你会发现世界无哲学,哲学仅仅是沉默。

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一起对亚里士多德说:形而上学是一团遮掩太阳的迷雾。

我说:中国当代哲学仍然在迷雾中徘徊。

刘晓波,《哲学的反思》,《当代电影》1988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据上个世纪自然科学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总结出来的总规律。但今天自然科学变化已经很多,……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断已经完全过时了。比如说剩余价值这种概念,现在证明是不对的。至于科学社会主义这种

理论,事实已经证明,它的结果都不会成功。

方励之语,载《香港时报》,1988年9月9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了。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话,中共领导既不信,也不懂。年轻的一代完全不信马克思主义,中共领导也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之中国没有用处,他们的目的只是保住手中的权力。

方励之接受前澳洲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采访的报道,香港《争鸣》第131期,1988年9月。

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实践,都得到错误的结果。列宁主义推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可是依照列宁主义所建立的每一个国家都不成功,结果都是错的,可见其根本原则是错误的。中共还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人作为维护他们权力的根据。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

《方励之谈大陆知识分子处境》,《香港时报》,1988年9月6日。

我想只要是做科学的人,至少基本事实他会看的。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我们40年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都是不成功的。这是任何一个睁开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比如,澳洲这样,发展了200年是什么样子?苏联说的是怎样、怎样,但实际上怎样大家是看见的;中国,实际上仍然是在贫困国家的行列中。哪怕对比台湾——国民党也并不是愿意民主的;但

对比起来，你比他还差。所以大家感到这个理论普遍都有问题。不是单独在中国有问题，不是在哪一个省有问题。你所有的结果都是不成功的，那怎么能说你的理论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呢？所以大家就怀疑。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它认为所有东西都能管，所以只要作一点突破，就可以相信它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管用的。

问：事实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行不通，现在中共仍死抱着不放又是为何？

方：这很明显，共产党要保住他的权力。没有马克思，一定要让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根据。

〈方励之：我不再入党了〉，香港〈争鸣〉1988年9月。

独立的观点就是说，在大学里传授的知识，或大学里创造的知识，这种创造过程或学习过程，应当是独立的，也就是说，需要有独立的价值标准，不依附于政治，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正统的思想。

〈方励之：大学的作用——科学、民主、创造、独立〉，香港〈动向〉1988年9月52期。

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均已过时，而且错误。

方励之语，载〈香港时报〉1988年9月9日。

物理学的方法是从错误的观念出发，得出正确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从正确的原则出发，得出错误

的结果。

《方励之谈中国走向富强之路》，香港《明报》，1988年9月17日。

我觉得，其实共产党内部自己也没有正统地信过马列主义，我在当时相信还可以在党内做些事情，所以，我跟学生说要入党去改变它，不少人入党也有这种看法。

方励之语，载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8年10月号。

外界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为（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一个非常强的判据，而实际上不是那种情况。

同上。

问：你现在觉得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

方：是，是。

问：有人说现在是理论真空，他们认为要用来填补？

方：我估计中国在思想观念方面，慢慢会走向多元。中国传统有一个正统的观念，比如说某个时期是儒教，后来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正统非常强，我想，中国现在已经没有正统，年轻一代追求各种各样思想，也有追求宗教，也有追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都很不成熟。这趋势形成中国信仰也开始多元化。

《方励之和我们交谈——记方励之夫妇与本刊同人在一起》，香港《争鸣》，1988年10月号。

方励之接受法新社记者访问时，把毛泽东比做苏联已故大独裁者斯大林，他说：“毛泽东所干的与斯大林所差无几。”不过，他认为只要中共革命元老仍然掌权，中国将难以如苏联抨击斯大林那样积极地消除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影响。

52岁的方励之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批评毛泽东就等于批评他们（革命元老）本身。”他继谓：“我不认为这一代人掌权期间，会采取大的步骤批评毛泽东。”不过，他声称，毛泽东被遗忘只是迟早之事。

香港《新报》1988年10月20日。

如果说，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对以四个坚持为纲领的改革抱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近几年来，随着开放度的扩大，随着改革的屡屡受挫，人们便真的从心底里怀疑共产主义的信仰了。放眼世界，凡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都面临着政治上、经济上、信仰上的危机。政治上，一党专制面临危机；经济上，计划经济面临危机；精神上，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但是，那些在独裁的位置上享惯至尊权力的统治者们，又硬着头皮不愿全面放弃过去的一切，同时又阻止西方思潮，特别是思想上的各种思潮的进口。换言之，一方面是当代国人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支柱——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另一方面，现在的当权者又依仗手中的强权坚持马列主义，不允许人们在信仰上进行自由选择，也就是不允许西方的某种思想取代共产主义。这样，当人们在抛弃马列主义信仰而要寻求新

的信仰之时，西方的学说又被扣上“自由化”的政治帽子。信仰西方的某种思想有政治上的危险性。

刘晓波：《在“气功热”的底层》，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0月号。

我以为，几千年高度政治化、权力化的社会体制，很有可能使一切非官方的东西最后都被权力化。“独尊儒术”和“独尊马克思”不都是非官方的思想体系被官方化的实例吗？……我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现实看，在思维方式和生存上抛弃一元的独尊，而走向多元的信仰自由，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同上。

真正的信仰是不受权力干涉的，信仰什么是每个人的自我选择，掌权者无权为全民选择信仰。但是中国恰恰相反，信仰是由官方确定的，信不信不由每个人，而是不想信也得信，起码在表面上要装出一副信的姿态。因而，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同上。

事实证明，今天马克思主义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现实提出了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回答不了。

.....

马克思主义是过分的理性主义，认为世界一定和它所认识的那样，以后的发展也会沿着它所认识的和设想的走下去，

于是导致了实践中的唯意志主义。……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十九世纪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而绝不是单一的指导思想。

张显扬：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主办的《传统与现代》报告会上的发言，香港《争鸣》，1988年12月号。

我只能说一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辨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种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刘晓波语，载《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

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同上。

马克思给我唯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

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想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同上。

80年代上半期对“人道主义”的猛烈批判,使中国思想世界的上空布满阴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构成因素”的深入思考。长期以来,在中国,正确的思想必须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才能传播。为了传播“人道主义”,一些思想家就起来宣传、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然而,一些“理论权威”想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垄断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卫道者自居,把“人道主义”宣布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大加鞭挞。在思想世界中,事实上,人道主义是先于马克思主义而存在的,是为全人类极为珍视的一种价值。

“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翻版。在“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上,一些人坚持认为,人道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作为世界观,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我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成果。人道主义是把人和人的价值属于首位的观念。

严家其:《我的思想自传》,《新华文摘》1989年第1期。

清除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和已被证实不正确的理论,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一项真理:破坏靠“老马”,建设靠“走资”,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不管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老马”的历史任务已经终结,现在正走向反面,阻碍了历史前进的道路。

在这个重大的严肃的课题上,方励之和王若望等著名知识分子都提出了他们的观点,肯定“老马”为害中国30多年,使社会主义建设交了白卷。方励之说:“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我们40年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都是不成功的。这是任何一个睁开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比如,澳洲这样,发展了200年是什么样子?苏联说的是怎样、怎样,但实际上怎样大家是看见的;中国,实际上仍然是在贫困国家的行列中。”方励之是一个科学家,他根据事实对马克思所作的批判,是谁也没有办法可以否定的。你把他从科技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上打下去,把他和学生隔离起来,但是你打不倒他的理论,你隔离不了他与学生的思想联系。只不过在党内民主的历史上,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

王若望同志在1986年11月5日深圳《特区工人报》发表文章说:“过去几十年中,我党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目标一直是

批资产阶级。那时我们批倒批臭资产阶级的理论，少不了总要讲到资本主义的丑恶和腐朽，有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还有大鱼吃小鱼的残忍和并吞之类。其实，资本主义世界在最近20年中已采取一系列步骤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调整的措施在美、日、法、西德和北欧诸国已初见成效。在以上诸国，马克思所说的劳工的绝对贫困现象已趋缓和甚至消失，在‘贫困线’下的失业工人，国家则设有相当于本人工资60%至70%的救济补助。据瑞士的著名经济学家林德博士说：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多数人进行剥削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马克思设想把资产者无产化，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西方社会却把无产者资产化了”。

王若望的文章十分有力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也说明马克思把资产者无产化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反动，而资本主义使无产者资产化才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两相对照，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善谁恶，不是一目了然吗？相反的是，现在我们要批倒批臭的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因为它的丑恶和腐朽远远超过初期资本主义时代若干倍。

《破坏靠“老马”，建设靠“走资”》，1989年1月一教授收到的来自美国的传单。

我认为，清污和反自由化是10年来理论界最重大的问题，很多同志都要求澄清。其中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如人道主义、如异化、如布哈林、如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以及如反封建主义遗毒等等。这些都是学术理论观点问题，但是当时不但用一家之言，甚至用一人之言来定了学术理论的是非，而且还因学术理论问题而打了政治棍子，对许多学者做了不公正的政治处分。这是冤案，不是一句“不要纠缠过去”所能了结的。

这10年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叫学术大批判的学术大批判还是有的。最大的两次是“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实质上还是“学术大批判”的翻版。……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念和信念已经在许多方面与现实发生矛盾，令人怀疑其是否有效。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提不出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说明和足以应付挑战的战略措施，它作为一种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理论已无力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和各国人民群众乃至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吸引力。

苏绍智语，载香港《镜报月刊》，1989年1月号。

王若望、方励之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虽然仍是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干，却已然成为明日黄花。

方励之说：“中共领导人甚至比人民更早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对他们而言，唯一的准绳就是权力。”“在50年代，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内，人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但这种信念如今已然灭绝。毛泽东相信马克思主义，也只是相信它是掌权

的好工具而已。”

王若望说：“毛泽东思想，斯大林思想和老旧的马列主义，必须完全扫除，而且越快扫除愈好。”

据法新社上海1989年2月12日电。

他们早在人民之前已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唯一的信仰是权力。

毛泽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权力的工具来信仰。

方励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死亡》，《香港时报》，1989年2月13日。

在一个一元化的、专制的社会整体中，即便是最好的理论也因被绝对化而丧失其正面价值。中国人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用偶像化来扼杀世界上有价值的思想。中国人同化现代文化的手段极为有效：第一步是把某种西方的思想从其多元整体中选择出来（也就是分离出来）纳入中国文化的整体之中；第二步是把分离出来的思想绝对化、偶像化。也就是把多元整体中的一个因素变成一元整体中的绝对权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便是如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处在与其他主义平等竞争的地位上。但是，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所接受，便成了独尊的思想权威，其地位是最高的、唯一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敬畏、服从、注释，就像汉代经学、宋明理学对孔子的态度一样。即便是发展，也只能以不改变其绝对权威的地

位的条件下的发展；即便是修正，也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马克思主义之外无真理。这样，马克思就不仅仅是思想偶像了，而且是权力的象征。

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的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2期。

我说北大倒是没有“反革命”这么一门课，但是讲了物理就相当于讲了“反革命”课一样，因为讲了一种方法，教了一套看问题的逻辑，这种东西实际上与“宗教”式的信仰一定是矛盾的，因为现在仍有些东西实行“宗教”式的一定要相信什么什么，一定要坚持什么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为什么要坚持？我们学了物理的自然就是也要想一想，只要想了物理，这一套就会了，也就成了“反革命”了。

《他们的道路——方励之夫妇访问记》，香港《动向》1989年3月54期。

苏晓康发言时，先引用了一句俗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没有一个能逃脱得了的！”他认为毛的打击知识分子政策是极成功的，他把知识分子的筋抽了，整个打垮了。苏晓康说他至今搞不明白毛泽东的这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是由何来，他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无法得到解释，因为中国历史上是重视“士”的，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一种极端的仇恨。

香港《新报》1989年3月16日。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相信已不是对某种思想或信仰（宗教意义上的）的相信，而是对绝对权力的迷恋和屈服。因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一种思想或信仰，而是专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东方专制者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所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而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辩论则是直接为东方专制主义辩论。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专制者一天不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思想独裁，真正的觉醒者就应该一天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刘晓波：《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解放月报》1989年4月。

顺便说一句，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西方早已开始，并取得了可资借鉴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当代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项重要举动，没有这种批判，西方社会也不会损失甚么。但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和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决不是一般地需要，而是迫切地需要。因为在东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一种思想流派的再检讨，而是对作为专制主义的独裁工具的批判，是直接反对独裁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与其说我的批判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如说是针对东方式的思想独裁的。

同上。

问：根据外界报道说，你对马列主义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方：因为事实证明它没有成功。

.....

问：你是这样看，现在有没有这种人自己打出旗子来说我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特别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言之成理的，能够说服人的，在北京能不能找出这样的人？

方：现在还强调马列主义，无异是个笑话。

问：在你看来，马列主义是否过时？

方：当然是过时了，而且实践证明它已经不行了，马列主义君临一切之上的地位就要在历史上消失了。

香港《百姓》半月刊八周年纪念号，1989年6月1日。

严家其、刘宾雁、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等人，在巴黎倡议成立名为“民主中国阵线”的组织。专程由美国赶往巴黎的刘宾雁说，在成立民主中国的目标及旗帜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团结起来，不同政治信仰、不同主张的人团结起来。是支持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都不是该战线考虑的因素或界线，界线只在于赞成民主或独裁。

香港《明报》1989年7月19日。

列宁过去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是在沙俄的专制条件下修

改了马克思主义。两者都修改了马克思主义。

苏绍智：《制度造成了邓小平悲剧》，《百姓》半月刊1989年9月1日（第199期）。

三 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取消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的一贯目标。他们胡说“党已经变质了”，“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一种宗教”，“没有证据证明它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诬蔑中国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党的40年的历史，只是造成贪污腐化加深”，“对中国人民的专制统治的加深”；咒骂共产党“是一个即将溃灭之组织”。

他们叫喊“党现在是黑的”，要用他们“加入进去”的方式改变党的颜色。甚至公然叫嚣要“让别的组织上台”，“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在中国“实行多党制”。

我们自己也承认党内严重不纯。所以在年轻的同志里有很多人不愿意入党。我倒想对这些同学说：要想有志于改革，改变中国目前落后的面貌，……入党去更加方便。更容易改变这种面貌。只有靠我们这些人加入进去，才能改变它的面貌。

方励之：1985年3月在浙江大学的讲话。

我们现在的报纸都是受到一些领导的，譬如说，我们的

《人民日报》是受党中央领导的，是党中央的喉舌。《杭州日报》就是杭州市委的喉舌，这点我不加评价。科大校刊是我们学校的，它就不必是我的喉舌。虽然我是学校的领导，我自己有喉有舌，我有什么观点就可以去说服人家，我说服不了人家，人家就说服我，都可以。不要给我来什么喉舌。报纸就应当代表舆论；只有真正有了舆论，我们才可以有思想自由的环境。

同上。

对学生管理，我们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要拨转船头，改变方向，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所以不仅是观念问题，连组织形式都必须改变。取消政治辅导员也是这个目的。我们觉得政治辅导员并不是能做政治工作的那些人，有些很年轻的同志做政治辅导员，我们觉得这很可惜，作了政治指导员，业务耽误了。跟同学矛盾也很大，这种形式是害了一代人；两边都害了，把做政治指导工作的人也害了。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就是要不得。因此我们取消了辅导员制度。

同上。

我们的建党方针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建党方针是几十年前根据列宁的理论而定的，即首先发展工人阶级，因为农民是落后的。在现在的意义上，如果要建立先进的政党，应该发展谁？所以建党方针应调整，应当是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

部分，做党的工作首先是要发展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所以知识分子不但是依靠者和被相信者，而是一个推动社会的主导力量。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最好成为党的诤友，这当然是很好的了。但现在已经不只是直陈己见的时候，而是要求一种独立的地位，而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领导地位。

方励之：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

我赞成青年入党。有人说对党不满意，那你优秀分子为什么不入呢？加入就可以改变党的面貌。我记得说了这话后有一大人物反对说：“有人提倡大学生入党就是为了改造党”。其实“改造党”这说法有什么错？我们现在还要整党整风，就是改造党么。我们还要改造中国呢，怎么党就不能改造？把党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就是封建！

同上。

不光是这样，应当变颜色，就应当，因为党现在是黑的。……我也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我刚才说了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

方励之：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实际上监督立法中国都有，中国宪法老实讲，也是三权分立，……当然有一条矛盾就是共产党领导，这一条最后

里。

同上。

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我想是所谓权力的中心和道德的中心是合二为一的。现在共产党就是这样。它不但认为自己是权力领导一切的，而且认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自己就是道德的最高标准。所以有权就有道德。

同上。

独立精神的涵义，我认为大学至少在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中应该独立于政府和领导。我们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相当的不独立性、工具性，主要是长期封建式的培养，知识分子本身也被异化。

方励之：1986年11月1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文明社会里，知识分子越来越占主导作用，应该认识到自己对社会负有的责任，要发表意见，要表示态度。我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意识的重要方面，不受任何非科学东西的干扰，要从科学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的社会。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往往起着参与与干预的作用，或介入社会，他不是当政的，但是他有独立的作用。这种意见和作用，政府是非常重视的，不

但从学术方面,各个方面都是这样,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实际还没有达到这种地位。这种精神首先应在大学生中培养,有了社会责任感,有了知识,就要对社会干预、介入,当然要从独立角度。

同上。

中国共产党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改也得改,看其所作所为,改不改不取决于某些领导人,而是历史的推动者。我看了东、西方后,认为途径多种多样,不要一讲改变,就想到枪杆子。

方励之,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自己独立的意识,由于我们自己具有这种知识和对社会的判断力,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不应受到外来的这些非知识的指导和干扰。由于我们长期受封建的影响,由于知识只是经常作为依附的工具,知识分子也作为依附的工具,所以我们形成的观念就是一种依附。所以,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独立的意识与我们长期的教育有关。十七年时,老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个毛,必须附在一个皮上。

方励之,1986年11月19日在宁波大学的讲话。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完全是为统治服务的,是一种隶属状态,科学只是一种工具。自然科学最多是生产力,而不是

有独立的含义,由于有了这种依附性,科学本身也就不会有独立的性格,所以老要受到别人的指导。

同上。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的败坏,就是从1958年以后,加快了它的速度。因为这个败坏,不是从1957年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1956年开始的,还要早一些。

刘宾雁:1986年11月21日在南开大学的讲话。

中国不允许杰出的人、强大的人、奇特的人出现,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哀。那么从干部这个方面来看,我们的权力是很集中的,一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干部的角度来看,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恐怕知识分子对他们形成一种威胁。

同上。

政治改革我怎么看。到目前为止要害地方还是不肯接触。要害在于党本身要改革。那么党改革以后将是怎么样的形势呢?请允许我再开放、宽松一点说,要实行多党政治。

王若望:在上海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我曾经说过,把全国人民的命运无条件地交给一个党,尽管这个党是最伟大的、最正确的,但是作为法律来加以规定是不妥当的。

于浩成语，载香港《镜报》1988年2月号，《于浩成谈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

我曾有过理想。但是，经过30多年，我的理想破灭了。我懂得了这是假的。我们拚命干，而领导人仅是装装样子而已。党已经变质了。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一种宗教。

方励之语，载日本《读卖新闻》1988年8月2日。

刘宾雁认为国内的党派将有机会抬头，因为中国人民改变了，社会上各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内现时出现了大量私营企业，这些私营企业家在政治上应有代表，而无产阶级又不能代表他们，因此按道理而言，应容许各个普通阶层在政治上有他们的代表。

香港《文汇报》1988年8月6日。

除共产党外，大陆需加入（原文如此）反对党，以发挥相互制衡作用，而目前大陆虽有多个党派，但并无形成反对力量，算不上是反对党。

民间组织反对党与中共对抗的形势将会出现，并会成为一个趋势，因为，这亦是一个世界潮流。

方励之：《大陆首要（原文如此）迈向现代化，中共政权必须多元化》，《香港时报》1988年9月2日。

中
问：现在台湾有反对党，苏联也有一些反对党性质

出现,您认为在中国组织新党的障碍是什么?

方:第一与意识形态有关,另外中国目前的宪法规定共产党是领导。所以这个问题很难。

问:不是也有其他如“民盟”、“民革”这些其他党派存在吗?

方: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党,但那些我觉得还不是独立的政党,要有独立的政党是很困难的事,主要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另外中国现在还没有独立的经济成分;还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还没有到很多人处在独立的状态,只有很少,较少数人在概念上处于多元化(状态)。

问:但是没有其他政党,很难与旧政治体制抗衡。

方:是的。但我认为中国最后一定是走向政治上的多元化。

〈方励之:我不再入党了〉,香港《争鸣》1988年9月。

除了对毛丧失信心,进一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或至少对毛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现在的党,至少在目前状况,实际上说不上(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什么也说不上。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集团。所以(我)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加入这样的党派。

同上。

中国的事情许多是“不透明”的。中国人权问题的情况绝不比苏联好。

现在中共坚持马列是为了保住权力，实际上说不上马克思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集团。所以我当然也就完全没必要加入这样的党派。

中国一定需要多元化；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政党。

同上。

问：你认为可能会有共产党与别的党派进行竞争的时候吗？

方：如果中共衰落而同时私人经济变为优势，如果中共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及人民的信任，其唯一出路是让别的组织上台。现在中共已经无力控制一切了。

〈方励之评邓〉，香港《争鸣》1988年9月号。

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程的目标是实现必要的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及受教育均等的权利。

方励之语，载《香港时报》1988年9月6日。

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时间来说，要等老一代过去。

方励之语，载香港《争鸣》1988年10月号。

问：政治多元化就是意味着多党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方：这当然是。

问：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多党制？

方：现在没有可能，因为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社会基础，多党是最后的一个标志。社会上形成了一些多元的成分，然后标志出来是多党，现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多元经济。

同上。

刘宾雁说，明年将是中共进入所谓改革的十周年，但中共的改革，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原因是中共只会企图在经济上作单方面的革新，在政治上他们是没有决心实施民主化。

他认为明年将是中共经济状况最严重的一年，中共面临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很少见到的。他说，分析起来，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主要原因之一，是共党政治制度不合理，不健全。他们把“全部政权和人民的全部生活，都纳入共产党的掌握之中。”

.....

更重要的，经过中共39年的统治，中国大陆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是在全面缩小之中。“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历史，对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其真相基本上是一无了解的。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宾雁说，中共党政官员的腐败，不仅使人民享受不到民主，对他们所推动的改革，更是无权过问。不仅如此，中共还企图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来进一步剥削人民的有限度自由。“这，理所当然的，导致了人民对中共越来越多的失望。”

刘宾雁说，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状态，大多数的大陆人都是

抱悲观的态度。但也有少数人持乐观的看法，他就是这少数人其中之一。

他的理由是：经过中共统治下的各种动乱，特别是十年文革浩劫，是带来了中国大陆人民的觉醒。这种觉醒到1979年至1980年时期的北平西单民主墙，是表现出来了。

刘宾雁强烈暗示，大陆人民的普遍觉醒，也就是对中共政治的全面唾弃。同时由于人民的觉醒，也带动了中共党内的变化。他说：“当人民觉醒起来以后，人民本身有更多的自由的时候，共产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只是不容易看得出来，实际上其变化是相当大，现在共产党和人民之间，也就是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那条界限，已远远不如他们党内两派之间的那条界限那么重要。”

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有不同的政见和立场，也当然有差别。不过他说：“在中共党内的两个不同势力，主张改革的和主张保守，这两个力量的差别，远大于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差别。”

他说，他既然被中共开除党籍，在中共党内，像他和方励之这样的人，已是越来越多。

在回答问题时，刘宾雁说，在中国大陆，如果不能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手段达成民主改革，他并不反对以暴力的方式达成改革目标。

台湾《中央日报》1988年12月5日。

我在大陆谈过多党制，但现在基础条件还不够，我也鼓

励组党，同样地基础条件也不够，我倒是认为香港有相当的条件可组党了！

方励之与台湾“立法委员”朱高正在香港的通话，台湾《中国时报》1983年12月22日。

中共自称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根本是强奸民意，这是对人权最大的破坏，大陆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我只需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共《宪法》上没有居住自由，这是起码的人权之一，这个例子就够了。中共《宪法》规定党领导，更是不合（原文如此），因为中共没有证据证明它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方励之语，载《香港时报》1989年2月4日。

我认为，中国人民是在他认为自己需要一党专政的时候，才接受了一党专政；而当他们不能再忍受这种专政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起来改革这种状态。正如恩格斯在谈到普鲁士王国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反动的、野蛮的政府时说的那样，他说因为普鲁士人民只配有那样一个政府。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也是跟中国人民的水平、中国人的需要相适应的。……当然这种状态已发生很大变化，目前正经历着急速的变化。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一个或几个反对党，取决于这种变化的程度。

刘宾雁1988年6月在西德鲁尔大学的演说：《政治改革与新闻自由》，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

中国知识分子在当前的思考,应该是自觉的、独立的、清醒的,其取舍的标准应该是反专制主义,应该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再不能唯领袖提倡是从。

刘晓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香港《争鸣》1989年3月号。

刘宾雁表示,中国共产党完全失败了。他说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独裁的党。刘宾雁给中国共产党作了全面的否定,他说党的40年的历史,只是造成贪污腐化加深,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专制统治加深。他这次在哈佛大学作了一系列的报告。在最后一篇报告中,他说,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干部,把中国人民沦为碌碌无为的群氓。毛泽东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刘宾雁认为,有48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蜕化到了是非不辨,黑白不分的地步。他说,共产党脱离群众,没有被整垮的干部多是一些最没有能力的、最坏的干部。……他说,贪污的现象在中国比在别的国家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共产党实行了假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没有力量约制党的官僚干部。中国人民没有力量改变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又缺乏改革的愿望。刘宾雁认为中国不是发展成为一个法西斯的独裁的国家,就是变成一个像1949年前几年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之音”1989年3月17日报道。

中
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解决教育危机问题。

1989年4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贴出的《几条建议》下的批注。

中国的“酱缸”政体中，充斥着一个个以强奸民意为其能耐的淫荡小人。他们无治国之雄才，但在耍弄权柄，掳拉民权上却比天才还要天才。他们口口讲民主，骨子里却是打着“你是民，我是主”的勾当算盘；以“主权在民”之名，行“民权在主”之实。他们声声民主法治化，而实际上弹的却是“以法治民”的魔鬼的笛音。现代中国的政体中，已产生了一个“针也插不去”的“权力肿瘤”。他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大的“权力债务人”和一群“权力强盗”。

《中国的希望在一——国人血色的眼中》，1989年4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的大字报。

痛定思痛，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不是物价问题，不是党风廉政问题，更不是最大的失误——教育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锈死的政治体制与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是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是封建的一党独裁专制、党之权力高于一切，无限扩张而无制约机制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教育问题岂能解决？

《我们的呼吁》，1989年4月19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署名“社科青年”的大字报。

中国的政治向人们展现的是一幅党权一体、党政一体、党法一体、党国一体、党军一体、党民一体、党经一体、党文一体

的八位一体的这幅漫画。

宪法只规定公民权利的狭小范围，而不得越雷池一步，公权压迫私权，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具有显著的管束性、限制性和压迫性，而不是保护性、开放性和鼓励性。

游行的条例规定及其他将要出台的各种条例法规在中国这种人治国家必定是强化管束、强化限制、强化压迫人民权利的又一道枷锁。

而中国共产党违反宪法发动文化革命和发起数次的政治思想运动，长期侵犯和剥夺数亿人民权利，将数百万优秀的社会改造党人、共产党人及民主党人迫害至死或长期监禁，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难以宽恕的历史罪过。

任晓町：1989年4月21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讲，台湾《联合报》1989年4月23日。

开放、改革这个共产党接近人民的口号尽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和自由，但是，40年来，一元化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使人民对共产党一党集权的种种害处有着切肤之痛。

同上。

上次学潮，共产党说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试问自由难道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有吗？为什么人们追求民主追求自由，偏偏要在其前加上个“资产阶级”呢？看来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啊！……

共产党为了显得自己高度民主，现在提出了多党合作制，表面看来似乎当局直有所通，可大家别忘了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既然是多党合作，又为什么非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对独裁成性，而又权势压人的共产党而言，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不成文的思绪》，1989年4月21日在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的无署名大字报。

中共历史肯定地告诉我们，它只是关心自己之地位，而不关心国家和民族之前途。……

中国除了耽误40年青春外，中共并未给中国带来什么。它无非重复了历史——复习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史，温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都没有前进。

金观涛先生说：任何一个组织在其发展完善之过程中都要产生无组织力量，这种无组织力量之使命无非是动荡和摧毁该组织之存在。中共今日正是一个即将溃灭之组织。

《中共历史反思》，1989年4月21日在中央民族学院贴出的大字报。

有多少热血的知识人为争民主、争自由而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些成为两党的同盟者，但是，这两党都很快地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特别是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

平途代 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

在当代中国,这种忠诚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执政党的忠诚高于对宪法、对真理、对信仰的忠诚。不是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追随执政党几十年而仍被拒诸门外吗?不是也有许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在七老八十一大把年纪之时,仍然要涕泪横流地在党旗下宣誓吗?在党法高于国家宪法、党的权力高于国家利益的中国,忠诚于执政党、追随执政党实际上就等于忠诚于党法对宪法、党员对公民所享有的特权。

刘晓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香港《争鸣》1989年4月。

忠诚,这种人格在中国竟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不但是道德美名,更是特权本身。因此,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党法高于国法、党员高于公民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在忠心耿耿的前提下冒死进谏,而是以彻底叛逆的姿态进行反抗。如果没有这种根本态度的转变,那么我只能对“第二种忠诚”的信奉者们说:你们根本就不必因受迫害而喊冤叫屈,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没有真正的觉醒者会发给他们一枚“忠诚勋章”。

同上。

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血缘伦理和家庭关系来比喻自己与专制权力的关系。君臣如父子、如婆媳,在家做孝子、顺媳,在朝廷便做忠臣。这种血缘伦理的社会化、政治化,使中国知

识分子视道德为政治、道德情操为政治行为。“舍命待母”、“以死殉夫”的血缘伦理关系，直接变成“以身殉君王”、“杀身成仁”的君臣关系。在当代中国，这种关系仍然根深蒂固。当代知识分子把党、祖国、人民比作母亲，把自己视为儿女，母亲的养育之恩重如山、深似海，穷其一生报答不尽。他们把自己的受侮辱形容为“母亲错打了儿子”，但是，母亲犯了弥天大罪仍然是母亲，儿子受尽天大冤屈仍然是儿子。儿子可以责备母亲，但不能背叛母亲，要用更大的孝来感化和原谅母亲。我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以忠诚来怂恿一位屡教不改的错打了儿子的母亲。

同上。

中共领导人该就他们所犯的错误下台。如果是集体领导的话，便该全体辞职。

方励之在接受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载《香港时报》1989年5月19日。

中共的腐化已到了惊人的地步——现在几乎“全民崇商”，一致往“钱”看。中共的干部多千方百计追求钱财，改善个人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及送子女出国。

凡人均自私，但中共干部似更自私，更知道如何利用特权，来满足私欲。因此，任何良好的制度均必须设立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但中共实行“一党专政”，不允许反对党、民意以及舆论的制衡、监督及制裁，只允许自己监督自己，当然只会保

护既得利益。

方励之与杨力宇的谈话，香港《争鸣》，1989年4月号。

中共是一利益集团，必然坚决保护既得的利益，绝不会自动放弃，更不会自动走向民主化的大道。经济改革是必须的，因经济崩溃会“亡党亡国”；而政治改革将会影响政治上的既得利益，故可能性甚小。因此，中共坚持“一党专政”，恐惧民主化及两党或多党的民主政治会影响其政权及个人的政治地位。

中共实行“一党专政”，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只允许点缀性的民主花瓶党，如何能达到民主化的要求？……

年长的领导人甚多是军旅出身，为中共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满肚子的封建意识，毫无民主思想，更不了解民主政治的真谛；六十岁左右的领导人多曾在苏联或东欧接受训练，所接触的只是“一党专政”体制；中共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没有一位中央委员受到西方民主政治之熏陶或向往西方的民主政党政治，如何能期望这些领导人士来推动民主政治？留学欧美的学者专家应深知民主政治之真谛，但多滞留不归，少数回去者亦多未被重用，而其民主思想是中共所忌讳的，他们亦因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今亦只有一二人能升到副部长级的职位。

同上。

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个人专断，如果表现为单纯的

封建主义,还不至于这样难以克服,问题还在于它常常以“党的领导”的面目出现。对于普通党员或群众,则用“组织性”、“纪律性”或“党性”来要求他们盲目服从。其实个人专断根本不是共产党的领导,盲目服从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党性。

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三联书店1989年6月出版。

多数人都有这种认识,一党专政是不行的,绝对权力不能避免腐败,一定要实行民主,国才有救。

苏绍智:《制度造成了邓小平悲剧》,香港《百姓》半月刊1989年9月1日(第199期)。

人民的利益是多元的,各个阶层都有各自的利益要求,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执政党所代表的不可能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至多只能代表大部分人民的利益。而任何公民的正当权益都是神圣不可剥夺的,应该允许有表达出来的渠道。

王丹:《论反对派的言论自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9年9月。

在现实中国的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执政党内部根本无法形成制约、监督机构的有效运行。……而对一个党的统治破坏最大的,往往首先来自于它自身内部的腐化、黑暗,在和平时期的专政统治下尤其如此。

同上。

胡志军

如果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接的暴力决定着谁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共产党成为中国大陆执政党时期,“一党专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把中国大陆任何一点的民主都扼杀了。

严家其,《重建共和之路》,香港《明报》1989年9月13日。

如果说,孙中山在1912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的话,那么,中国人民现在的任务是为重建共和而努力,在中国建立名副其实的“第二共和国”。现在,台湾各个政党和台湾人民正在全力推进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政党政治在台湾已开始出现,这正是整个中国“重建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是,要改变中国大陆共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使中国大陆的政治走向“多元化”。

同上。

四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大肆污蔑、攻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散布说，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来的，很多东西是虚幻的模式”。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败”了，在“体系”上也失败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要“重新认识”，不要有“恐资病”。

他们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他们污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仍然遵循着古老中国的不可动摇的法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延续，是“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独裁制、集权制”，一切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的”，“不过涂了一层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油彩”，是“假社会主义”。

他们污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人”的“压制”、“践踏”和“污辱”，把“人”变成“工具”和“奴隶”，并且“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蓄意抹杀建国4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污蔑说“无论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社会主义都“失败”了；他们恶毒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理论和政策，污蔑说邓

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名词”，“根本没有用”，污蔑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极不科学”，“更谈不上是理论”。

他们丧心病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给它加上种种罪名。他们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于“领导人所有制”、“官有制”、“党有制”，“比私有制还糟”；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抑制了效率的发挥”，“限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贪污腐化的温床”，是必须割除的“祸根”。他们疯狂地叫嚣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鼓吹“实行私有制”，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化”。

应当承认在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确不如所谓的资本主义阵营。现在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中国式社会主义，这本身是不清楚的。

方励之，1985年3月在浙江大学的讲话。

毛主席讲，一张空白的纸可以画最美丽的图画。中国本来也是一张空白的纸，不过画了几十年来，有点画得乌七八糟了。不是现代派，是向苏联学，而且还要加点封建的货色插进去。现在要改回来是蛮难的，还要把原来涂上去的乌七八糟的油画颜料揩下来，倒老讨厌的。

王若望，1985年4月在上海城建学院的讲话。

原来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在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名词。

方励之：1985年11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我们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吗？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弄来的，很多东西是虚构的模式。我们对中国自己这个国家是怎样一个情况也是模糊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认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就可以全民所有，人人平等，皆大欢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导致了我们的三、七年来历史的畸形，即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

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分析，整个社会发展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由于我们20年打了游击战争，有些国家走了资本主义的阶段，已有一、二百年了，我们希望它早些灭亡，但现在它并未灭亡，看来还兴旺了。难道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几万万入就能够超越这200年的历史吗？如果能超过，我认为这就公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真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幻想。我们指望一个领袖，在1949年的某一天，带我们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容易的。可要真正改变社会经济结构谈何容易，这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是走捷径的做法，结果历史来惩罚我们。惩罚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表面掩盖着的东

西是社会主义的，而实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

我想讲讲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紧迫的需要。这是我分析长期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嘛，我们现在是跳了过来，可以回过头来再补课嘛。

王若望，1986年8月8日在杭州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想，我这资产阶级的帽子今生今世戴定了，我就是要宣传，我们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经营方式。

同上。

在社会生产力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的；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建成的。我国的实践有力证实了这一论点。新民主主义时期如果发展得更充分一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步伐如果进行得更稳健一点，今天的情形可能不同。现阶段所有制的改革，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说明“补课说”的不无道理。

苏绍智，《政治体制改革刍议》，《读书》1986年第9期。

我们跳过了资本主义，跳得怎么样？不好过，是不是社会主义了呢，不是的，一切的东西，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的，不过涂上了一层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薄彩。

王若望：1986年10月28日在上海松江县文化馆的讲话。

几十年来，我们的工人，老实讲是变相的依附关系；依附在工作证、户口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外表，封建主义的实质。正因为这样，中国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拿过来。

同上。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现在和未来，……两极分化将长期存在，……随着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大锅饭的被废除，小平同志所说的“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相形之下另一部分人跌下去，好起来的则富者越富，跌下去的则“穷者越穷”，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自由竞争合理的结局。如果不让“分化”，没有“两极”，只有实行平均主义两头填平补齐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过去进行了近30年的实践，大家过的却是“穷的共产主义”的生活，……从目前的经济管理来说，是两极分化得不够，处处还保留平均主义的痕迹，因此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中，不必害怕导致两极分化，如果一再强调不能两极分化，正好给冲击经济改革的怀念平均主义的人士提供了富有权威性的支持，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去削平冒尖的先富起来的人。

王若望：《“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深圳《特区工人报》1986年11月5日。

70年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象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还拿不出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现在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是我说，不是在座的同志、不是学者、不是人民、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另外一些人，宁愿大家把这一切都忘掉，宁愿大家都把嘴封起来，比方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嘛，其中有一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那么试问什么是社会主义，1953——1976年是不是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说那个是真的，那么1979——1986年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假如今天这个是真的，那么那个恐怕就不是太真，至少，或者说它是假的。假如那个是真的，地地道道社会主义，那么今天这个就成了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上的问题。现在，叫我回答我就回答不出来，如像理论界也没有被允许探讨这个问题。

刘宾雁，1986年11月7日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每次出国以后，看到了许多对比的情况，我的感受用一句比较粗野的话来说就是“恨不得踢中国两脚”，觉得中国发展太慢了，如果不再使劲踢中国两脚，此生实在对不起我们的民族。

方励之，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

现在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封建式的。社会主义

到底什么水平我真的都不知道。到现在我不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

方励之：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去过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封建的，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是这样，挂个民族主义招牌，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都是独裁制、集权制，这样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因素。我们培养的基本上还是封建性质的。封建最大的特点，在于培养要求知识分子依附于统治者。……知识分子所有的价值标准最后是被统治者承认。一篇文章被领导承认就高兴。这是完全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一样，他独立的人生、独立的价值标准，是跟政府讲独立的。从办大学来讲，政府管不着大学，除了政府给大学钱以外，其它你不能管。

同上。

所谓的社会主义时期，如果平心静气来讲这个时期同样是失败的。……中国无论从经济、政治各方面，这30年做的事情，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

方励之：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如果想要上去就是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我们这30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这就是我

们改革中面临的形势。我们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至少我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不是特别的、足够的明确。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

同上。

17年里大学的人才观最大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就是培养的是工具而不是人，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判断标准而是当工具，就是说别人欣赏你一下，你这个工具很好，你就高兴了，而不是我自己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我们自己有一个不允许别人干涉的态度，一直到今年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没完全的改过来。

同上。

社会主义思潮出现我觉得确实有道理，有他合理的、值得欣赏的地方。但是真正做起来，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真正合理，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首先一点，我觉得，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胸不要老是想到有一个正统，这个正统的框子不能跳出去，我觉得是比较狭隘的，思考这些问题之前，就要解脱一个框框，就是所谓狭隘性，特别是我们所理解的所谓马克思这种东西的狭隘性。

同上。

我们脑子里有个虚假的东西，我们宣传的那些东西实际

上是理解的东西。我们要越过这个框框，资本主义社会比我们好了总是不敢说。你现在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个东西在我们心里是分裂的，……好像是理想，实际看是虚假的，实际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套。

方励之：1986年11月19日在宁波大学的讲话。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可以不要民主的？没有民主，有没有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是假的，虚伪的，骗人的，不彻底的，那么你搞点真的吧！……不可设想，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刘宾雁：1986年11月21日在南开大学的讲话。

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正好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古老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后，竟穿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的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又开始沉醉于寻找符合五项条件的完美领导人……

我曾率直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很多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而且说，中共在夺取政权、统一华夏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但在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方面基本是失败的。……我之所以说出这个十分离经叛道的论点，正是由于我痛定思痛，长期思考，进行多边的多层次多角度横向对比所得的结论。

王若望：《驳熊复、胡乔木——评“横比有害说”》，《百姓》1987年7月16日，第148期。

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极重要的一条，他认为“变生产手段的个人占有为全民所有制，就可以消灭阶级，大大发展生产力”；并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剥夺资本家对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这一条科学预言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苏联经过70年，中国则经过37年的社会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这条原理是有害的，行不通的。这从德国的东西两区，朝鲜的地分南北，在分隔状态中各自进行了三四十年的两种不同制度的竞赛，同样证明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比不上资本主义的优越。这个评判结果已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

王若望：《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香港《百姓》1987年7月16日，第148期。

“公”之害是破坏生产力的主要祸根，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公民，控诉“公”之害可以涕泗交流、罄竹难书。

凡是研究了世界的潮流趋向，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并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会从理解“公”之害中探索今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道路。

同上。

近40年来的失败不能（至少不能完全地）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归咎于中国的人口过剩。近40年来的失败

破灭，应该归咎于社会制度本身。

方励之，《中国需要民主》，法国《解放报》1988年1月17日。

社会主义不管具有“中国特色”还是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根本没有(用)，而且不可能起作用。

方励之语，载英国《独立报》1988年5月25日。

当前的通货膨胀，应该根据法律规定，通过改革所有制加以解决，使所有制向私有制转变。

现在的通货膨胀超过了市场原理，存在着恶性膨胀的部分。中国的垄断性体制是个问题，外汇和进口品的黑市交易就是个很坏的现象。首要的是进行法律取缔。但最终是要进行所有制改革，也就是要实行私有制。

方励之在接受日本记者单独采访时的谈话，日本《朝日新闻》1988年6月12日。

当《读卖新闻》记者问：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灵活的一面，您认为有希望吗？方励之说：我不这样认为。比如，说建设“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假如今后成功了，那也就成了资本主义。

方励之与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谈话，1988年8月2日。

谈及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路向，刘宾雁强调：“更多民主，就有更多社会主义”。他说，制度上要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中国社会的底层存在着一些问题，往往长期不被发觉，或被有意掩盖着，于是这些问题便发炎溃烂，最后变成一个危机。但西方社会的体制较好，这些问题都能自然地涌现，经过行政或立法机构后，便得以调整及解决。这种社会秩序是中国没有的。

他又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人事制度。在中国，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很难表现自己，因为没有机会。或者他很幸运地被领导看中，但也很容易为别人中伤，这便中断了他的政治生活。

香港《文汇报》，1988年8月6日。

如果有条件使国家变得可爱，能给大家更多一点儿自由、更多一点儿尊重，而社会的不公正又能逐渐减少，不选择移民留下来，即使物质条件苦又有什么关系？但现在要我说服一个中国人叫他不要出去，我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回来后怎么办，没有好的工作环境，政治一成不变、经济一塌糊涂，我有什么理由责怪人家往外跑呢？有什么理由责怪人家非要在你的领导下受苦呢？是没有这个理由的！

同上。

记者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能够反映实际吗？

方励之答：这个理论值得给予好评的是，它实际上承认前30多年的做法是失败的。记得邓小平有一次对记者讲过，我们过去有20年时间没有什么进步。有一个顺口溜说：“辛辛苦苦40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意思是现在说的初级阶段不是

等于回到当年所提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了吗！所以初级阶段也不是什么新理论。……现在提“初级阶段”甚至还没有孙中山当年讲的“军政、训政、宪政”那样清楚呢。初级阶段的内容是什么，结束的标志是什么……都不清楚。对初级阶段的时间现在越说越长，一会说50年，一会又说一个世纪。从物理学角度看，这些说法都不合适。……如果没有任何根据，那是极不科学的说法，更谈不上是理论。

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9月号。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里不断弥散出来，充塞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

苏晓康：《〈河殇〉解说词》第五集《忧患》，《河殇论》第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11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心头。然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着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同上书，第58—59页。

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

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同上书，第76页。

问：那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

方励之：资本主义化！

问：这一代做不了。

方：对，邓小平做不了。

.....

问：从中共执政算起，应不用100年（就能实现资本主义）。

方：如果真正实行资本主义，我看最多两代人。

香港《信报》1988年9月9日。

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的权力，在事实上，这种权力最后仍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当代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来是围绕着保持、巩固这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

中国政治仍然遵循着古老中国的不可动摇的法则，这就

是国家存在着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政治斗争是围绕着这一权力而展开的。而这些斗争却不遵循预定的程序。

.....

总之，今天中国的政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非程序政治”的因素。

严家其，〈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新华文摘》1988年第10期。

我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应从全世界来看，不单单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在30年代兴起，到了末期就走下坡了。中国、苏联、东欧国家，他们有共同的问题，他们现在走的路也大概相似，我想最终要达到多元化状态。

方励之语，载台湾《中国时报》1988年9月3日。

问：想问你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是走资（方插话，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资本主义是不是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在罗马谈过，中国的希望在于老人都去世。老人走了，他们的下一代来接班。但他们接了班之后，官僚的体制、特权的体制，是不是更加……

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时间来说，要等老一代过去。另外现在观察中国的问题，并不能单看领导层的变化，要看现在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这几界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前进的力量，这些人的力量显得越来越大，决定的成分也

越来越大,有些事情,有的领导层不一定愿意这样做,但他们不能不这样做,他们被推着要这样做。所以现在“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只是“寄托”没有希望,应该放弃“寄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分子,包括工人、农民都懂得自己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有权利去争取自己应当有的东西,这是中国社会往前走的重要动力。

问:过去鲁迅先生来过香港大学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现在你不光是去了港大,对你的反映来讲,比鲁迅当年热烈……你觉得中国的无声时代过去了没有?是不是中国现在有声了?

方:我觉得,现在开始可以听到声音,从无声过渡到有声。在过渡时期,声音不是很大,但是趋势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如说,两年前学生的大字报、批评,也算有声音吧,不过那声音比较弱一点。比如说,很少指名道姓批评领导人这样的言论,两年以来,到今天指名道姓批评领导人的言论,有的公开在大字报,不是少见,已经觉得可以(批评)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问:但是从有声音到有组织的行动……

方:还有一段相当的时间。

问:你估计要不要30年?

方:二三十年还是需要的。因为真正走到多元化,除了言论以外,还有经济多元、教育的基础,我想要一代人时间才有基础。

《方励之和我们交谈——记方励之夫妇与本刊同人在一起》

香港《争鸣》1988年10月号。

这里他们说是公有制，但这等于是领导人所有制。这比私有制更糟。私有制肯定也有一些问题，但是至少有许多拥有人，而领导人所有制，那就只有少数领导人。政府应当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励私人所有制。

方励之在北大宿舍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谈话，《纽约时报》
1988年11月13日。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政政体的先天性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制中为所欲为，而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

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思想独裁才能救中国。

同上。

刚才有人问我，金观涛是不是把社会主义否定得太厉害了？我说，没有，我是可以作证明的。我年龄最大，我有作证

的资格。我 20 岁时是抗日战争，30 岁时是解放战争，40 岁时是反右派，本人就是右派，50 岁时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牛鬼蛇神，60 岁时是 10 年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没当过一次逃兵。在我当学生时，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我认为，在中国也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培养了一大批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它叫作马克思主义，它只是发现了一些人类社会的规律以及认识方法。而我们很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把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叫作耶路撒冷。社会发展有它本身的规律，某一些人要在某个时期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这样的唯心主义在中国发生也是很自然的，怎么可能在人民思想文化非常、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来实现一种叫作“社会主义”的社会呢？因此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我不幸生在这一时代，反过来说，也是我的大幸，居然从头到尾，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悲剧，也是喜剧。所以我说，金观涛先生对社会主义不是否定得太厉害，而是客气了一点，我来作证。

戈扬 1988 年 12 月 7 日在一次集会上的发言。

20 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一是西方中心论的衰落及其破产，及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起飞，改变了西方处于人类经济的中心地位和东方作为西方殖民地的状况。21 世纪将是环太平洋世纪。二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现在对社会主义必须作为整体加以研究。为什么这一乌托邦幻想会产生？为什

么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蒸蒸日上,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以后面临了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危机,以致今天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难道人类一个世纪所作的一次空前的、付出极为沉重代价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只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吗?我们应当思考得更加深刻些。

金观涛1988年12月7日在一次集会上的发言。

我们最近有兴趣去推动把“个体户”名字去掉的建议,“个体户”是个不伦不类的名字,个人怎么能变成“户”?我们建议改为“私营企业家”,应让“私营企业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也符合中央当今的政策。我们准备成立“私人企业家联合会”。

温元凯:《中国如何渡难关,改革出路在哪里?》,香港《镜报》1988年12月号。

我最近有兴趣推动成立“中国私营企业家联合会”。应该有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去立法,这就是整个社会演进的过程。

同上。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

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

40年社会主义使人民处于一种依附状态，……最近“10年改革”本身也没有取得任何让人异口同声赞扬的成果。

方励之，《中国需要民主》，法国《解放报》1989年1月17日。

李淑娴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我不满意的是当前的党领导阶层……任何事都可以改变，看看国民党在台湾，目前的新领导阶层就与过去在大陆上时大相径庭……。”

李淑娴告诉《纽约时报》：“我们不知道当时外界是怎样，但后来我就看得很清楚，现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落在美国后面，我认为这就表示制度有问题，因为这个制度压制个人主义。法国革命夫人罗兰曾说，噢！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为之，而现在是万事假共产主义之名而行。”

她对党领导阶层表示失望，“我们原认为党是纯净的，也

许高级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在‘文化大革命’时，什么事都发生了。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四人帮’，不只是因为四个坏人，而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被人以共产党之名而加以杀害，这只是领导人在当家作主，我认为这太可怕了。”

李淑娴说，中共如果真想改革，必须要批毛，而这是最起码的事。

《东方日报》1989年1月25日。

40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50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40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是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40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40年的失望，根源就在40年的社会

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

方励之：《中国的希望和失望》，香港《明报》1989年2月9日。

中国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具有现代化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官僚资本、集权经济；在政治上是官僚主义，思想领域更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非但没有消灭农民，反而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正像历代农民起义式的革命一样。在现代，鲁迅后期曾竭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但是他丝毫不懂，中国当时并不存在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如果把无产者等同于劳苦大众，那么无产者就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不是改造农民，而是保护、依靠农民，这样的革命怎么能称之为现代化呢？只要农民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一天，中国的现代化便不会完成。换言之，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推翻皇帝，更重要的是根除农民。

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2期。

今天中国的启蒙，必须吸取“五·四”的教训，强调个性主义高于民族主义、私有观念高于公有观念。遗憾的是，即便在今天，我们的理论界仍然在重弹民族性的老调，重演封建社会是私有制的老剧。当用民族代替了个人，用公有制代替了所谓的封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时，中国的改革只能原

地踏步。我们理论界的盲目、糊涂、幼稚和劣根性未除，其重要表现就是用私有制来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而在事实上，封建主义不是私有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更不是私有制，而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所有制，人与土地都归国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皇臣。

同上。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个最响亮的、最醒目的口号：人是目的，解放个人。解放个人最关键的步骤就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而在中国，永远是民族高于人，群体高于个体，即便是启蒙时期亦如此。中国的启蒙以振兴民族为目的，从民主政体走向自然人权。私有观念在中国人的眼中永远大逆不道。一系列启蒙的著名人物都对“私”字深恶痛绝，而对“公”字顶礼膜拜，孙中山不是也高扬“天下为公”吗？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人从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变封建主义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权利得以全面实现的基础。尽管到“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盛行一时，但是在没有明确私有财产对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的情况下，任何个性主义、民主、自由的口号都无法确保个人权利的实现。

同上。

方：因为现在人们的觉醒已经形成波状的潮流，一个人所能影响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影响五个十个，一波一波的扩大下

去。

李：一个人如果和五个人有关系，五个人就可以和二十多个人有关系，这话并不是说，今天变化一尺，明天变化两尺，是乘方的。

记者：几何级数。

李：比几何级数还要快，是指数上升。整个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可挡，人们已越来越认识社会主义是个病，要把它割除才行。

香港《百姓》半月刊八周年纪念号，1989年6月1日。

于浩成说现在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文革十年史》这样的书却不可以出，在这现象的背后，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学习西方制度的问题，权力没有了制约就会导致灾难。”他指出“在建国前就已经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建国后就更是大规模的残害了。”

香港《新报》1989年3月16日。

尽管从表面上看，“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对“文革”持否定态度，认为“文革”是造成中国现实停滞不前的“万恶之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但是，认真看一下从“思想解放运动”到现在的所有有关“文革”和“改革”的理论和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否定“文革”的主流恰恰是在捍卫造成“文革”的专制主义政治，捍卫数千年的“人治”传统。这种否定是在不从根本上触动现存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否

定的锋芒所指向的目标，要么是在政治上已有定论的人物及路线（“四人帮”、毛泽东等），要么是改革中的尽人皆知的保守派。这种否定，与漫长的中国专制主义社会中忠臣们对皇帝和贪官污吏的批评一样，是用“明主”否定“昏君”，用“清官”否定“贪官”，用“君子”否定“小人”，用专制主义的所谓“精华”否定专制主义的所谓“糟粕”。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否定很少指向自身，而是完全针对他人。因而，这种否定，充满了屈原式的或杜甫式的忧患意识，也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自我美化，更缺少对愚昧大众的唤醒，缺少对人的个性、权利和自由的关注。对皇帝的“愚忠”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评价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虽然在这其中，也偶尔有否定专制制度本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太微弱了。从魏京生到方励之，是这种声音的代表。但是，他们无论在老百姓心中，还是在知识分子心中，都没有太重的分量。不是经常有些看似很激进的知识分子批评方励之的言论脱离实际吗？不是有太多的知识人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需要开明的独裁者吗（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

因而，否定“文革”的主流倾向是只反对贪官、昏君而不反对专制制度本身。从执政党的首脑们到文化人至一般大众，都非常自然地把“文革”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理解为执政党内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

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表面上是在申张正义，实际上是在为专制主义政治进行巧妙的辩护。中国历史上，从秦朝到现在的政治斗争，都是专制政权内部争权夺利的角逐。这种

专制主义的内部斗争,无论达到怎样非人的残酷地步,也无所谓正义和邪恶,进步与保守的是非之分,更没有所谓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分,而只是争夺最高权利的斗争,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一样。简言之,“文革”的斗争不是两种制度、两种政体之间的斗争,而是同一政体和制度之内的权利之争。像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一样,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从根本上改变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因而,从最严格的意见上讲,这根本不是政治斗争,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是没有什么规则的“人对人是狼”的相互吞噬。

刘晓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香港《争鸣》1989年3月号。

更进一步讲,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内部的残酷斗争中,尽管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但是这种斗争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它用巨大的牺牲所换来的不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是新的独裁者的胜利。中国的统治者的眼里只有权力、权力、权力,从来没有想到过人民大众的权利和自由,一切政策的制定都是争权夺利的产物。夺取权力时,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可以把人民奉为上帝,而一旦掌权,人民连一寸土地也没有。杀功臣是独裁者的职业病。但是,我对被杀者的同情仅仅是作为一个人,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讲,所有争权夺利中的牺牲者都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也是专制政体的一分子。不被杀也不能改变权利的性质,只能加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斗争是残酷的,但是同情这种失败者决不是正义,而是是非不

辨的愚昧。何况,在建立专制主义的夺权斗争中,这些败者也曾经有过赫赫战功。……开明的专制主义在民主制的参照下也是腐败的。换言之,如果从维护专制主义的长治久安出发,可以区别出专制主义内部的开明与昏庸、廉洁与腐败、正确与错误,但是如果从彻底推翻专制主义的民主政治出发,根本就毋须进行这种徒劳无益的区分。如果硬要说什么好处的话,那只是巩固专制主义。在世界趋于民主化的二十世纪,以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来否定另一种保守的专制主义,只能是错上加错。而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年对“文革”的义愤大多数都是这种错上加错。

非常明显,甚至根本不用再进行多余的论证,推翻专制主义的力量决不能在专制主义内部去寻找。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一种思想独尊的社会只能是野蛮的、非人的封建主义。否定它的武器不是它本身,而是与专制主义完全对立的民主制。也就是用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来否定皇权、等级、独裁、专制,用法治代替人治,用私有经济、自由市场来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句话,用现代资本主义代替现代社会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如果不认清这一点,那么任何否定都无助于中国的更新。

同上。

只要不是为了建立民主制的改革,都不具有实质的建设性的意义。专制主义内部的斗争在民主制没有确立之前,是好事,不是坏事。“文革”是历史赐予中国人的一次绝妙的机

会，它使过去人们所不知道的专制主义的争权夺权和腐败彻底暴露出来。……非得绝望，对专制政体绝望，方有觉醒，方有对民主政体的真正要求。假如没有“文革”，中国到现在也不会有民主的声音；假如没有“清污”和“反自由化”，方励之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直接批评现存政治。

同上。

共产党绝不是很自觉的想要改变，或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帽子，来走市场经济或尝试走资本主义，因为公有制——也就是官有制、党有制，中共是绝不会愿意放弃的，失去了这点，共产党的权力和控制就会削弱。经济控制力一消退，中产阶级就会出现，中产阶级一兴起，进而就会想出政治上的要求，这是它绝对要避免的。

方励之：《经济开放 政治开明——中共发展希望所系》，1989年3月。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以下称记者)：这就是你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总结的经验吗——企图用政治权利强行实施社会主义？

刘：是的，枪杆子里出乌托邦。

最初，列宁自己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在像苏联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出现。他以为革命会先在先进的德国和奥地利爆发。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失败之后，为了维持国家权利，列宁就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设法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社

会主义。结果建立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现在把马克思的这条基本原则变成了苏联的一个重要口号——“民主越多，社会主义也越多。”但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和苏联的民主和自由越来越少。这不可能是社会主义。

记者：所以，中国首先必须发展或重新发展市场，建设更先进的经济，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毛泽东原来也是这样想的。事实上，他把革命后的这个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由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毛在1949年说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需要经过十五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社会主义。但到1953年，毛想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企图跃进到社会主义。他忽视了物质条件，企图跑步进入“伟大的未来”。

记者：你的说法很像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阿干贝延。他认为自列宁之后，没有一件事是对的！

刘：尽管毛的道路是不成熟的、错误的，但也是有成绩的。不过，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原来只要花五分钱的，我们付出了二十分。

《胡耀邦代表的党内力量加强了——刘宾雁谈中国政局》，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9年4月。

我们建国40年了，为什么中华大地灾难不断？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总处于极为低下的状态，很多地方民不聊生，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百姓天天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官僚

主义却变本加厉？为什么短短的几十年中“失误不断”，危机不断？为什么官僚主义造成“失误”后换上个地方照样作官，而且官倒越作越大？为什么宝钢还没有上马，就使国家损失几十亿，为什么贪污腐化之风吹遍全国，愈吹愈猛？……

1. 公有制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公有制是建立在一些前提下，这前提之一是，人们的“思想觉悟高度提高”。而在当前，现实中的这种前提只是一种虚构的假说。这种建立在错误前提下的公有制，引出了下面一系列问题。

2. 公有制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公有制下，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想让别人多干活，自己多拿钱。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没两样，反正工厂不是我家的，倒闭由国家安排新工作。“反正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这就从根本上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方面现象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不必多说。

3. 公有制导致惊人的浪费。随便到一个公有制单位看看，惊人的浪费现象随处可见。反正浪费的东西不是我家的，分到我少的可怜，关我什么事？即使给国家节约11亿元，分到我还不到1元，关我什么事？而且凡是带公字的，浪费现象都非常之惊人：公费医疗，公费请客，公费旅游……《经济日报》

4月21日刊登的一则新闻，说一位农民到某市低价从公费医疗者手中收购药品，国家花了大量外汇进口的价值几十万元的药品，几天之内就收到农民手中，这也可以理解，药是公家的，拿回来扔掉也就扔掉了，何不去卖几个钱？

4. 公有制抑制了效率的发挥。一个单位的一件小事,先得开个扩大会议,再写份报告,请示上级诸部门,盖了许许多多的章,划了许许多多的圈圈,再等报告批下来,事情早已过去了。在全世界激烈角逐下的信息时代,这样的办事效率简直是对人民的犯罪,而这样的现象在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都是不足为怪。

5. 公有制限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在公有制下,强调的是所谓整体利益,完全否定了个人的作用,极不利于个人潜能的发挥,否定了个人的结果,导致整个社会死水一潭,人人平庸,人人贫穷,人人在平庸和贫穷的基础上“平等”,不敢冒尖,不能冒尖。

6. 公有制,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根源。工厂又不是我家的,过两年我又要退下来,能捞先捞,不捞白不捞,山上的林子砍下来卖掉,我在位的两年比前一任经济增长30%,搞教育花那么多钱,出来的学生为几任服务,反倒显出我没建功立业,搞它干吗?还不如将这些钱盖幢高级的办公大楼,人人都可看得见我的功绩。

7. 公有制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为什么中国的官僚主义根深蒂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祸根之一,是公有制。国家是公家的,我这个主席反正当几年不当了,功过是非,我自己说了算。唉!我花那么大精力去解决什么教育问题,民主问题?划几个圈圈算了,企业是国家的,我这个厂长费那么大劲关心它干吗?反正过几年我就下去了,划几个圈圈算了。

8. 公有制是贪污腐化的温床。为什么中国贪污腐化的闹剧愈演愈烈？为什么有的银行及企业被盗上百万元的财产连知道都不知道，有的甚至事发东窗后为保全面子而死不承认，祸根——公有制。

9. 公有制，集权专制的摇篮。从30年代斯大林的大屠杀，到50年代中国的反右、60年代开始的个人崇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哪一件不发生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

10. 在公有制下，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由于计划经济的原因，人们没有迁居、择业的自由，没有按自己意愿组织和发展的自由，连这些作为人最基本的选择权力都没有，还谈什么民主自由？！

当然，中国走向公有制这条没有前途的道路，并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开始考虑逐步改正还来得及。

.....

让我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

署名“博士生”的《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1989年4月24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们这个社会问题太多，让人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往往是感情审判着逻辑。中体西用，在很长时间不是理论上问题，而是感情难于排解的纠葛。

包遵信在“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研讨班上的报告，1989年5月。

“老三篇”实际上宣传是伦理社会主义。就是把伦理道德日趋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

同上。

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同样会出现五四运动，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也照样会传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也会照样成立。……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个讲法把启蒙意义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不太恰当，尽管是事实。

同上。

今后社会的主导力量应该是什么？也就是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是哪些阶级？这都值得研究。过去说，代表新的生产力是劳动者，所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今后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已不是一般劳动者，不是产业工人或是无产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

苏绍智在“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研讨班上的报告，1989年5月。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都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刘晓波：《六·二绝食宣言》。

严家其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表示：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台湾以前也是，但近来迈向民主化，这是受欢迎的。

他说，中国政治目前有两种力量，专制独裁与反专制独裁，后者都是我们的朋友，台湾民众高举民主旗帜，就是中国今后统一的基础。

《东方日报》1989年7月31日。

在未来的中国，……我希望把三权分立、联邦制、军队的非政治化、国家化作为宪法的根本原则，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法治代替人治，最终地结束有几千年历史的皇朝循环。

严家其语，载香港《东方日报》1989年6月26日。

严家其说：“现今中国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走向民主，完全是可能的，无须用革命的办法和暴力的手段。以‘革命者’来形容我们并不准确，应称为推进民主的活动家；有的可以做政治活动家，有的可以做社会活动家。”

严教授曾经撰文，说中国现在不是共和国，要重建共和。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从来不是共和国。严氏表示这问题要仔细认真写文章来谈，并须对20世纪中国历史重新研究及分析。

“1911年清王朝消失，孙中山先生领导建立共和国，但那共和国制度没多久便被袁世凯建立的帝制取代。”

“49年以后的中国，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共和国。刚开始时，毛泽东确实想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但他本人也受到历史的各种限制，共和主义在中国没有好好发展，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期间被摧毁。”

严氏心目中的共和国是怎样的呢？他说：“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有明显区别。专制政体的最高权力是不能分割的，共和国却非这样。它的立法权属于人民，立法机构由直接选举产生。”

〈别来沧海事——重访严家其教授〉，《明报》月刊，1989年9月号。

五 攻击人民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丧心病狂地污蔑、攻击、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说：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已经过时，现在，发达国家“都是中产阶级”，“已没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军人专政”、“整人专政”、“镇压知识分子专政”。他们污蔑人民民主专政“取消了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因此，“自身不可避免”地会腐化，使社会公仆蜕化为社会主人。

他们胡说：中国“根本不是共和国”，“而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在中国的继续”，而且还不如“封建社会的开明时期”。他们污蔑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使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人民政府丧失人性”。

他们攻击爱国的、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知识分子“愚不可及”。公然煽动那些受无产阶级专政“迫害”的人“起来造反”，“推翻政府”，狂妄叫嚣：“只要坚决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

在过去的口号下，“工具论”模式是非常明显的，要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过去，对整个年轻一代的培养，在人的修养方面，是以雷锋作榜样。他的人品、道德当然有许多地方值得

学,但雷锋的“螺丝钉”观是不对的。如果只是老老实实地当一个螺丝钉,我想至少从现在建设的要求看,不只是螺丝钉,而是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有,能做大事,也能做小事。雷锋的观念是陈腐的,是“工具论”最典型的体现。“工具论”与十七年的教育口号是连在一起的,完全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方励之:1986年11月1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瑞典已没有无产阶级,都变成了中产阶级以上。整个西欧国家也是这样。列宁主张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运用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阶级斗争。但他们不主张这种东西,就是搞阶级调和。当然,他们是公有制。……从意识形态讲,他们也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宣传与我们是类似的。老实讲,他们比我们更加接近一点纯粹的理想的社会主义。

方励之:1986年11月19日在宁波大学的讲话。

关于“三权分立”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似乎是还没有一个制度能够比“三权分立”的制度更好,从而取代它。我们看到大量的社会现象已经说明,在“三权分立”的这种制度形式下,社会既能保证它的不断在前进和变化,又能保持它的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中国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另起炉灶去建设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模式和制度,看来是失败了,不仅在中国失败了,在苏联,在东欧也失败了,那么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而且,事实上,在我们的制度里面,已经部分地有了或者

接受了“三权分立”的因素。宪法本身是从外面学来的，司法检查，公安制度的形式也很相似，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也很相似，内容就不大相同了。我认为一种制度的好坏，不能因为它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我们就不能接受；可是，长期以来，这个观念在中国很牢固。

刘宾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香港《百姓》半月刊1988年7月16日第172期。

所以我曾经说过，从1949年以来，我们曾经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上的错误，就是要跟资本主义一刀两断，要跟它对着干，它往东走，我们就非要往西走不可。（众笑）其实，我认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应该把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经过历史证明有用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变得更好。你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吗？那你把它变成真实的嘛，这不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了吗？我坚信，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经过努力是能够做得比西方的民主更真实，更彻底的。

同上。

共产党就是喜欢搞这样一套权力斗争，喜欢整人，你整我，我整你。

共产党书记吃了饭干什么呢？什么也不懂，靠整人吃饭。

王若望：在江苏省江阴县新桥毛纺厂的讲话。

法国大革命迄今两百年，法国现在已解决的问题中国还没有解决，法国有《人权宣言》，我们有吗？法国律师是自由的，但在中国，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要由上级决定，而第一次出庭的辩护律师竟然要集体讨论通过，直到现在还没有个体律师执业，这不是可笑吗？但这也并不可笑，因为中国的普及法律是要老百姓做顺民，从来没有告诉中国公民法律是保证他们的权利。

刘宾雁语，载香港《文汇报》1988年8月7日。

关于中国过去重视读书人和近年“读书无用论”泛滥的问题，方励之说：中国有重视读书人这个传统，孔子、儒家的文化当然是这样。中国大陆的文化可不能简单地从孔子这种文化传统来看。近四十年的文化应当叫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文化，这是不同的。你回大陆以后，看见大家说话还是中国话，其实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很不一样，比如说重视知识分子吗，其实某种范围里也许你还看到（有人）要考大学，但是在中国由于几十年来把知识分子几乎是作为间谍来对待，已经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是很短时间能够除掉，特别是从列宁开始，就把知识分子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种东西到斯大林（有了）发展，到毛泽东发展得更强烈，这种东西在中国到今天还遗留下影响。

《方励之：大学的作用——科学、民主、创造、独立》，香港《动向》，1988年9月第52期。

记者问：中国有多少政治犯？

方：这很难估计，因为很难知道谁在监狱里。……我们甚至还没有迈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方励之评邓》，香港《争鸣》1988年9月号。

几千年来，面对专制主义，中国人太缺乏斗争的勇气，太具有逃避现实的惯性。在西方，能够出现卢梭式的、尼采式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天才，而在中国，智者却一个个去田园赏菊，去寻仙问道。……如果这仅仅是某些个人选择，也无妨大局。但是，一旦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那就太可怕了。入世便忠于皇权，出世便两袖清风。中国人的人格中，既缺少清醒的人权意识，又缺少为某种理想而献身的勇气。……没有一个开放的、多元的、自由的民主政体，而只有封闭的、一元的、专制的政体，任何“热”也无法使中国人摆脱非人生活。

刘晓波：《在“气功热”的底层》，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0月号。

在中国，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便等于运动，运动便等于整人。毛泽东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充分表现出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这种无孔不入、危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政治运动，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政治过敏症”。莫谈国是的古训是每个当代中国人都深切体验到的。因为，没有民主权利的政治，只能是争权夺利的交易所，而在这争权夺利之中，最倒霉的往往是不了解内幕的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使人们懂得了这一点。而“文革”后又进行了“清除

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运动，更使人们懂得了专制政治的本性难移。用政治运动来整人是专制政治的本能、先天遗传。懂得了这一点的人们，便开始疏远政治。而这疏远是以恐惧政治为前提的。

同上。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已经服刑大约10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的。

方励之：《给中国军委邓小平主席的信》，1989年1月6日。

于浩成目前在深圳接受本报记者访问。他认为，最近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不能讨论“四个坚持”，这是在一定的背景下讲的。关于“四个坚持”（写入宪法序言）的争论由来已久，于浩成曾因提出“宪法序言并无法律效力”而被点名批判，被指“反对四个坚持”。于浩成认为，宪法序言只是历史总结和号召式的政治声明，并非强制性的法律，况且“四个坚持”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世界观问题，并非全民要服从的义务。

目前于浩成以“修改宪法”为课题，主持研究“大中华宪法”，目的是解决现行宪法在面对一国两制、台湾问题时出现的种种矛盾，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政制建立法律依据。于浩成说，一些学者已提出，“大中华宪法”中应允许反对党存在，甚至提出应让国民党在大陆公开存在，发展党员，参与中央政

权,因为目前只有国民党才有力量监督共产党。

于浩成说,目前官方对学者研究“大中华宪法”还未表态。于浩成担任社长和主编的《法律咨询》和《法学杂志》正有学者就“大中华宪法”发表文章,他担任顾问并主持研究的“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还计划邀港、台法学家一起讨论,共同研究“大中华宪法”。

香港《明报》1989年1月21日。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文革”的否定与今天的否定之间的本质性区别:“文革”的否定在本质上是毛泽东为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而今天的否定则应该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否定。

刘晓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香港《争鸣》1989年3月。

造成“只反贪官、昏君而不反专制制度”的原因,不是或主要不是专制的残暴,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愚昧,以及由专制者和知识分子共同造成的全社会的愚昧,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愚忠”——对专制制度的盲目的、绝对忠诚。这忠诚不仅在古代中国,而且在当代中国,也仍然被视为一种最高的美德。古代的典型是“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屈原,现代的典型是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所以屈原对楚怀王放逐他的怨愤达至死不瞑目的地步,刘宾雁对把他开除出党也一直耿耿于怀,并期望得到第二次平反。期望专制者的开恩平反,这本身就是愚昧至极的心态。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及在台

湾),给人平反成了一件光荣加自豪的举动,统治者们仿佛不是在忏悔、反省自己的错误,而是在对不幸的人们施以恩赐。而被平反者也觉得骄傲万分,仿佛自己成了民族的英雄,从而对施恩者感激涕零。在中国、在苏联、在台湾,全社会和被平反者为专制制度的大赦唱过多少动听的赞美诗,又在涕泪横流中发过多少气壮山河的忠诚誓言!而只有专制者才能为在专制主义的迫害下的人们平反这件事本身,仍然是专制主义的。为什么被迫害者不能自己造反,而要等待几乎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专制者们来平反?为什么知识分子不通过其他自主的手段为自己平反,而非要等待专制者的慈心大发,开恩解放?迫害与平反,权力都在专制者手中,平反也改变不了专制制度的性质,反而为其贴金,以“开明”而招摇过市。更重要的是,他有权给你平反,就有权再次把你打下地狱,刘宾雁的经历即如此。正像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专制者有权给人以自由,同样也有权收回自由。“思想解放运动”和“清污”、“反自由化”即是明证。自由、权利以及平反都成为一种专制者所给予的恩赐,而被恩赐者对这种给予反而抱以感激和忠诚,这难道不是在自虐吗?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被政治所虐待,也用“忠诚”来自虐——前者是专制的残暴所致,后者是知识分子的愚昧所致。翻翻在新时期文学的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大多数都涉及到“反右”和“文革”。知识分子在这两大运动中之所以犯罪,其原因在于“忠诚直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反省自己的忠诚是否有价值,反而一个个在最大的屈辱中仍不改赤子之心。他们坚信,他们的忠诚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

的承认，他们的全部忍耐和努力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一旦圣皇明鉴，开恩大赦，对他们的忠诚表示承认、嘉奖之时，他们便感激不尽，以十倍的忠诚来报谢皇恩。而他们的痛苦就是“忠而不见信”的痛苦，这不是自虐又是什么呢？忠诚是他们的参政根基，以忠诚直谏，以忠诚忍辱负重，以忠诚换来圣王的醒悟，以忠诚报答圣王的开恩。一句话，他们的全部行为都是为了证明“只有我才是忠诚的儿子”。

同上。

正值国家艰难，人民呻吟之日，恰当社会沉沦，制度败坏之际，为自由、民主进步而奋斗不息的战士，遽然而去——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就在这个日子里，每一个有血性、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在怀着复杂的心情，思考70年前那个伟大的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

70年过去啦！

然而70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仍然举步维艰。举目四望，贫穷遍地，愚昧横行，豺狼当道，精英毁弃，独裁专制，无民主、自由立锥之地！

青年们：是你们觉醒的时候了，是你们鼓起热血，勇敢地沿着先驱者们足迹奋斗下去的时候了。再也不要犹豫和彷徨，再也不要潇洒和感伤，没有什么好等待的了，行动起来吧！

当然，自由、民主不是激情的口号，更不应是发泄情绪的工具——不！那是褻读，先生们自由民主是长期的目标，是要付出代价而达成的组织制度和民族心态！

为稳健积极地推动这一伟大事业，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供全体青年们思考。

一、各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全国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体，做为学生与社会和政府沟通的民主、民选机关。

二、成立修改宪法研究会，去除宪法中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原则”和“坚持”，声明中国人民共有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在全面继承人类的物质精神文化基础上，努力推进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和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三、成立全国革命现行政府研究会和请愿团。我们的基本口号是：“军队社会化，政府人民化”。军队不应成为任何一个政党的工具，政府不应是某一党派的傀儡，我们不允许政府之上有任何其它超越权威！

四、新闻独立，言论自由。

五、实行充分的地方自治，在各地方竞争合作中，总体推进社会发展。

1989年4月18日北京大学张贴的署名“南开大学”的《告全国青年学生书》。

现行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它取消了人民理所应当享受的对政治制度、政府及执政党的政治选择权，实践证明人民一旦丧失了政治选择权，他们也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其它基本权力，人民被剥夺政治选择权的同时，也就窒息了他们的主动精神与创造能力，而执政者拥有不受选择和监督的绝对统治权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不可扼制的腐化，他们也就必然会从

社会公仆退化为社会的主人，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也必然会演变为特权阶层所有制，由于人民长期无权而积郁的社会矛盾酝酿着无法缓解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于是周而复始的社会动乱和生产力的重复破坏也将不可避免。

1989年4月19日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的《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

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签名运动与其说是一次英雄壮举，不如说是这种忏悔的开始。

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

胡耀邦在本质上不是为民主化而牺牲的悲剧英雄，却被人们视为悲剧英雄；而魏京生等人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真正的悲剧英雄，却常常被人们忘记。这才是中国的深刻悲剧。

同上。

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同上。

平心而论，不管多么残酷的暴政，人在面对它时都不应该有恐惧和怨言，服从或叛逆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当中国人一味怨恨专制者时，更应该怨恨自己，如果不是中国人过于怯懦和愚昧，怎么能使当代中国的专制者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把不讲理当作真理。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

刘晓波：《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解放月报》1989年4月。

在当今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时，中国的体制却仍是以往的框架，仍带着以往的专制痕迹，以权谋私，贪官污吏，世风衰败，强奸民意，远不如2000年前封建时代的开明时期，那时，还有孝廉和评估政绩，公平选拔人才。而今，我们的大小贪官们，有权、有钱、仗势欺人，民愤极大，政绩平平。却官运亨通，真是无耻之尤……

1989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的未署名文章《1989年学生运动的几点看法》。

政党的腐败、无能、社会问题，根源在于独裁。独裁控制了新闻，掩盖了事实的真相，愚弄着10亿人民，因为，独裁者不可能在犯错误的时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不可能在自己的错误后迫使自己下台，它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受着封建的毒害，因而只有愚弄——一句话，独裁必然带来腐败。

1989年4月23日晚，清华大学贴出的署名“北京高校联合会”的传单。

宪法、本来是国家大法，可在这960万公里的土地上（注：原文如此），实质上并不存在“中国宪法”。宪法在中国完全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价值。40年来，宪法在中国像幼儿园的小孩儿画画一样，可以任意改来改去，修改宪法成了共产党的家常便饭。……一党宪法已经统治我们40年了，它成了人民的紧箍咒。这还能称其为“法”吗？！

1989年4月26日，中央戏剧学院贴出署名“一民主斗士热血青年”的大字报。

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严家其、包遵信等人：1989年《五·一七宣言》。

对皇帝的“愚忠”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评价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虽然在这其中，也偶尔有否定专制制度本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太微弱了。从魏京生到方励之，是这种声音的代表。

刘晓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香港《争鸣》1989年3月至5月号。

中国政权40年来都是靠恐惧感来维持的，不仅从意识形态控制人的思想，而且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

方励之语，载《大陆人民民主第一课》，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3日。

对于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性质是什么？王若望说，40年来，实际上是一个“军人专政政府”，所以军人有特殊的特权。他强调，对大陆来说，不解决军队的问题，即使有了政治改革，也是不巩固的。

台湾《青年》报1989年6月10日。

当代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对很多国家来说，专制政体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人们总认为，只要推翻了皇帝或国王，专制制度也就不再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名义上的皇帝或国王，即使号称“共和国”，即使以“社会主义”的羽毛装饰起来，专制制度仍可能存在。

严家其：《中国并不是“共和国”》，香港《明报》1989年7月23-24日。

问题主要出在列宁建党原则。列宁建党原则，是在地下状态时不能说是错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政权，取得政权以后，仍然按列宁建党原则行事，这就会造成大的灾难。因为无

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专政只是一肩之差。

专政只是革命时期的手段，是危险的东西，马克思提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列宁斯大林去掉了革命的，变成了永远的无产阶级专政。

苏绍智：《制度造成了邓小平悲剧》，《百姓》半月刊1989年9月1日（第199期）。

六 污蔑民族传统文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几乎无不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刘晓波，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他污蔑“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最理想的人性是自觉的奴性”，“传统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了”；主张对“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进行走向极端的否定和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甚至胡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腐败”“可能与人种有关。”

曾经热闹一时的《河殇》，则武断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是一种封闭的、保守的“内陆文化”，认为这种“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再也“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

应该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们极力污蔑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现象的严肃负责的思考，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今天的现实，梦想用所谓的“西方文明”来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高喊，“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黄土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

原重新获得生机”。

对于束缚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只有像“五·四”时期那样进行走向极端的否定和毫不留情的批判，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它的糟粕，留下它的精神。任何调和的、中庸的态度都将为糟粕的继续生存提供土壤。

刘晓波：《无法回避的反思》，《中国》1986年第4期。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跟外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的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猜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些东西完全清除了吗？假如完全清除了，我现在就非常轻松了。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有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的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中间，就包括人内心里，中国人内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都是人的特征，总之良心是消失了，同志们。也许说消失说得重了一点。大大衰退了吧。那么发展起来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是不是？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但是，很少有人写忏悔录。咱们要承认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实在是……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基础上，猜疑，冷酷，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儿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

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造成这么一种道德状态，这一切难道完全改变了么？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刘宾雁：《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1986年9月13日在黑龙江大学的讲话。

我觉得新时期文学丝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相反却暗伏着重重危机。而摆脱这些危机，鉴于很多原因，有些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的。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要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

同上。

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最理想的人性是自觉的奴性。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群体主义、理性主义、道德主义。

同上。

这种哲学只要求个人对社会负责，而不要求社会对个人负责；它把王位拱手献给社会，却让每个人做忠实的臣民；它不把个体作为独立的存在，而是作为某种抽象的、超人的先验实体进行自我完成的工具。这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延续。它视个人的一切为恶，为不道德，为禽兽行为，个人要成为善、成为有道德的人，就必须自觉地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奉献一切。社会是顶天立地的主人，个人是渺小谦卑的奴仆。

同上。

尼采是偶像的粉碎者、个性自由的象征，进化论是新陈代谢、自由竞争的象征，《苦闷的象征》是感性生命、潜象识骚动、人的悲剧的象征，而这三种象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禁忌。

同上。

中国是个没有个性的国家。中国人什么都可以有，就是没有自己，就连日记也被社会化了。雷锋做好事从不留名，却把事迹留在日记里。中国的孩子过早成熟，失去了孩子的率直、纯真，这是生命力僵化的表现。当代大学生一个重要的任

务,就是脱胎换骨,改变从中小学就给你灌输的僵化的思想。我现在出名了,这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全靠我自己。我觉得一个人不用那么多的责任感、使命感,只要忠实你自己,完成你自己,对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徒对上帝似的狂热,没有过多的道义好讲。……每个人都应为自己,自己就是上帝。

刘晓波: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有人问我,你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传统文化一点优点也没有?我觉得,传统存在着自我封闭,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民本思想”是欺骗性最强的,对国人危害最深的东西。传统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了,没有人性,只有奴性。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传统是极端的偏见,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世界上没有和谐,生命力只有在极端中才能发出光彩。任何理论都无法全面,人类精神上的先导永远是深刻的片面和极端,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都是这样。

同上。

在我们的民族情感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1840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总能获得一次安慰。

苏晓康：《〈河殇〉解译词：第一集〈寻梦〉》，《河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2页。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的文明，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

同上书，第14页。

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长城吗？如今它还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从北方一步步蚕食过来，狂风雕塑着它，仿佛它是一个千年的流放者，躺在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个没有答案的沉思。

与秦长城的被遗忘相反，向后退缩了1000华里的明长城却受到了无比的崇仰。人们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人类工程而自豪。人们甚至硬要用它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

同上书，第24页。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善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纵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是难免玉石俱焚了。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同上书，第74-75页。

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正是使国人脱胎换骨的开始。
……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各种角度、各种层次的反传统使当代人的生命、人格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的重建，也就是人

的生命主体的重建。

刘晓波：《再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百家》1988年第1期。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救世主，那么在当代中国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意识：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

谁想拥有整个宇宙，谁就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

刘晓波：《论孤独》，《百家》1988年2月。

《河殇》对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作了刻骨铭心的反思，带有悲剧色彩。它用视听艺术表现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以往在思考反省上思路狭隘。比如对“文革”的反省，常常只推到1957年，并仅仅局限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许多问题不能放在一个大跨度上去看，坐标体系不清楚，怎么看得清？在时间上仅仅从鸦片战争去追溯也是不够的。比如，不把它放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拒绝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上看，是极难看清中国的问题的。今天中国人需要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否则危害不可想象。同时，《河殇》从单一的伦理思考变成了历史、社会、文化的思考。现代社会发展很清楚地表明，制度、所有制、政治制度单一因素的意义越来越小，而综合性的因素正在加强。《河殇》正是摆脱了伦理、政治压倒一切的思想方式，而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思考。这可以说就是《河殇》的哲学意义。当今中国应该转换成这种思考方式，这有几点好处：一是一个综合的坐标体系可以使目标的选择比较准确；二

是具有坚定性,不因小的动摇而对大的方向产生动摇,去除心理上脆弱的承受能力;三是加强全民族的抗灾能力。如果《河殇》使有些人感到不适,他应该懂得这是好事。《河殇》的意义不仅是在电视上的,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张显扬在《河殇》座谈会上的发言,《新华文摘》1988年第9期。

《河殇》的播出,在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电视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和内心震动。我深感一条,中华民族在现在这个时候,是如此地需要思想,正像干渴的黄土地需要甘雨一样。而这作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原来是忽略的。

我们总有一种想法,因为搞理论过于艰深,搞文化反省那么复杂的问题,历史问题、哲学问题、文化弊病的问题、我们怎么走过来的问题,老百姓是不可能想这么复杂的问题的,老是把文化的研究、理论的探讨,停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世界史,大多是关于文化的创造,历史的反省,最初也都是局限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明显的。在知识分子圈子形成了某些“思想”,然后再影响到大众中间去。人民需要思想。理论家要和人民一同来思想。这个来自人民的思想,只有再回到民间去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力量。对这点我们以前估计不足,《河殇》使我深有所感。《河殇》在进行新的创造,属于新的文化运动。

金观涛在《河殇》座谈会上的发言,《新华文摘》1988年第9期。

一种文化若真的不行的话,它要衰落的时候就该让它衰落,这样可能更好。因为把世界往前推了。你不必保,保就是保落后的东西。在国内,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观点。我们要寻找真理,但不必说专为中国作贺状。

方励之语,载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8年10月号。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保存中国特色或中国传统。我不是公开去反对中国特色的东西,但我不介意失去这些东西。

同上。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在为自己寻找出路的时候,尽管在表面上,或在理智上希望走向开放的世界。但是在骨子里,在感情上,他们仍然是封闭的。他们在内心深处希望寻找到本民族的优秀的古老传统,以重建中国人的统一信仰。也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人的改革,总是在一种既羡慕西方而又害怕西方的矛盾中进行的。中国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彻底落伍了,自己的文化是衰老的,而是总要寻找到某种可以进行自我安慰的民族自豪。中国人在承认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优越的时候,一定要贬低西方社会的精神生活;在承认西方的科学发达的同时,也一定要认为西方的道德堕落。所以中国人一方面想享受西方式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以民族的精神来拒绝全盘西化。这样,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之时,中国人就必然要到曾经引以为傲的古老文化中去寻求精神

支柱。

刘晓波：《在“气功热”的底层》，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0月号。

谈及备受争议的电视片《河殇》，王若望说他看过两次，觉得很好，“那些认为《河殇》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人其实还未真正看懂《河殇》——它是借长江黄河象征某种势力。”

“长江黄河不会讲话，把它作为反面人物，它也不会出来打倒你，这正是作家聪明之处！”

香港《明报》1988年11月9日。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甚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自己开始，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甚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刘晓波语，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

我演讲时,别人来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

同上。

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未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是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甚么东西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同上。

中国人无根可寻,或者说根本不用去“寻根”,根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从未断裂过。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传统文化这条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是这条根所生长出来的果实。进行改革,追求现代化就是要斩断这条劣根。

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2期。

正因为现代化是全人类的目标,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选择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不是任何民族的选择,而首

先是人的选择。正因为现代化使人活得是人，而中国的民族性则使人活得不是人、是奴隶，所以中国人才向往现代化。是人与不是人(人与奴隶)之间没法调和、互补。想过人的生活，获得人的权利，就必须抛弃民族性(非人性)而选择现代化。特别是在中国，必须明确在追求人的权利、生活和爱祖国之间，应该首先选择前者。决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地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难道一个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变成零的国家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吗？新中国不应该是传统中国的继续，而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中国。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界，民族性是一条界限，一个紧箍咒，甚至成为了权威、棍子和唯我独尊的尺度。换言之，中国人在学术上摆脱了政治衡量一切的教条主义之后，又陷入了民族性衡量一切的新教条之中。而且，民族性所特有的道义色彩又使人们从道德的角度对它敬若神明。“母亲错打儿子”却要求儿子宽宏大量，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祖国不是人的母亲，而是人的居住地，祖国无权以母亲自居。退一步说，即便是母亲错打儿子，儿子也不能原谅，原谅就是迁就错误，怂恿母亲继续错打。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在爱国主义的掩盖下错打无数人、干尽灭绝人性之事，难道就能因为爱国主义这个动听的名词而原谅吗？中国人难道天生就该爱那位屡教不改的错打儿子的母亲吗？事实上，不是母亲乞求儿子原谅，而是母亲大权在握逼你不能反抗，不想原谅也必须原谅。更何况根本不是母亲的人借母亲之名在错打儿子的人遍地皆是呢？

同上。

中国是个处处有特权的不平等的专制国家，它所提供的条件，最容易发挥人性的弱点，可以把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被抑止的人性弱点重新复活，发扬光大。……中国确乎是个大染缸，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世界也难免受到某些污染。这种感觉更加深了我对人类的失望，不仅是对中国的失望。

刘晓波：《洋沙龙与文化侵略》，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3月号。

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深重苦难的民族（特别是在近现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觉醒？为什么每一次苦难都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强烈的对传统文化的怀恋？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苦难非但没有使中国人走出传统，反而一次次地回归传统，这不是像每一次专制主义所造成的苦难只能产生新的专制主义一样，是一种恶性循环吗？难道不是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人长期在政治上滞留在专政主义之中，在思想上止步于传统文化之中吗？难道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文化精英们不应该对这种恶性循环负起一份责任吗？不仅是“反右”，不仅是“大跃进”，也不仅是“文革”，还有今天改革的停滞甚至失败，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自以为高明地把责任推卸给少数政治决策人，而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通体透明吗？

所谓对历史负责，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人，而是自我反省。

刘晓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香港《争鸣》，1989年3月号。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一种“人格狂妄”——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这种狂妄绝对地相信道德人格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圣人心同天地，视天下独一家，中国独一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用现代的术语说，就是人的道德人格具有绝对的自足性，它可以与社会、历史、人伦、自然同一，而且是“万物皆备于我”、“舍我其谁也”的同一。这样，道德修养以及人格便代替了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夫子的遗训至今阴魂不散，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看法。

同上。

七 主张全盘西化和殖民化

方励之、王若望、刘晓波等极力主张中国搞“全盘西化”，鼓吹中国应当“全方位开放”，“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宣扬“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鼓吹把近现代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学派“输入”“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以及上层建筑”，“作为主体作为基本作为引导”；公然叫嚣反对爱国主义的口号，胡说中国是“微不足道”的，应当“解散”；替西方国家出谋划策，怂恿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拼命主张中国走“殖民化”道路，胡说中国只有当“三百年殖民地”，补上“资本主义”一课之后，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

科技可以引进，那末，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意识形态，那是不能引进啊，有污染的。这个问题怎么认识的，我说，也要引进。他们的科技不是孤立的，是它那里意识形态，它那里思想基础带来的，我们光引进科技，不引进他们的思想，等于引进硬件没引进软件一样，空的。……我大声地可以讲，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远远的没有发达，我们缺，越学得多，学得好，我们富得快，发展得快。

王若望，1985年4月19日在上海城建学院的讲话。

在引进外国科技、学说、理论、艺术作品等等的过程中，先有个吃饱装足的阶段，这个阶段或长或短，但要想跳过它，那就只能不食。我认为，我国学术界的毛病不在食洋不化上，而在没有吃透“洋”之真谛，就半瓶醋浪当竖起某某主义的大旗，或确定其为资产阶级思想急于展开大批判攻势了。

对各国的科技、文化、艺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外国的学说、理论和彩电、录音机一齐涌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青年对所有涌入的新鲜事物学习、仿效、热衷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因此说，如果真的产生了混乱，那也是值得的，并非文化引进之过，更不是“食洋不化”或“消化主义”之过。

王若望：《“食洋不化”与消化论》，《新观察》1986年13期。

经济改革有反复，有走两步退三步，但还是要进的。进的途径就是要运用资本主义的，几乎所有的管理方法和社会条件、流通方法，包括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意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两种思潮的斗争，很激烈。

王若望：1986年10月28日在上海松江县文化馆的报告。

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恨透了30年这种东西，至少我这个经历恨透了30年东西，30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从感情上是这样。但从客观上讲，我们现在是全面落后的状态。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我这个

全方位概念，是让先进的文化全面的冲击中国，不是说哪个角度不要冲击。从经济、知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标准，全方位都可以冲击。但你不要先说哪个一定好，你不要先说坚持四条，坚持这个、坚持那个，我觉得没必要。

方励之：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的，所谓全盘西化，它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呢？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全盘的、全方位的开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整体来讲。我们整体文化比世界的先进文化要落后，不是在一个方面的落后，而是全面落后了。所以在面临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当然应当全方位的开放，不要先在没开放之前，就说你有哪个地方需要坚持，哪个地方是我们的忌讳、不能动的东西。我觉得在没有冲击之前说这话，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方励之：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我们现在面临的事实应该是全方面的开放。虚心地看看各种各样的文化有什么好东西都把它吸取进来，让之冲击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加以改造，这时候不带有任何色彩。我觉得先要看它客观的好坏。

同上。

大家注意到，在文化对比上争论是全盘西化，还是部分西化；或者说某些东西一定要坚持，不能改变；还是以彻底的心

情彻底地改变各方面的东西。我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它的实质精神就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

方励之：1986年11月19日在宁波大学的讲话。

我认为改革的目的是明确的，改革的目标是走向发达社会。而在看到如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公认的发达社会后可以清楚，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发达国家，是因为他们有下列三个共同特点：(1)经济强大是最明显的事实(人均年产值5000至10000美元以上)；(2)教育标准，普通教育普及，受过高等教育者占人口30%以上；(3)政治上都采取民主政治方式。如美国是两党制，西欧多党制。

中国要达到发达社会必须是这几个共同点都达到，但目前离此目标相距实在很远，中国还处在相当贫穷的状态，所以改造中国是相当艰苦的任务，每个人都得作贡献，不是一、二个人的贡献能解决问题。

方励之：1988年8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国问题演讲会”上的发言，《中国之春》1988年67期。

8月5日，刘宾雁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目前中国的出国潮问题时说：这是令人痛心的现象。他说，如果自己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也要到外国去，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从出生起就经历中国的饥饿、动乱，近年来又出现“溃朽”、“反自由化”

等运动，而全中国只有刘宾雁等几个人写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文章，当局却连这个也不能容忍，这不能不令年轻人自问：这样的国家为什么非要爱她不可？刘宾雁说，造成这恶果的责任，归根到底在于一些总是阻碍中国改革的历史罪人。

《刘宾雁在香港说了些什么？》，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8年第9期。

方励之昨日由新加坡来港作为期一周的学术访问，他在机场向记者表示，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就应走多党制，这样才能对政府产生制衡作用，达致较为公平合理的局面，他相信中国大陆将出现反对党，但不可能在短期出现。至于近期亚洲国家如缅甸等地出现了推翻政府的民间力量，他认为短期内这种情况不会蔓延至中国。

他认为现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都不成功，因为中国改革应向着全盘西化（即全方位开放），而为了脱离前总理赵紫阳所形容的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放弃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方励之去年5月前往西德访问时，已开始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了时。

香港《新报》1988年9月2日。

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治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

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甚么是“中国特色”。

刘晓波语，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期。

我认为，从近代开始，根本就不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存在的仅仅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中国这样一个自明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的可行方法不是在虚构的“冲突论”的引导下“师夷之长以制夷”，而是全面地、彻底的放弃任何企图进行自我安慰的幻想，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更严格地讲，不是作为向白种人的西方学习，而是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中国和西方之间没有冲突，有的只是非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别。换言之，想过人的生活就不存在冲突，冲突只产生于坚持非人生活方式的愚昧中，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香港在殖民化中的繁荣和大陆在封闭中的衰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中西关系的性质。

刘晓波：《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

毫无疑问，商品化是世界现代文化的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它不仅标志着自由经济时代的到来，而且标志着世界化——通过自由的商品交换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互相开放。商

品化与生产的技术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有机整体。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含义首先在于它的制度保证了自由的商品交换。没有英国人的殖民化所带给香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香港的商品化便无从谈起。我甚至觉得，西方人所推行的殖民化在客观效果上就是在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西方人在剥夺东方人的同时，也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带给了东方人。当今世界中的亚太经济奇迹，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殖民化。

同上。

在地理上，香港属于中国；但在自由港这点上，香港属于世界。

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上的自由港。

同上。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的确，殖民化不平等，人类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是没有这种不平等，那些落后愚昧的，处在封闭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民族就不会有内部的民主、

科学的要求,不为殖民化付出代价,就要为专制主义付出更大的代价。再强调一遍,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文化,就不会产生落伍的耻辱感,而没有落伍的耻辱感也就没有改革的要求,就会永远陶醉在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梦中。

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2期。

真正的启蒙应该是:目标——人(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振兴民族;手段——现代化(西化),也就是市场经济(私有化)、民主政体、言论自由、法律至上、科学精神、平等竞争、多元开放。就世界整体而言,殖民化使原来只属于西欧的自由竞争国际化,每个国家的人,作为世界公民都有权平等地参加这个国际化的平等竞争。

同上。

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至少不是完全赞成。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升起衰落。如果一个文化的确实要面临彻底的完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赞成爱因斯坦的“世界公民”的观点。他说,你不必太在意你是哪一国,要从整个世界来看。世界要往前走,中国可能有很多文化都要淘汰掉,彻底淹没,因为它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所以文化灭亡不一定是坏事,不需要太介意。

方励之语，载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8年10月号。

现在的情况，的确有时使人感到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没有凝聚力。许多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一种文化不行了，干脆散了算了。

同上。

你们外面看到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要改革、要四化，里面都是只顾个人问题，就是一种要解散的心态！这个大厦要垮了，耗子都出来了。先捞点钱，把钱存到瑞士银行。

同上。

中国社会受到谎言、虚夸和欺诳的糟害，几乎已经积重难返。

方励之语，载香港《争鸣》1988年10月号。

从宇宙学来看，从科学来看，中国都是微不足道的。

同上。

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我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

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刘晓波语,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期。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甚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300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同上。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指林则徐焚烧鸦片——编者注），揭开了耻辱的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苏晓康：《〈河殇〉解说词〉第六集〈蔚蓝色〉》，《河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71-72页。

如果全盘西化指的是全方位的西化，即不仅在科技上，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学习西方的话，我认为全盘西化也是可以的。搞儒家文化则纯粹是天方夜谭，是痴人说梦。

明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但社会到底进步了多少呢？过去只见反封建主义，现在还要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于浩成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主办的《传统与现代》报告会上的发言，香港《争鸣》，1988年12月号。

我们向西方国家学习是可以的，但只是限于科学技术这方面的学习，至多再加上一个经济的管理方法。至于在政治、思想、文化这些方面，那是不能向西方学习的。因为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的阶级本质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他是搞资本主义。一般我们都是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这种

主张,就是晚清末年中体西用论的翻版,是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问题在于体、用是不能分开的,你光学习外国的皮毛,而不学它的精神实质是不行的。所以现代化不是争论很大吗?现代化和西化的问题嘛,实质上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现代化。“西”字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东方文明就是农业文明,西方的文明就是工业的文明。这是发展阶段不同。所以西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方面的问题了,它的政治、思想、文化,有很多先进的东西。这些先进的东西,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东方西方的问题,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成果。

于浩成在“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研讨班上的报告,1989年5月。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有许多危机。当前我们也有危机,社会上进入了全面的危机,当然决不是全盘西化的危机。是复旧的危机、复古的危机。全盘西化的帽子到处飞舞。

包遵信在“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研讨班上的报告,1989年5月。

西方近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我们扬弃和改造传统文化的一个参照系,拒绝这个参照系,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西方文化思潮的出现,既表现了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又表现了面对这种挑战的回音。所以西化思潮是现代化过程中难于跨越,而又必须跨越的峡谷。

同上。

我们用不着担心中国现代化会不会西化，这是杞人忧天。现在把全盘西化当成一个武器来挥舞，就是妨碍现代化的进程。

同上。

现在海外的新儒家和国内一些人讲，所谓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个口号是动听的，但不符合历史潮流。我们知道现代化有个过程，有个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个历史选择。

同上。

当前有个口号是什么“中国特色”，但是当前我也没看到一篇文章能讲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同上。

八 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

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们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胡说民主是“以我为主”，“起点在于每个人”，煽动人们“要摆脱群体意识，冲破一切外在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的孤独状态”；拼命吹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认为西方社会的自由是“可爱”的，我们不如他们的“民主政治”；恶毒攻击我国“目前没有民主，连民主的ABC都没有”，侮辱我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跪着乞求自由”，咒骂“中国依然是贵族们的人肉筵席”；竭力宣扬“自由是天赋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责任”，散布“民主不是上面赐予的东西”，公然煽动人们给政府“施加它应当施加的压力”，号召人们“通过一些非暴力手段来迫使当局同意朝着政治民主和自由经济方面发展”；公开叫嚷四项基本原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公民，故应从宪法中取消”，主张应当“允许资产阶级思想代言人有公开的发言权”；呼吁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大陆“政治犯”的“遭遇提出抗议”，希望他们“应当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竭力美化1989年北京发生的社会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称它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说“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70年前的‘五·四’运动和13年前的‘四·五’运动”。

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却是把人依附在户口簿上,工作证上,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点。……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

王若望:1986年8月8日在杭州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改革者,不再是鸡了。我们愿什么时候叫就什么时候叫。过去我们是任人宰割的鸡,就在前年,去年,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作为政策是非常错误的,首先这是违反法律的。你们在座的几位就是杀鸡儆猴的第一批滴血的朋友。

同上。

我们有些人一听到自由就觉得很可怕。这是很不正常的。这种害怕本身就证明了一个问题,一个极大的谬误,也许是几十年的谬误。共产党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解放是什么?解放就是要让大家得到自由嘛。《共产党宣言》里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解放以后就不提这个自由了呢?幸福也不敢提了,一提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的幸福。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个讽刺。

刘宾雁: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理论问题,就是我们把资本主

义的一切都一刀两断，都看作是不能接受的，当然也包括新闻。政治性越强的我们越是不能接受。而我认为共性还是主要的。

同上。

关于言论自由，有些国家叫表现自由，范围更宽些，包括示威、游行、罢工，就是群众意愿叫表达。这种表现是和言论自由连在一起的。这个问题，我到美国去是我注意的一个重点，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论著很多。它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认为最神圣的是言论、信仰等，任何政府、议会不能对这个采取什么限制。……从美国的历史看，争取民主首先就是要自由。资产阶级很懂得这个道理，有很多书专门分析为什么要给人民言论自由。在美国也有很多政治上的反对派，美国采取的方针是让他去说，最后没人听他的，他就得认输了，服了，这样起码用不着搞爆炸、暗杀，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有利于统治。为什么那么多人往美国跑，那么多的发明在美国搞了出来呢？你不能不承认一定的自由气氛，一定的民主，是保障社会进步，保障人类发挥聪明才智的重要条件。

刘宾雁语，载《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12日。

人道主义，到最近在中国才合法化……难道这几十年中国人道主义太多了吗？不许谈人道主义、人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所有这些我们无产阶级不能接受。

刘宾雁：《我的新闻观》，1986年9月15日在黑龙江省记协召开

的新闻会上的讲话。

美国大众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先进的，是最彻底的，是最自由化的。……顺便我说一下电视。美国电视和我们电视，和我们中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晚上一个小时新闻里面，插进了很多我们的报纸和广播里面、电视里面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节目，就是新闻主持人对官员的质询。……从内容到形式跟咱们都不一样，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地位不一样，他的新闻记者地位不一样。我们《人民日报》记者部一度曾研究，记者部主任带领大家来学习美国的新闻述评。就是述评性的新闻，把（美国记者写的）东西剪下来，大家来讨论、学习。我就做了一个发言，我说呀，咱们也不是不会写这玩艺，我说问题不在于方法，首先在于咱们这个地位，我说我国把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咱们也不要求做无冕之王，我说咱们不做三孙子行不行？

同上。

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划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与西方相反，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斗争，而且西方文化越发展，越进入现代，感性越不受理性束缚，生命的创造意识越强，而中国文化自始就将活泼的生命力框在伦理道德的圈子里，造成了中国人生命力的枯萎，假如说中国缺乏性意识是一种性的阳痿，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对感性的特征造成了中国人精神

上的阳萎。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美国那个社会它还是有些可爱的，无非就是一个自由。美国没有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主义的人并不多，爱国主义这个词在中国还是很香的，在美国在西欧这个词不太香，有点接近于狭隘民族主义，因为这个世界同一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刘宾雁：1986年10月8日在安庆法制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一种片面的看法，往往把某些人搞无政府主义，要求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的思想 and 行为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是很不确切的。因为这样一来，很容易把民主、自由当成贬义词，把它们与资产阶级连在一起，似乎我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并不要民主和自由，只要专政和纪律，这只会在国内广大人民中和世界上歪曲自己的形象。

于浩成：《自由的两种概念不能混淆——对吴建国〈关于自由向往的“反思”〉一文的商榷》，《文汇报》，1986年11月7日。

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分立我想是可能的，这是民主化应当做到的。民主社会是多元制约的，单元的统治必然会造成独裁、专制。当然，三权分立在东方国家实行是不容易的，包括在发达的东方国家。

方励之：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

一个社会要能够真正稳定,民主进程发达,就要看它的整个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这个阶层有没有民主的意识。如果只是等待一个好的领导者来下决心,这是很可悲的。该争取的事情应当去争取,这正是我们应该在素质上不同于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地方,现在的大学生,在这一点上,是超过五十年代的。我还希望在这方面大家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感觉,也就是独立的意识。这样才能做出事情。否则,只是依靠上面赐给你学习条件等等,就一直不能改变原来的面貌。

同上。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要改革,成功与否看上面的决心。有人说,现在中国的确需要引进很多技术,有人说,中国现在最需要引进一个总理。这是开玩笑。是说引进什么都没有用,大概只有靠引进关键地位的才有用。这个笑话的意思表示这个地位在中国非常关键。但是我觉得完全依靠上面的这种决心,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只依靠上面本身就不是一种先进的意识。要实现一个民主社会,只有上面给你民主,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本身的含义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然后每个人去争取这种权利,然后组成一个社会。上面赐予的东西,不叫民主,那叫宽松,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个词。宽松就是说给你松一松,原来捆得太紧了,直径只有一尺,现在给你松到五尺。但还是有个头在牵着

你，直径再大，还是有个圆心在牵着你，这圆心是谁呢？所以这种宽松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民主是我们应当有的权利。要靠我们去争取，才能真正得到。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并不一定要非常激烈，通过舆论与各种渠道，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

同上。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到底有什么用？我想为社会尽责任，到底这个社会让不让我尽责任？或者说尽了责任以后到底对社会有没有推动？说得更明了一点，就是想对社会尽责任，社会还不要你。我觉得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说一点作用也没有？昨天来这之前，我们有个小小的聚会，有个同志说，现在流行一个顺口溜：“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现在我觉得的确是这样。有些东西，是你不去做，你做了以后发现他也不敢怎么样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民主就是靠一步步争取来的，譬如说批评领导人，就是一个民主的标志之一。现在是谁也不怕谁。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至少是试探着利用这种权利。

同上。

对于民主的理解关键是要承认每个人自己的权利，用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比较敏感的词说就是“人权”。人权我们不大敢说，其实人权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人权就是每个人生

下来就都有活着的权利，即生存权利，还有思想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婚姻的权利等等，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所谓人权。以前我们把人权说成非常可怕的“洪水猛兽”，其实是非常普通的。当然现在对民主的认识开始有所改变，把“自由”、“平等”、“博爱”认为是好的精神遗产提出来。

方励之：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民主是以个人开始的，以“我”为主，政府对我负责。……政府靠纳税人维持工作，靠公民维持政府运转，所以政府必须对公民负责，这是“民主”观念。

同上。

我们有我们的独立判断标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知识系统，我们有我们对正确的判断，对真、善、美的判断，不是受权力的左右，这样我们才能够形成一股知识分子意识的知识分子的阶层，这样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而不是所谓的民主。

同上。

民主的含义首先是每个人有权利，也就是首先承认人权。民主观念差，首先就是人权观念差。而作为起点在于每个人。……民主意识的起点是从下到上，用这个观点衡量，中国存在着大量的非民主的意识及非民主的作法。

方励之：1986年11月19日在宁波大学的讲话。

中国的极“左”路线到底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一直到不久以前，人道主义在中国不是还是一个禁品吗？……极左路线在中国的核心，就是对人的蔑视，对人的摧残，对人的冷酷。……人不是人，人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上学，不需要旅行，不需要思考问题。人只需要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只有一个肚子，而且这个肚子也无需填得太饱，这就是人只需要他在阶级斗争的会场上喊口号，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去锄地，去赶一只牛在那儿犁地，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这在我们的指导思想里是有的，而且说过这个话，人的生活不要提得太高，饿不死人就可以了。

刘宾雁，1986年11月21日在南开大学的讲话。

自由为什么成为可怕的东西？自由到今天仍然是可怕的，在某些人心目中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这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但是仍然使我们某些同志半信半疑的，甚至持否定的态度。自由总不是那么太好，总有点可怕，有点危险。

同上。

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在六年前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北大进行了自由竞选，而结果呢，的确有两个同学给选上了，也当了代表。但是后来，他们在分配工作时，被穿了小鞋。这是六年前

的情况。今天并不是没有阻力了，仍然有人要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方励之：1986年12月4日在中国科技大学人民代表竞选会上的讲话。

所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婚姻自由一样，其中“自由”一词就是指不得用人为了的强力去限制、去压制（思想言论）的意思。有同志以为这是在鼓吹绝对的或无限制的自由，故而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实不然。问题在于，像“绝对的”或“无限制的”一类概念也是多义的。倘若它们意味着超越一切时空、超越物质存在，那当然是错误的、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它们不过是指特定的问题上完全摆脱来自他人的强制，则是可能的，也可以是正确的。恩格斯就说过“……而在莱茵河地区，我们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这种话。有的同志，当其反驳“绝对的”言论出版自由时，把“绝对”一词理解为超越一切时空之意；但是当他们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即相对的思想言论自由时，却又偷换概念，把“绝对”理解为不受他人强权限制和压制，从而公然主张要对他们心目中的错误的思想言论实行惩罚制裁。这显然是违反起码的逻辑规律的。

胡平：《“自由”的歧义与歧途》，《新观察》1986年第21期。

既然承认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也有劳动人民的一份斗争功劳，并肯定了这是一次人类精神大解放，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几样标志着“大解放”的政治要求就成了非批它

几十年不可的洪水猛兽了呢？

王若望：〈论中国人的“心防”——兼评梁华〈论逆反心理〉〉，
香港〈百姓〉1987年7月16日，第148期。

问：您在中国担负什么使命？

方答：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不承认个人的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在中国，人们甚至不懂得民主的起码知识。我们必须教育自己懂得民主。我们必须懂得，民主不是领导人能够赐予我们的某种东西。从上面来的民主不是民主，而只是一种放松控制。将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方励之与西德〈明镜〉周刊驻意大利记者邓天诺的谈话，1987年7月27日。

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价值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智慧所拥有的批判力量、创新力量、超前力量。他既不能听命于来自上层的行政权力，也不能迎合下层的公众舆论，他只有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外在东西的智慧，思想、灵感、想象的实体之时，才能成为人类的头脑。

刘晓波：〈论孤独〉，〈百家〉1988年2月。

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体的体系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也就是传统文化本身的自我否定，而这种否定的核心首先是摆脱群体意识、冲破一切外在的束缚，进入一种自

由的孤独状态。

同上。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智慧，民族的灵魂，人类的预言家。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就是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提供“超前意识”。知识分子的视野必须在现存 的观念、秩序之外，必须是冒险者，孤独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远之后，人们才可能发现其价值。

同上。

新闻自由所受的限制，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闻的问题。我认为新闻自由的问题只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使人们通过它，可以看出共产党对许多问题的态度。比如它对人民的态度究竟如何？它为什么要限制新闻自由？它是不是相信人民？是相信还是害怕？是重视、尊重还是瞧不起？假如它信任他的人民，那么它就可以完全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报刊上予以揭示，它就会欢迎人民持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在报刊上予以表达。假如它重视人民，那么它也会这样做，因为它不这样做人民是不答应的，人民会起来反对它。可见它是既害怕人民，对人民又是轻视的。

反过来，人们又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即对待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和它自己对今后所承担的责任究竟抱什么态度。众所周知——连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四十多年来我也看得一清二楚，共产党对人民犯下了不止一个错误。

如果说，它是很负责任的话，那么它对人民便应该有一种忏悔的心情，应该明白没有把握自己今后绝对不再犯错误。对不对？没有理由不去改革我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变，就意味着你这个党的地位也没有改变，而这个党的健康状况却远远不如二十几年以前了。那么，我又有何资格、有何根据说我今后不再犯错误呢？更何况每当共产党犯下一个错误时，总是给很多中国人带来巨大的损失，甚至于灾难！因此，你如果对人民是很负责的话，首先这就应该放开新闻自由，实行新闻改革。

刘宾雁：1988年6月在联邦德国鲁尔大学的演说，《政治改革与新闻自由》，香港《争鸣》1988年1月号。

欧洲和美洲的整个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点：新闻自由是民主化首当其冲的一个先决条件。你不能因为它来自西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将它拒之于千里以外。别的不说，你自己已经做了三十多年实验，而这个实验的结果恰恰证明你自己是失败的。如果说新闻自由的民主，我们要不得，我要搞我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搞无产阶级的民主，那么很好，你当然可以搞，然而三十几年下来的实践证明了你最后搞出来的竟是一个法西斯专政！你还有什么权力再去拒绝一个正被人类普遍接受的文明呢？！

同上。

有没有“新闻自由”，这绝不仅仅只是我们能不能看到一

张使我们满意的报纸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我们整个民族，涉及到中国人的素质是在提高还是在下降、是进化还是在退化的问题。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人如果除了他自己周围直接所能见到的范围之中，他不了解世界，不了解中国，甚至于不了解本市本省的变化、问题及各种信息。大家想一想，在这种一片朦胧的情况下，他的智力，不是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又能是什么？……

以这种蒙昧状态作基础，中国人便自然而然地认为外界的一切与自己无关。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你不需要我知道，既然这些事情你毋须乎来告诉我，那么反过来我也没有必要去操这份心，反正整个国家都是由共产党在那儿一手操办。于是久而久之，心理上便养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冷漠，对同事、对社会、对共产党、对整个中国的前途，大家理所当然地不予理睬。即使是真正有一点责任心的、有一点热情的人，也会因为感到无能为力而放弃，叫做我想管但是我没有办法。

同上。

综观 1985、1986、1988 年的学生运动，中国的大学生之所以要走向街头，要张贴大字报，要突破各种禁令去冒各种风险示威游行，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彻底性与不坚决性的抗议。中国大学生向来是中国民意的一个最敏感的表达者。

为什么大学生要站出来？为什么他们要上街？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中国的民意没有别的途径可表达。从报纸上看不

到大家对社会各种现象的真实态度,听不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共产党仍然想把舆论控制在一个统一的声调之下。这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很多出气孔已被堵死了,因此闹不好就要发生爆炸。像我这个人之所以两次被开除党籍,不都是为了同一个原因,即在报上说共产党真正的、最严重的错误,要说共产党内黑暗的东西,我还远远没有说出来。

同上。

中国的政治气候,近一个时期有了改善。(这)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民赢得的,就是因为有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不是领导人的恩赐。

我们学生现在所说的民主是在人权基础上说的,就是大家不管任何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有说话的权利,有思想的权利,有其他方面的人权,不管领导人还是被领导人。如果用更加明显的话来讲,我们学生所说的民主,不是上帝给予的民主。

方励之:1988年5月16日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谈话。

刘宾雁说,现时中国大陆缺乏一份独立的民办报纸,使信息的传递受到阻塞,人民也无法了解自己的地位和中国大陆的现况,这样对整体的改革和发展是一种妨碍。

他续称,现时中国大陆整个社会机制均存有严重问题,社会低层存在着的问题往往被人故意的掩盖着或根本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一份独立的民办报纸,便可以缓和这些矛盾,并有

一些如反对党的制衡作用。

刘宾雁认为，中国人民是很好的读者，他们都很信任记者，但现实中国大陆的记者，却在不断的退化，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十年来，记者的工作受到很多限制，写出好文章也没有地方刊登，因此令他们养成不思考和不找资料的工作习惯。

香港《东方日报》1988年8月6日。

中国目前没有民主，连民主的A B C也没有，所以，中国目前应向民主迈出第一步。

中国科学家正在中国民主化促进运动中起着带头人的作用。科学家是自由化运动的必然领导人，因为他们理解独立思考 and 思想交流自由的重要性。

方励之：1988年8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讲演。

民主这个基本概念，也具有世界共同性，当然各民族不一样，吃饭就不同，但是人权至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些基本的就没有什么不同。现在有人千方百计说有特殊性、特色也对，但是在基本点上谈不到。实现现代化，中国周围的一圈——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只要一放松，都向现代化奔去，这是共同趋势，是潮流，想不现代化都很难。中国就有很高技巧，就能保持自己不现代化。

方励之在北京大学“草地沙龙”的对话，香港《争鸣》1988年9月号。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所讲的民主概念和毛泽东讲的民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毛讲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民主作风，就是领导人要听取意见，或如现在提倡的对话。而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权利。但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若说超前也的确是超前。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就谈不上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首先要有这些东西，然后才是民主的架构、民主的运作，后者可能有美国式的、加拿大式的等等。

方励之语，载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9月号。

方励之说，香港在1997年后的政治地位问题，不能单靠中国给与，而是要靠港人自己争取的。他又感到香港比大陆开放得多，而且言论自由，反之大陆就有很多在宪法上列明的自由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都未有施行。

目前最急切要进行的是政治改革；他又认为，台湾现时在经济及政治方面，都比大陆走前了一点。

香港《新报》1988年9月2日。

在西方，个人的权利与责任都是先天的，因而自由就是“天赋人权”。而在中国，人们争取自由的口气，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口气，总有种乞求的味道。不是在争取自身天赋的自由，

而是向在上者乞求自由。正因为中国人理解权利和责任都不是内在于每个人的，所以就必然要等待恩赐。自由最核心的意义是：一个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没有人有权恩赐，更没人有权剥夺，如果把自由理解为当权者的恩赐，那就没有自由。因为权力不在被恩赐者手中，而在恩赐者手中，他有一天恩赐了，就总有一天会收回，赋予和收回成正比。而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但不拒绝恩赐，反而要为之掉泪，为之激动；非但不感到耻辱，反而自豪加荣光加决心加誓言加一大堆感激涕零。在争取自由的口号中听到乞讨的声音，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可以想象，一个人跪在皇帝面前去乞求自由，皇帝开恩所赐给的还是自由吗？能跪着乞求自由者还会有自由吗？多少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跪着乞求自由。

自由是天赋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责任。自由是痛苦，是冒险，是孤独，是天才的事业。

刘晓波：《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新启蒙》1988年第10期。

于浩成说，中国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之一。中国代表近几年来在联合国或其它国际会议上，开始改变了过去在讨论人权问题时那种躲躲闪闪、力图回避的态度。保障人权已经被公认为国际法的一项普遍原则。那种藉口不容许别国干涉内政而拒绝讨论本国的人权情况是站不住脚的。……

于氏认为，不经过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是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恰恰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

段。这一点对于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阶段民主改革阶段，直接从封建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尤为重要。

于浩成指出，50年代初期的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报告中还会提到保障人权的问题，但从50年代后期起，保障人权的问题就很少提到。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所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令人更发指。

于浩成说，我听有些人说什么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人权问题。中国报刊上曾于1979年一度出现“批人权”的文章，说什么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后来又于1983年一度出现大批特批人道主义的浪潮。这种错误做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现在提出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但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长久以来却是大陆最忽视的，诸多弊端便由此而生。

香港《明报》1988年12月10日。

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北方粗话）的地步。

刘晓波语，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期。

现在实行民主，实际上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问题。

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也像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在政治上也在一部分人中先多一点民主，即更多地享有一些民主权利。例如在学校中，在文教部门中，在学术团体中，在知识分子中，民主实行得更充分一些。例如选举，不再由上面确定候选人名单，放手让群众选举，又有什么不可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选上个别坏人，群众可以行使罢免权。这样反而可使人民群众受到民主生活的锻炼。现在我们的一些学会、协会，几乎都是党委在选举前先审批候选人名单，然后走一走民主形式，由群众举手或划圈通过。这种做法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这又与经济文化条件的不足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呢？

于浩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
《文汇报》1989年1月14日。

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因为它正在施加它应当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的目标在于逐步地、通过一些非暴力手段来迫使当局同意朝着政治民主和自由经济方面变化。

方励之：《中国需要民主》，法国《解放报》1989年1月17日。

中国民运分子周六呼吁知识分子，要敢于发言，表达民主人权的要求。

方励之说：“知识分子单是改变思想并不足够，他们必须付诸行动。倘若不发言，便没有希望。”

方励之在北京一间书店的接待会上发表上述谈话。

《东方日报》1989年1月30日。

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犯所知似是不多，美国新闻界从来没有报道过他们的遭遇，华盛顿当局也没有像声援苏联政治犯那样，为他们的遭遇提出抗议。我认为美国政府过于重视与中共的关系，不愿得罪中共。

刘宾雁语，载台湾《联合报》1989年2月20日。

我认为要争取的第一步是人权，人权的涵义应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政治犯的释放，以及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也就是要让不同的声音与意见出现。

方励之，1989年2月23日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的谈话。

方励之要西方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出于狭隘的目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不一样。他们对前者（指苏联东欧）公开表示关注，甚至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对后者（指中国）他们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为此，他抱怨说：“这种做法不仅表明了一种错误态度，而且根本不符合人权精神。”

美国《华盛顿邮报》1989年2月26日。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最近10年以来的情形确实有些改进。但是，现在的中国（大陆）当局继续忽视人权问题，而使得情形很严重。第一，而且也是首要的一点，中国（大陆）当局仍未完

全承认,上述违反人权的情形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例如,直到现在,他们仍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及“正确的”。自从那时以后,对于有异的人的镇压和迫害从未停止。……1983年间反“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此一政策的明显的例子。世人不应忘记,北平民主墙积极分子魏京生等政治犯在牢中已关了10年,迄今仍未释放。

在此一阴森酷烈的时期,若干提倡人权者的努力从未中止,并且获得世界各地人权积极分子和组织的支持。因此,中国(大陆)的人权积极分子,已成为全世界的鼓吹人权趋势的一部分。

方励之:《人权岂有双重标准》,香港《时报》1989年2月2日。

布什总统对方励之没有出席宴会表示遗憾,方励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布什总统的讲话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表明他要肯定中国要有人权。”方励之星期一告诉记者说,他认为美国应当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美国之音”1989年2月28日报道。

对于东方民族来说,创造经济奇迹并不太困难,但是实现人的自由权利则相当困难。这又使我想起了古希腊的一位先哲的选择:宁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受苦,也不愿在一个专制的

国家享福。

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2期。

我以为，在现代的中国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纯属政治笑话，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叫做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更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毫无民主的国家里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只能导致封建主义的全面复活。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是击垮封建主义的最有效的力量。而在中国，当封建主义还遍布华夏大地且根深蒂固之时，却反对反封建的资本主义，这不是为虎作伥、倒转历史进程吗？只要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能完成，那么中国土地上的任何革命都将最后走向封建主义。

同上。

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早在70年前，北京各校学生的民主爱国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震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得到全世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历史的发展不可能退到1919年的历史背景，历史的进步推到了今天，“民主、人权”的口号为什么又重新的再提起？！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权力过分的集中，仅仅依靠“圣人独裁”的“精英政治”，不但不能使改革的道路更进一步的深化，而且必然会使改革走向“文革”时期的死胡同，导致又一次胸无远略的闭关自守。社会要进步，就要走

向法治，而不是家长制、终身制和官商衙门制的人治。

五四运动的壮举至今已有70年了。然而，在今天的历史上同样民主、人权的呼声回响在中国的上空，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在淌着鲜血！国家没有民主将是一个死气沉沉没有活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进步！改革就是一句空谈！

青年学生们，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农民在期待着！工人在期待着！各国人民在期待着！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吧！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到时候了！

1989年3月3日“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 胡子俊”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

《改革建言》提出：要修改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公民，故应从宪法中取消，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香港《明报》1989年4月20日。

方励之谈到：要外国公司用抽走资金的办法，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他说“至少把人权作为投资的条件”。由于随着大批抽走资金而带来的危险，经济将崩溃，但是国家将幸存下来，然后它就可以“在内部做任何事情”。他并献计，由世界银行暂停提供贷款和信贷开始。

《亚洲华尔街时报》1989年4月25日。

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像科学的原则和标准一样，是普遍的，无所谓“东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

方励之：《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台湾《联合报》1989年4月26日。

1989年4月29日晚上，在美国三藩市马连郡“89年中国研讨会”会场所在地，由《百姓》半月刊主办，举行了《百姓》创刊八周年座谈会。会上，吴祖光、王若水、刘宾雁、戈扬等人就所谓“民主”问题发言：

吴祖光：我们希望迟早能在国内看到《百姓》，那时恐怕就是中国的百姓能掌权、当家作主的时候。……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还做不到老百姓享有自己充分的应该得到的主权，现在看来也还是遥遥无期。

王若水：建国以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以为共产党掌握政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宪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既然写在宪法上，而且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共产党代表人民来掌握政权，就是民主。后来我才慢慢懂得了一些道理，就是说共产党曾经代表过人民，但不等于说它永远可以代表人民，有些事情它可以代表，但不等于一切事情都可以代表。从1949年以后，我们一切的机构都挂上了人民的名称，人民的政府，人民的银行，人民

的报纸，人民的法院，人民的警察，还有人民币，人民监狱，一切的一切都冠以“人民”，似乎人民是无处不在。但是老实说，这个人民是被代表掉了。

共产党自称代表人民，而真正的人民已经不是主人了，换句话说来说，就是阿斗。他自己当不了主人，会拖一个人来代表他当主人，这就是共产党。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由名义上的主人，变成了实际上的奴仆，由名义上的公仆，变成了实际上的主人。这是一种颠倒过来的变化。……我们过去培养了一种依赖意识，没有一种独立性。培养一种依赖顺从，那么，老百姓百依百顺的时候，上面就要为所欲为。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究竟你想不想当主人？能不能当主人？任何人都可以当，就是阿斗当不了主人，因为他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素质。还有你敢不敢当主人，当主人要负责任的，是要争取的，不是恩赐的，在斗争中一步步学会。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等你长大了才来当主人，而是在斗争中，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走向成熟。我觉得现在这个学生运动，是一个极好的开始，是1989年的一声春雷，他们走上街头了，不是像过去一样，天天在家发牢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发牢骚，可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每个人都一肚子气，但每个人都不知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会摧毁每一个人，起到破坏的作用，只能让人消极，产生一种无力感，或者也是一种异化感吧。无论如何，尽管这个国家是我们大家组成的，我们都无能为力，怎么办？现在变成行动了，我们就能够起作用。虽然看来

很艰巨，不是一下子可以得到，但我们是有力量的。这一次学生运动使我看到了行动的力量，百姓的力量，证明了我们不是永远要忍耐，我们可以通过斗争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一意义上，学运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刘宾雁：我的看法是大陆现在的矛盾是官僚和人民的矛盾，说是党和人民的矛盾也未尝不可。……从40年代万众欢呼，感恩戴德迎接共产党，到现在恰恰相反。当年我们愿意把生命交给共产党，认为它是光明的化身，真理的化身，而现在无人相信这一套了。我觉醒得比别人慢，我看学生运动是冰山一个尖，从来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客观需要，从来都是最先表达人民的政治情绪。从毛泽东时代起，共产党拒不实行民主的一个最常用的理由是说民主和自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但近年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民主变革，已使他们理屈词穷。在中国人民丧失起码的民主权利这40年中，中共以其决策的多次失误，使中国人蒙受历史上罕见的灾祸，以致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中共官员的腐败成为不治之症。

香港《百姓》半月刊八周年纪念号，1989年6月1日（第193期）。

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工农感情，想想看，这对促进人格尊严是有积极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强调思想改造，哪怕一点主体意识也被限制了，当资产阶级思想限制了。

包遵信在“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研讨班上的报告，1989年5月。

4月12日那天，天安门有三个人下跪，当时跪还是不跪产生了争论，跪还是太封建了，不能下跪，我们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中国从“五四”以来我称为民主超越论。其实民主就是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你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你都要作这个事情，你不能基本事情都没有作，你说我比你那个更民主，更超越，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我理论上的发明。1939年陈独秀坐了监牢之后，他自己就懂得了这个道理。总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不管它虚假不虚假，民主有基本内容，有普遍性。如果民主这个普遍性应该说是东方西方是一样的，在某种形式、制度上可能不一样，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一样的。比如人权问题，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要人权，那可能在道义上不敢这么说，理论上承认，但在法律上人是不是有人权，人是不是有安全感？我个人认为80年代我们新的思想启蒙，应把个人解放，个性的自由，个体的创造精神摆在客观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从“五四”的起点上超越“五四”，不然的话就像人说的的那样，你们还没有超过“五四”的水平。

同上。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民族的解放，

民族的独立，确实有着它不可替补的历史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跟我们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强调以社会为本位，它们二者结合起来了，那么这样就在有意无意中成为反对个性解放，特别是从1925年之后，最明显的是30年代之后，39年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实质上是宣扬传统道德的，不过讲的是共产主义而已。包括毛泽东本人好多著作，这个大家应很好的总结。42年延安整风，当然政治上我不讲，思想文化上是强调工农的思想感情来限制受过西方自由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解放后就更清楚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话，还不如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后来发展过程中阻碍了启蒙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我就想到80年代我们围绕当前改革文化热，看成一种思想启蒙，今天的启蒙不能只停留在振兴中华、高喊爱国上，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必须从五四的启蒙强调民族解放上进一步确定人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为主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继承了五四传统，超越了五四传统。中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人没有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基本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怎么能成为现代人，这可能吗？

同上。

“五四”在我国是第一次带有启蒙意义的现代文化运动。“五四”既然是启蒙，所谓启蒙，就应把人的解放当做突出的主题。启蒙运动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潮，那么人文主义思潮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的五

四运动既然是一场启蒙运动，也应该是人的解放。我认为人的解放应该是五四运动的实质。

同上。

无论斯大林时期，还是以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及中国的毛泽东时期，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包括东欧国家的，事实很难说是社会主义民主概念比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民主高出千百万倍。而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一直没有建设好。

严家其：1989年5月在“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研讨班上的报告。

中国的教训，归根到底缺少一种民主。没有民主，人民的意志不能自由得到表达，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反映人民的情绪、愿望、要求，那就只能借助一些不正常的途径。

同上。

所以有一个想法，正像我们在经济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在政治上在一部分人中民主可以先走一步。但是有些人反对这样的提法，说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共同的，不应有人多享受一部分权利，有人少享受一部分权利。既然民主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全国11亿人口就都能够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在一部分人当中有先有后，根据不同的条件，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于浩成在“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研讨班上的报告,1989年5月。

我们原来提出民主,民主后来怎么中断了?怎么失落了?五四时就提出搞民主,后来为什么没实现呢?到现在民主提起来还是那么困难嘛。原因何在?很多人都思索这个问题,当然也作了一些答案。……现在看起来,恐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特别是个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如果连个人自由都没有的话,那就谈不到什么民主政治了。1949年我们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本来应该由革命政治转为民主政治了,可是我们还是强调着个人服从组织,说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总强调每个人都成为螺丝钉。个人的主体地位,个人的权利自由都被完全抹杀了,把个性完全淹没在共性当中了。我们强调国家集体利益,但从来很少提个性的解放,个人的自由,应有的权利。一提到就挨批。个人主义万恶之源,甚至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一个正确的口号,也是挨批的。直到不久前,就是前两天,还有人写文章,说是我为人人是第一位的,人人为我是第二位的。何必这样分呢?

同上。

比如说刚才讲的言论出版自由,总有一些人要限制这个自由。理由呢,你实现这个自由不能妨碍国家、集体、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这样,那就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来限制甚至抹杀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你发表这个文章,这个文章

国家是有好处的；你发表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对社会是有危害的。那完了，那什么都不要发表了。过去我们就是这个借口，借口国家的利益，什么社会的利益，实际上这是虚幻的。事实上可能只是少数领导人承受不了的问题。

同上。

为了掩饰一个错误，不惜以犯十分错误，这一愚不可及的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不以为奇，经本人研究，这样的不光荣事件十有八、九是在报刊新闻设置“禁区”来实现的，而十有二、三是由党的官吏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知识分子和敢说真话的人采取打击报复，来掩盖自己的腐化劣迹与残民以逞的丑闻。“禁区”的内涵，也就是藏垢纳污！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以及见不得人的种种弊端和腐朽的部位。“禁区”的增殖，也就是在大幕掩盖下，我党的腐化变质正加速的扩大化。为不许反映文革的真实历史，不得建立文革博物馆，不让批判毛泽东，不真实刊出人民的批评和建议，不得刊出与党的宣传口径不同的见解，不得批评当今的领导人等等，这样的禁区不胜枚举。……荡涤这么多禁区之道，只有实行新闻改革，采纳学生们的意见，即允许民办报刊，新闻出版言论充分保障其自由。党的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无权干涉，……今年第一季度连续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其总根源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把知识分子看成眼中钉，更关键的是我国的新闻传媒不自由，不公正，它只能做官方的喉舌。还有一条就是这一类掩饰本身的差错的大小不同的不愉快事件九九归一，几乎都是由1987年的

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根子引发出来的。由此看来，赶快重新评价胡耀邦，永远撤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要求是十分必需，是合情合理，也合乎马列主义的原则，与此同时，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势在必行，它是深入政治改革，真心做到安定团结的发动机和开路机。

王若望：《致邓小平公开信》，1989年4月25日。

吴祖光说，长久以来中国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而中共领导人极端害怕民主自由，害怕知识分子不肯给予人民民主。

台湾《联合报》，1989年5月2日。

王若水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声称要为人民带来民主，事实上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却高举“人民民主专政”、“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等混乱民主实质的说法，实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导致中国人民毫无民主可言。

同上。

政治，美国的同英国的不一样，法国同中国又完全不同，但是民主的原则却不能分为东方的或西方的，也不能分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长期以来我们正是用这种概念掩盖了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严家其：《民主原则不应分东西方》，香港《文汇报》，1989年5月16日。

我们也不希望隐瞒我们的政治观点在某些方面同政府和

党的不同这一事实。我们公开宣布我们正在提倡：充分的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建立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消除陈旧的政治思想。

王丹：《中国：学生将为民主战斗到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89年5月17日。

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人民对人民权力的代表——公仆的舆论监督基本没有实现。现有的新闻媒介也没能够成为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行使宪法权力的工具和途径。

这是由两点决定的：

首先，新闻工作者都是在体制内取得身份的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这个体制。

其次，新闻事业完全被看成是执政党的事业。新闻机构成为党和政府的机关组织，人事、经费都依赖于党政体制。

毫无疑问，对权力的批判，必须相对独立于这个权力。如果人民对执政者的批评监督都由被监督者直接控制，这实际上就取消了人民的监督权利。被权力控制的舆论，不过是执政者的回声，舆论、监督实现的前提是：公众的监督权利受到保护，不受权力的干涉。事实证明，在这个体制内部所进行的新闻改革都不可能是彻底的，它只能溶没在这个体制的弊端之中。

私营新闻机构正是从制度上打破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局限。它的工作人员是自由职业者，私营新闻机构自由经营，自负盈亏，这将保持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相对独立于党和政

府，真正反映来自民间的舆论，并保证民众有畅通的渠道了解国情和政府决策。

私营新闻必然打破舆论一律带来舆论多元，从而使社会中多元的政治、经济利益表面化，公开化。

这就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基础。

当然，任何一个舆论工具都必须服从一个东西，那就是法律——多元利益的集中。

1989年5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署名“与兵”，题为《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

记者问：从你的讲话，最重要的是民主，对中国人来说，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在美国民主就是投票选新总统。

柴玲答：我想民主就是天然的权利，但在以前中国人性被压缩的很微细，没有人权可言，譬如说，学校情况，分配问题，党要你去那你去那，党和公安、军人都是一样，没有监督，所以官倒贪污等腐败现象和改革十年来的一些弊病。先富起来的都是有背景的和权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人由于二千年的统治，都需要有个皇帝，没有言论的自由、新闻自由、人身保障，有未来也不抱希望，在这次运动之前，中国人是信念危机，人人向钱看，通过这次运动，给中国人一个信念感，就是中国人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不是靠外国人，还是靠我们自己。

记者问：民主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能一起存在吗？

柴玲答：我没有特别深的理论上的研究，我想这是一个最

基本的人性要求,我想它和共产主义基本思想并无背离,在我们目前要求的民主还很自然,是一些基本的天然权力,没有和一些主义发生联系,我们只是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香港《明报》1989年6月16日。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简称“89中国民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近70年前的“五·四”运动和13年前的“四·五运动”,因为这场运动的性质,并不是单纯的民族危机下的求生存的斗争,更不是为执政党内部斗争需要所左右的运动,而是一场独立不倚、绝不妥协的人民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伟大斗争。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让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属于全人类文明成果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开花结果。因此,由北京学生率先发动、中国各阶层广泛响应的这场运动,其实质,是在中国这片广大土地上为全人类的尊严和权利而斗争。

严家其、吾尔开希:《国殇月宣言》,香港《文汇报》1989年7月5日。

意识形态的解放,宣布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使得压抑了多年的知识界,自然会要求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一种自由的思潮出现了。要求改变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我叫它作“封建专制残余加上斯大林主义合成的党、政、军、财、文意识形态”,一个很硬的硬

壳,很不容易突破的硬壳;而思想解放就是要突破这个硬壳。

苏绍智:《制度造成了邓小平悲剧》,香港《百姓》半月刊1989年9月1日(第199期)。

无论反对派言论多么错误,也应当允许其得以自由传播,因为它并未得以传播之前,是否真的是错误的,只能是审查机构的判断结果,而对一种理论或信仰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多元化的,不可能有一定的代表。因而审查机构的判断结果无法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判断。可见,只有允许充分地发布意见,才可能辨别出言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王丹:《论反对派的言论自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9年9月。

只有允许反对派言论得以自由传播,允许反对党和党内反对派存在,才是保证民主政治得以确立,从而确保社会政治生活秩序正常的正确途径,相反,限制言论自由正是导致社会动乱的症结所在。

同上。

在中国现在的新启蒙运动中,知识精英必须首先关注言论自由,并勇于对任何不公提出批评,包括政党、政府的决策行为在内。因为,作为知识分子,能对社会发生作用的只有言论,如果失去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无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不能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持批评态度,就无法摆脱依附于

政党和政府的“皮毛”地位，我们的命运将不会比40年来有所改善。

同上。

言论自由作为载入宪法的重要原则，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横暴和专制的践踏，这突出地表现在当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对反对派言论的非法暴力限制。这种限制等于强制暗示这样一个公式：真理 = 无产阶级世界观 = 马克思主义 = 党的世界观 = 党的领导机构的声明 = 最高领导人。显然，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无需辩驳。

同上。

九 煽动学潮和动乱

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们早在1985年就煽动学潮，怂恿学生“闹事”。他们利用海内外刊物、讲坛，散布大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对党、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行挑拨、煽动。北京发生动乱之后，他们勾结海内外、党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与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紧密配合，演出了一幕幕制造动乱的丑剧。他们的丑恶嘴脸，在种种“演说”、“呼吁”、“宣言”、“声明”中，在上窜下跳的各种行动中，业已暴露无遗！

对于这些事情，我曾给学生公开说，主要的要看学生闹事的原因是什么？真正闹起了事校长也管不了；如果闹得没道理，自然不用校长管，也不会闹下去了，我是这种看法。我曾建议科大的学生想一想，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学校食堂当然也是需要改进的，但根本问题是物价的问题。我就建议学生应当去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如何去解决。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闹事可以解决，也可以闹事。

方励之，1985年3月在浙江大学的讲话。

刚才我说中央也非常重视大家的“动作”，这些也是不舍

糊。我可以和大家说，我在上次开会时，最后一天，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找了几个参加会议的校长去座谈。黄辛白同志非常坦白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学生不要闹事”，如果说哪个地方的一个大学闹事了，比如说浙大学生闹事了，那么浙江省省委就别干什么事了，完全围绕着学生转了。他也说，北大、清华千万别闹事，一闹事中央也就不能干别的了，就围着北大、清华转。我想这个意见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学生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学生往往是非常敏感，能够敏感地看到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从政治上来讲，不是要单纯地说要稳定学生，而要看到学生之所以不稳定的社会原因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去改革社会推动社会前进。

同上。

有的同志特别害怕学生闹事，我觉得学生闹事的那种观点别的人不是没有，我们教师并不是感觉不到物价在涨，也感觉到在涨，只不过学生习惯于比较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种闹事表明了学生对社会的敏感，这种敏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当利用我们这种敏感去解决社会问题。

同上。

我们科大同学有一个弱点，我和科大同学也很直截了当地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说你们怎么也没点儿“闹事”的迹象。

同上。

现在文艺界情况很好，没人敢随便攻击作家。因为作家们认识到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批评了别人自己也保不住，所以大家联合起来，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而科学界则差得多，风气也很不好，往往是看到什么人要挨整，大家一齐去攻击。现在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做官，但这当中很多人被收买了，他们出卖了自己，再也不在知识分子一边了。

方励之：1986年4月18日在美国中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流行几句话：上宽下不松，“左”宽右不松，明宽暗不松，你宽我不松。我姓王的右，所以也不松。不要指望上面来给我们宽松，要斗争的。

王若望，1986年10月28日在上海松江文化馆的报告。

中国要往前走，中国知识分子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自己已经有的力量，但是没有意识到或是没有敢于显示出来。只要意识到，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大家做为学生对去年下半年以来印象深刻，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非常紧张，对吧？这说明有力量，只是你敢不敢用。

方励之：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

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要去争取我

们这样一个独立的地位和主导的力量,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同上。

学生问:过去有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怎么理解?

方回答:这也是封建中国传统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实际上也有成功的,孙中山至少还是把封建推翻了。

方励之: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流行一句口头语: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这就回答了刚才这个布鲁诺的问题,这是中国民主的苗头,我希望中国保持现在谁也不怕谁,扩大这个谁也不怕谁。

方励之: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两年前在示威期间,他们(指学生——编者注)还是相信政府的。他们认为政府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可是,政府最后却全盘否定他们的观点并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从而,学生完全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

知识分子有权利,每个人都能获得个什么东西。民主不是给的,而必须夺取它。那些领导人最终将被迫实行变革。

方励之语,载英国《独立报》1988年5月28日。

现在的中国现状,人民首先要争取的,就是生活上的基本

权利。这是比较现实的作法。到人民有了基本权利，社会富足起来，民主就会出现。

〈方励之谈中国走向富强之路〉，香港《明报》1988年9月17日。

方励之提到中国政府指责他在两年前煽动学生游行时，语多幽默讽刺。

他说，“我认为游行是很美丽的，但很可惜，有些人并不欣赏这种美！”他又拿出一幅画有群众手持标语巡游的漫画，来说明物理学家对美的概念，是混乱和守法的结合。

方励之又指出：有人批评学生缺乏一个有规律的计划来支持他的民主口号，但他赞赏他们开启人民的思考。

他说，学生的口号是正确的。在过去两年，人民逐渐理性地谈论他们的行动，及支持他们。

方励之重申中国的记者、出版界及学术研究人员需要更大自由。

香港《新报》1988年11月11日。

面对困难、挫折或危机，要有正视困难和错误的勇气，而不要把困难或某些失误变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借口。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仍然没有消除文革或权力斗争的因素，弄不好就会重蹈文革的覆辙。

严家其语，载《海口晚报》1989年1月5日。

我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的非程序权力更迭覆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代表大会确立起来的，党的最高领导层要共同对全党负责，集体领导体制是共同责任体制，而不是文革式的两条路线斗争体制。中国不再容许像文革一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人们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危机之中就和这种认识有关系。作为人民的一员，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把对中国前途的这种担忧说出来。

同上。

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改革成果面临断送，面临复旧势力卷土重来，“一切都是原来的好”，碰到困难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整个观念制度上卷土重来那是非常可悲的。

温元凯语，载《海口晚报》1989年1月5日。

我对中国的改革现状有三种估计，中国改革正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原地待命，改革如果停下来，会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第二种选择，看来是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开倒车”，想从泥潭中退出来，重新寻找出路。当然收权、紧缩也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危险：“辛辛苦苦十来年，一夜回到改革前。”我们已经看到过波兰、捷克退回很多年，又从原点出发，那是很可怕的。我现在正在探讨的是第三种选择，有没有可能朝前走，走出危机，走出泥潭，不要把“深化改革”变成一句空话。我担心现在的调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也可能把“深化改革”

全部冲掉。

温元凯语,载《海南开发报》1989年2月3日。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能摆脱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是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量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型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要用非暴力的方法促使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

方励之语,载《香港时报》1989年2月9日。

知识分子组成压力团体,迫中共改革的时机已到来。

方励之语,载《香港时报》1989年2月20日。

匈牙利当局已为1956年事件平反,这是很重要的事。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外在的压力已越来越大。内部来说,不论知识分子、工人或一般民众,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声浪也越来越高。

方励之与台湾记者的谈话,台湾《中国时报》1989年2月23日。

4月2日以大陆海外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大陆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在美国纽约正式宣告成立了。她的光荣诞生，拉开了改变中共在大陆一党专制，实行多党竞争的序幕。

当前，民主已成为荡涤一切专制污泥浊水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民主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目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已使一个反对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为了适应中国民主运动的需要，推动和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108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之春）的代表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紧急代表大会，发起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制定党章、宣示目标，联合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的各界人士及团体，共同奋斗。我们将通过传播、组织等形式，在宪法中废除四个坚持，改变中国大陆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政体。……我们呼吁爱好民主的人们在此之际行动起来，迫使中共进行政治改革，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我们要把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变成1976年“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迎接“五四”运动70周年。我们知道，当年的“四五”运动宣告了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垮台，我们更希望，今天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活动能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

我们民主党人坚定地认为，当年“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口号“民主”和“科学”今天仍是促使中华民族走上繁荣昌盛唯一之路。十年前民主斗士魏京生便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正确主张。今天，大陆经济改革的

失败，说明了民运人士的真知灼见。我们强烈要求中共领导者能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政治改革，保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们呼吁全国同胞们勇敢地行动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战！为打倒独裁，消灭专制，根除贪污腐化，实现民主、自由、人权而战！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去迎接海内外联合推动的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吧！……

《中国民主党告全国同胞书》，1989年4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收到的寄自加拿大的传单）

彻底否定“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允许民主办报刊，新闻自由，限期解除报禁。

释放政治犯，反对以言定罪。

王丹1989年4月18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演讲。

给上次学潮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承认上次把学潮的民主问题说成“全盘西化”、“开历史倒车”，纯属胡说。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

取消北京人大十条游行规定。

自由、民主、无阶级属性。

解除报禁、党禁，立法保障新闻、出版自由。

《我们的目的、口号》，1989年4月19日清华大学贴出的署名。

“冯小卫”的大字报。

我国社会表面的虚假的宽松和谐和安定团结是以对全体人民普遍的高压政策和数百万优秀人才的鲜血、生命以及丧失自由和健康的高昂代价换取的。中国人民不需要这种虚伪的所谓的宽松和谐安定团结，这不是人民希望争取的政治目标而是一党和八党私利。

任晓町：1989年4月21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讲，台湾《联合报》，1989年4月23日。

只有当几千万产业工人意识到自身民主权利不是靠他人赐予而是靠自己争取并足以掌握国家局势的时候，中国的生产腾飞和民主事业就接近实现了。

同上。

中国现代民主主义运动自从50年代民主党派企图尝试执政以来，历经作为人民反抗运动的文化革命、四五革命、民主墙运动、八五学潮、八六学潮、八九上书运动以及目前的运动，一次又一次人民民主的强大示威和抗议惊醒了共产党执政者，迫使它纠正错误，帮助它拨正航程，一次又一次挽救了国家危机。

这种看似一时的动乱，对国家、对民族、对执政党有什么害处呢？那种单个人，有组织，有系统的上书建言，你们什么时候认真对待过呢？这种上书，什么时候触动过你们呢？

纪念碑前的花圈,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长安街上的游行,新华门前的静坐,这是教育执政者最好的办法。

同上。

我并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而是坚决支持。但是,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争取民主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应该更为具体化、多样化,更讲究实效。……例如,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

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

公正地讲,民主墙时期的悲剧人物(魏京生、徐文立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其进步性要远远超过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甚至我以为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异。胡耀邦仍然是在维持一党专制的范围内要求改革,即使他做过数不清的好事,也不是由于制度的优越造成的,而是由于胡本身所拥有的巨大特权造成的。运用特权来保护争取民主的人士,这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是自我讽刺——无论是对于保护者还是对于接受保护者。而民主墙的民运成员则是要求从根本上废除一党专制,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带有争取自身的独立权利的性质,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

同上。

这次学运是“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史无前例、极其成功的。10多万大学生（不包括数十万计的北京市民）走上街头，喊出了我们的口号，表达了我们的心愿。学运的成绩还表现在，一大批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成了学运的领导和骨干力量，使整个行动更为成熟，更为理智。我们还在学运中成立了一个在各校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基础上，由47所高校代表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联合会”。这是一个全新的组织，在这次学运的壮举中，它表现了同学们高度民主意识和动用民主手段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它对日后的民主改革肯定会大有意义，起到推动作用。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几十万市民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帮助并支持我们的行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学运的胜利，是民主运动的胜利，是全体人民的胜利，是“五四”精神的胜利。

非法组织“高自联”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五四”宣言。

中国大陆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一场真正的革命，一场十分和平、十分理性的革命，一场有着过分成熟的基础，但又相当缺乏准备的革命——所谓有过分成熟的基础，是指社会各种矛盾早已累积到无法忍受的超饱和状态；所谓相当缺乏准备，是指绝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这场革命会在此时、此地，以这种方式发生。因此，毫不奇怪，它引起了普遍的震撼和困惑，深刻的激情与思考，空前的希望与疑惧，以及广泛的选择空间和

狭窄的选择空间。

胡平,《中国大陆一场真正的革命》,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5月4日。

我们这次学生运动,作为爱国启蒙运动有两点,一是要启群众之蒙,主要是焕发各阶层人们的热情,我想这一点通过“4·27”、“5·4”大游行高呼口号,沿街散发传单,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二是要启自己之蒙。我们应该切实按照宪法做起,不要管他允许不允许,只要宪法允许的,我们就应该做,宪法不是允许言论自由吗?那么对不起,我们就想说我们要说的话,宪法规定了出版自由,我们就能出版自己的报纸,你可以说不允许民办报纸,但是,你代表宪法吗?就这一点,政府比较尴尬。方励之老师讲“压力集团”,“4·27”,“5·4”就是压力过程,结果怎样,谁输了?是人民还是政府?下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校园民主建设,我想这是咱们最后一条界限。校园民主主要包括:学生自己办自己的报纸,办自己的广播,办一些讲座,邀请那些学者,不经过党委或校领导来批,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民主墙,应该有与校方对话的机制。学运已到了这一步,我们一定要坚持住,就一定会有成果的。

王丹1989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同学们,从4月15日到现在,你们取得了1987年甚至上百年来都没有取得的胜利,经过你们的行动,取得的社会进步,我们绝对不能有小小的技术上的闪失,而使同学们取得的成就

付于流水。如果没有你们,全国人民就不会看到现在的中国人民会这么成熟,对民主要求是这么迫切,这是你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如果没有你们,怎么会有新闻记者要求新闻自由,也不会有这么多报纸不再用新华社的专稿,而用他们自己的稿件,这也是你们的功劳,如果没有你们,领导人也不会跟你们对话,也不会来这里看你们,这也是你们的胜利。

我现在再重复刚才的两条,如果大家同意,我就要回去跟他们商量去了。第一条,12名学者今天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对时事的看法全文见报。第二条,赵紫阳、李鹏等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到同学们中间来。但是,同学们不要要求他们,考虑到他们的水平,不要要求他们讲话,回答各种问题了……

戴晴1989年5月14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讲。

今天下午我们12位大学教授、学者凭着社会责任感,自动汇集在一起,商量了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我们12人在下午就已向新闻界表示了对学潮的整个看法,要点如下:

1. 我们认为4月15日以来的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且它将开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纪元。学生运动无罪。

2. 我们认为如果是通过大部分学生民主选举程序选出来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政府应给予承认。

3. 我们反对以任何借口、形式对学生采取暴力行动,而且应该保护任何一个参加学潮的学生,不得打击报复。

这是我们的几点看法,鉴于今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我们希望同学们要认清国情，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注意争取有效的时间去实现有效的目标，同时要注意警惕有人可能会挑起事端，使事情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的顺利进行，我们恳切希望学生能够在政府答应条件的前提下，撤离天安门广场，而且我们经过研究，如果政府不答应条件，我们将和同学们一起行动。

温元凯1989年5月14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讲。

首先我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同学们，你们看到没有，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胜利，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如何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聪明得多。4月15日以来学生运动最值得称赞的就是你们的理性精神。现在政府和执政党，正是在于民主政治表现得非常无能（高喊：苏晓康真敢讲话）。我还想说正因为如此，你们大家要讲理性要教会他们。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理性？（高喊：“有”）那好，如果政府做出让步以后，我们能用我们的理性回答他们。

苏晓康1989年5月14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讲。

与10年前“北京之春”运动相比，这次的组织规模、争取的手段、提出的目标都有深入进步。可以看到，这批年龄二十左右的青年学生，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灌输甚少，代之是较自

由和开放的思想。对政府的认同感也较前更弱。由于没有高压政治下的残酷经验和随之的世故，他们能够较明智、平和的去对待自己的这次运动。

我以为，作为中国 40 年来的第一批在非政治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更有可能建立自己新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结构，从而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阶层。另外他们一出场，就提出了要求政治局集体辞职的主张，这表明未来他们所代表的“抗议政治”已初显端倪，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政治前途的希望。

现在讨论这场运动对未来的影响和意义还为时过早。然而这场运动与前不久的“签名运动”，也经报晓第二个“北京之春”的到来。

陈军：《第二个“北京之春”——浅议北京大学生的民主运动》，香港《新报》1989年5月15日。

《人民日报》那篇磨刀霍霍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动乱”，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它一点吓不倒人，反而暴露了“途”穷匕首见的气急败坏的凶残，又回到毛时代用政治大帽子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来迫害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老路，可说是“满纸荒唐言”，这篇“精心制作”的妙文将给光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奇耻大辱！

王若望：《学生运动与胡耀邦是代表正义旗帜》，香港《百姓》半月刊1989年5月16日第192期。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次学运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想指出，无论是在数千年古代中国社会，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农民革命，也不乏党派战争，还有红卫兵的造反行为，但像今天学运这种以非暴力的理性行为为特征的和平请愿活动，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用理性方式对政治表达自己的真正意愿，并以行动告诉政府，人民有权用合法的方式对其投信任或不信任票。可以说，中国老人政治就这样结束了。一个从文革以后就开始酝酿的还政于民的漫长运动终于在今天显示出它的结果。人民已经显示并正继续显示自己是不能被抹煞的力量，政府应与人民对话，并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金观涛：《中国的光荣革命》，香港《明报》1989年5月18日。

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

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做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协助大学生做好维持秩序和后勤服务工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在四月中旬以来以学生为先导的全民族爱国民主运动中,大多数中国工人已表现出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民主意愿,同时,也认识到现在尚未有一个真正代表广大工人来表达这种意愿的组织。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为工人讲话,并组织实现工人参政、议政的自治组织。为此,我们筹备组织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并提出其筹建纲要。

一、该组织应当由工人自愿参加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完全独立的自治组织,不应当受其它组织控制。

二、该组织的基本宗旨应当是根据大多数工人的意愿,提出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而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福利组织。

.....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筹建纲要》,1989年5月25日。

被取缔的中国民主联盟的两名成员今天说，他们将于星期四（4日）回到北京，以此考验共产党政府对非暴力反对派的容忍态度。

王炳章说，“汤和我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要去考验北京政府的政策。我们不能肯定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邓小平和共产党曾多次攻击我们的运动。我们相信，共产党政权将在15年内消失。”

汤光中说，“我们将同学生对话，同学者对话，同政府对话。如果我们有机会接触报界，我们将尽力而为。”汤说，由于目前中国学生的示威和“五·四”的重要意义，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重返北京。“我确信将会发生某些使全世界震惊的事情。如果他们（指中国政府）使用武力，我担心可能出现流血事件。”汤还说，“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外有50个分会，在国内大约有40个在地下活动的分会。中国民联的代表上个月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这是大陆中国的第一个反对党，但是在中国境内的党员不能公开。”

1989年5月合众国际社报道。

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刘晓波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门口的演讲，1989年6月1日晚。

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起的,……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深深地忏悔,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我想借这次绝食告诉国内外的舆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是公民,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今天,我希望全中国、全世界在理解中国政治问题的时候,换一个思路。在过去大家一谈起中国的政局,总是从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派系之争来判断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来判断中国前途的黑暗与光明。但是在今天我想提出,这次持续了50多天的民主运动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这样一个希望,在中国,今天,究竟是谁在主宰中国,是人民还是不合理的政府!

……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

同上。

政府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的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日益完善。

刘晓波：《六·二绝食宣言》。

这场学生民主运动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成就，就是有数百万人参加，接受了民主的洗礼，多少有了些民主的观念。天安门就像学校一样，不论是谁走上天安门广场都会受到感染，不论是感情的，或是观念上的，整个民主气氛确令人有不同感受。

方励之语，载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3日。

记者问：在过去的几天之中，学生运动已经有了急剧的变化，已由稍早的单纯要求对话演变成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你对这种转变的看法如何？

方励之答：是的，在过去几天间确实有相当大的变化。在戒严令宣布之前，学生只有两项要求，第一就是要求官方对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公开道歉，《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指控学生造成骚乱，其次，学生要求和政府进行公开、公平的对话。

目前李鹏已经下令戒严，学生了解根本不可能和政府进行对话，他们的目标已经转为要求李鹏下台。

记者问：你所倡导的民主运动，以及释放魏京生的呼吁是否与这次学生运动相吻合？

方励之答：如果这次学生获得成功，那么我相信魏京生这个案子可能很容易的就解决了。

方励之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前夕与《南华早报》记者的谈

话。

我觉得这次学生运动，的确是值得称道的。在历史上，它正好碰上五四运动70周年，我想它会在历史上留下纪录的。这次运动，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更清楚表明了知识分子有了独立的政治观点和兴趣。今天，中国的改革好像只有少数人管，我想，改革是中国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有权更积极的表态，发表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我想，当局很不喜欢一个词——“压力集团”，但不论你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现在学生的确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我想，这可能对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有所深远影响。

方励之语，载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13日。

方励之1989年6月2日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学生、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首次知道自己有权批评政府，这是中国以前从来未有过的。

当记者问到他是不是这次运动的幕后主事者时，方说：在精神上我有很强的影响力，一些学生领袖以前常来我家。……同学们知道我完全支持他们，但他们不想有明显联系。

当记者问到“这次运动会有什么效果”时，方说：短期而言不易有大改变……长远来说，我们要年老一代领导人比如邓小平他们都下台，他们下了台，情况会好些，会有较多民主。

香港《明报》1989年6月13日刊登美联社消息。

刘宾雁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历史的进程，早已不取决于个人，真正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是1979年经济改革派发起来的，极其深刻、极其广泛的社会底层的变革运动，其内涵已超越经济，也包括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变动。

刘宾雁呼吁人们，把眼光放在中国的底层，北京以外的省、市、县，共产党内的民主派，不应只限于大学生及城市。他说，天安门广场，将会演化成千千万万的小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将会转移到很多农村，因为农民已无法忍受越来越难过的生活，而共产党内部的民主派，发展成党内抗衡的健康力量，也是不容易忽视的，这是别无选择的现实。

刘宾雁相信，今后斗争的主要形式，大概是和平合法的，但也不能断言没有动乱。原来非政治性的暴力活动，也可能演变为政治暴力活动。

香港《明报》1989年6月19日。

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

刘晓波语，载香港《明报》1989年6月21日。

或许组织只能从学生中发展出来，但我不认为应该把组织的范围限制在大学生。它应该有更巩固的社会基础。如果群众和个体户都响应学生的口号，如果他们从本身利益出发，也要求与政府对话，譬如要求实施私有制，那么为中国带来的希望会比现在的学运结果更大。民众和个体户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他们只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没有站出

来。我相信这层力量慢慢出现后,中国会改观。学生的问题,在他们于社会中并无本身的特殊利益。因而他们提出的问题与制定的目标都不切实际,进而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同上。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庆节,我们这次联席会议提出,要把六月四日订为中国国殇日。……我们永远要把这个国殇日在整个中国历史永远纪念下去。

严家其语,载香港《明报》1989年7月5日。

严家其说,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并不可能,但有一些是有必要的,例如世界银行不给予新贷款就是必要和有效的。像这类政府贷款就不应再给。

香港《明报》1989年7月31日。